

Translation Quarterly

No. 114 2024

香港翻譯學會出版

翻譯季刊

二〇二四年
第一百一十四期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翻譯季刊》

Translation Quarterly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第一百一十四期

No. 114, December 2024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24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ISSN 1027-8559-114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has entered into an electronic licensing relationship with EBSCO Publishing, the world's most prolific aggregator of full text journals, magazines and other sources. The full text of *Translation Quarterly* can be found on EBSCO Publishing's databases.

Translation Quarterly is available for open access on the website of its publisher,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at <https://www.hkts.org.hk/translation-quarterly>. All rights of the journal and materials therein are reserved by the publisher.

Readers may exercise fair use of the materials in *Translation Quarterly* for research, teaching and non-profit making purposes, provided that due and express acknowledgment be made citing the respective publication details, including the author, article title, journal title, issue number and year of publication, and where applicable, the publisher. Permission for reproduction, distribution or display of the journal and materials therein for any other purposes should be sought by writing to the publisher at tq@hkts.org.hk.

翻譯季刊

Translation Quarterly

香港翻譯學會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Founding Chief Editor 創刊主編

Liu Ching-chih 劉靖之

Honorary Chief Editor 榮譽主編

Leo Tak-hung Chan 陳德鴻

Chief Editor 主編

Li Dechao 李德超

Associate Editors 副主編

Li Bo 李波

Liu Kanglong 劉康龍

Shelby Chan 陳嘉恩

Song Geng 宋耕

Editorial Board 編輯委員會

Chan Kit-ying Elsie (Chair) 陳潔瑩 (主席) Poon Hon-kwong Joseph 潘漢光

Cheung Kay Fan Andrew 張其帆 Poupard Duncan 鄧彧

Laviosa Sara 邵璐

Lee Tong King 李忠慶 Sorby Stella 洪蘭星

Li Defeng 李德鳳 Wang Binhua 王斌華

Lung Wai-chu Rachel 龍惠珠 Yan Xiu Jackie 鄒秀

Moratto Riccardo 莫冉 Zheng Binghan 鄭冰寒

Advisory Board 顧問委員會

Baker Mona Lörscher Wolfgang

Dollerup Cay St. André James 沈安德

Goldblatt Howard 葛浩文 Yang Cheng-shu 楊承淑

Lin Wen-yueh 林文月

Editorial Manager 編務經理

Liu Zhongzhu 劉中柱

Contents 目錄

Editor's Note 編者的話

Articles 論文

- 01 論德里達“揚棄的”翻譯
李文婷 王琰
- 13 從譯作副文本看《人面桃花》在英語世界的話語言說與形象
劉文傑 孫會軍
- 27 金庸早期的新聞翻譯實踐探蹟
刁洪
- 39 《秦律遺文》中刑名術語誤譯研究
劉國生
- 57 他鄉的菱角花——《紅樓夢》香菱人物形象的英譯與再創造
張冰

Reviews 書評

- 77 **Navigating Modern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A Review of
Translation Tools and Technologies**
Tong Chu, Wanyong Wang
- 83 **Review of Danmu-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Lehan Li
- 89 Translation Quarterly Editorial Policy

編者的話：

本期收錄六篇研究論文與兩篇學術書評，聚焦翻譯研究的理論建構、歷史考掘與跨文化交流等多元議題，將理論、歷史與實踐並重，同時積極回應技術變革與時代挑戰，進一步深化了學科研究的縱深度。李文婷與王琰基於黑格爾的“揚棄”概念，對德里達的“relevante”進行哲學闡釋。作者通過語義延展、理論互證與文本內證三重維度，系統論證了以“sublative”移譯“relevante”的合理性，進而揭示翻譯乃是對原文的辯證揚棄，這一界定，推動了譯者的倫理解放。

劉文傑與孫會軍以《人面桃花》英譯本副文本為考察物件，系統分析標題、封面、封底、譯者序言、訪談通信以及讀者評論等副文本如何共同構築話語網路，在傳遞文學價值的同時，亦賦予小說歷史與現實交織的批判性意義，有益於中國文學形象的海外構建。

刁洪採取翻譯微觀史的“描寫—闡釋”視角，深入探察金庸早期的新聞翻譯實踐。研究借助史料與文本分析，不僅豐富了金庸作為“翻譯行動者”的歷史形象，也為其日後武俠敘事的白話風格尋得淵源。劉國生聚焦《秦律遺文》中刑律術語誤譯的兩類典型問題，從語言、法律、文化等多重視角剖析成因，並結合文化翻譯理念提出翻譯重構策略，進而從語言、法律文化、文獻學及譯者主體性四方面，系統論述提升中國古代法制文獻譯介準確性的可能路徑。

張冰以香菱這一極具象徵意義的悲劇角色為切入點，通過四種英譯本的比較分析，揭示了詩學抉擇、文化立場與傳播機制對文學人物塑造的深刻影響。該研究在文明互鑒日益深化的當下，對於推動中國經典文學的世界性傳播具有重要參照價值。

于爽以《譯叢》過去半世紀以來的選集編纂為線索，透過副文本分析，將香港文學選輯實踐置於具體的歷史語境中，揭示了選輯實踐如何成為文學身份建構的能動力量，為理解香港文學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交織語境中的自我定位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參照。

初彤與王萬涌肯定了《翻譯工具與技術》一書，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重構翻譯業態的當下，對技術演進脈絡的系統性梳理，同時也批判性地強調翻譯教育應以譯者為核心，培養機器難以替代的敘事重構、文化語境化、倫理判斷、創造性及共情等能力。

李樂含評價《數位時代的彈幕傳播與視聽翻譯》一書，將彈幕這一數位媒介實踐納入視聽翻譯學術視野，通過多理論視角與實證案例，通過多理論視角與實證案例，揭示彈幕如何解構傳統視聽翻譯邊界，催生出基於情感共鳴與社區認同的新型參與式翻譯文化，為數位時代翻譯的跨文化傳播提供了新框架。

本期文章既關注翻譯活動中“人”的能動性與文本背後文化政治機制，也積極回應技術反覆運算與數位媒介帶來的理論挑戰與實踐創新。本期內容共同勾勒出翻譯研究相容並蓄、與時俱進的學術風貌，為深入理解翻譯作為一項跨文化、跨媒介、跨學

科的社會實踐，提供了多元視角與扎實例證。

李德超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論德里達“揚棄的”翻譯

李文婷¹ 王琰²

Address: ¹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²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Belfast, UK

E-mail: ¹liwenting20026@163.com; ²15120078218@163.com

Correspondence: Wenting Li

Citation: Li, Wenting, and Yan Wang. 2024. “On Derrida’s ‘Relevante’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Quarterly* 114: 1-11.

Abstract

On Derrida’s ‘Relevante’ Translation (by Wenting Li and Yan Wang)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examines Jacques Derrida’s seminal article “Qu’est-ce qu’une traduction ‘relevante’?”, and proposes an innovative translation of “relevante” as “sublative” (Aufhebung). The study delves into the concept through three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first, the potential for semantic augmentation; second, the mutual corroboration between Derrida’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 philosophical views; third, the inherent textual clues that suggest a progression toward an open-end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rm “relevante”. This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title as “What is a ‘sublative’ Translation?” aligns closely with Derrida’s notion that translation is an act of sublating the original, engaging in a dynamic process characterised by a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negating the negation, whereby meanings are progressively supplemented and diversified. This view on “sublative” translation advocates for a liberated approach to translator ethics, promoting a balance between fidelity to the source and creative innovation, thereby challenging translators to neither adhere rigidly to the original nor alter it capriciously.

一、引言

德里達（Derrida）已去世 21 年，但他所主張的解構主義思潮仍然影響力巨大，被廣泛應用於翻譯、倫理、宗教、政治等各個領域。由愛丁堡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期刊《今日德里達》（*Derrida Today*）至今仍在發行半年刊，關注德里達的思想如何應用於當代的政治、社會、全球事務等領域，影響力不俗。

雖然皮姆 (Pym 1995, 15) 曾對將解構主義納入普通翻譯理論提出過尖銳的質疑：“解構主義提出的什麼內容是翻譯實踐者所不知道的？它對翻譯的實際使用者又能有什麼幫助？”，但他在自己主編的叢書《翻譯理論闡釋》(*Translation Theories Explained*) 中邀請凱薩琳·戴維斯 (Kathleen Davis) 撰寫了專著《解構主義與翻譯》(*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 2001)，而且這本書在翻譯學領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間接說明皮姆也承認解構主義在翻譯理論的發展中所佔據的重要地位。

確實，德里達解構主義與翻譯研究的關係非常緊密。翻譯對德里達來說，對解構來說，不是各種問題中的一個：它就是問題本身 (德里達 2001, 22)。在德里達論述翻譯的文章中，“Qu'est-ce qu'une traduction 'relevante'?” 被許多學者認為是最重要的一篇。這篇文章是德里達在 1998 年第十五屆法國文學翻譯學會研討會上所作的講座，受眾是約 200 名法國文學翻譯工作者。韋努蒂 (2001, 174-200) 將其標題英譯為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發表在國際權威學術期刊《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 2001 年第 27 卷第 2 期。韋努蒂 (2001, 170) 認為這個講座可以被考慮為德里達對“翻譯學”最直接的干預，那時“翻譯學”在歐洲和其他國家還僅僅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埃特爾 (Ertel 2011, 16) 認為該文對歸化翻譯提出了警示，強調了“翻譯所固有的歷史性與倫理構成維度”。

國內外學者們對德里達標題中“relevante”翻譯這一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韋努蒂 (2019, 123-124) 認為德里達所提出的“relevante”翻譯即採用一種闡釋的模式，在源文中銘刻理解，從而避免將翻譯當作一種工具，用於運送或再造源文中所存在的不變數；戴維斯 (2001, 105) 認為德里達所說的“relevante”翻譯應該超越計算的限制，超越確定的可能性；金兵 (2006, 76) 認為德里達的“relevante”翻譯是指要遵循質與量的雙重原則，強調譯文與源文之間保持一種適當的關係；王穎沖 (2011, 11) 則認為德里達是讓“relevante”一詞自我解構，以此來解構“可譯性”和“不可譯性”二元對立的傳統翻譯觀，從而揭示翻譯的本質。

從國內外學者對德里達講座標題的多重譯名亦可管窺其對德里達翻譯觀的不同解讀。韋努蒂 (Venuti) 在自己的英譯本中，將德里達標題中法語的後置定語“relevante”翻譯為英語的前置定語“relevant”，並保留了引號。韋努蒂的譯本影響深遠，因為大多數中國讀者沒讀過德里達的法語原文，而是通過讀韋努蒂的英譯本“*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來瞭解德里達的思想，甚至轉譯為中文譯本。

對於德里達標題中“relevante”一詞的翻譯，中國學者有不同的譯法，例如：“確切的” (陳永國 2005；劉軍平 2009)、“確當的” (王寧 2005；金兵 2006；孫志祥 2008；韓子滿 2009)、“相關的” (蔡新樂 2007)、“關聯的” (王東風 2004；劉全福 2009)，“relevant” (張霄軍 2010；梁心愛 2012；高乾 2014)，“relevant (e)” (王穎沖 2011) 等。從以上諸多譯法可見不同的譯者對德里達演講標題的翻譯呈現多樣性，均體現了其對德里達翻譯觀的不同理解。通過梳理德里達演講稿的內在邏輯，筆者發現揚棄的翻譯觀是德里達在該文本中意欲表達的核心觀點，可與德里達一貫的哲學思想相印證，因此提出一種對講座標題的全新譯法，即“何為‘揚棄的’翻譯？”該譯法之所以保留“揚棄的”一詞所帶的引號，旨在保留德里達的原文中使用引號的三層含

義：一是表示懸而未決，因為很難判定“relevante”一詞的歸屬，既無法確定其源語言，也無法確認其在當下使用時屬於哪種語言（Derrida 2001, 176）；二是強調詞的多義性，“relevante”有可能並非一個單一的詞，而是同音異形詞或同音同形詞疊加的多義詞（Derrida 2001, 176）；三是突顯“relevante”一詞的不可譯性，這與前兩點密切關聯，由德里達在文中親口承認（Derrida 2001, 178）。儘管本文將“relevante”譯為“揚棄的”，但引號的使用強調了詞義仍在不斷延異的意義鏈條上滑動，並非固定的術語。下文將從這篇演講稿的文本中挖掘出德里達所暗示的翻譯“relevante”一詞的可能性，即德里達用於翻譯黑格爾的哲學觀所使用的“揚棄”一詞，來闡釋和理解德里達“揚棄的”翻譯觀。

二、詞義的增補提供了可能性

德里達極為重視詞語的深層內涵、哲學負載以及在翻譯中發生的複雜轉化。他強調詞語處於一種始終不斷變化發展的動態演化過程，而正是翻譯將詞語意義的潛在性激發出來。德里達回憶道：

1967年，為了翻譯一個具有雙重意義的德語關鍵字（*Aufheben, Aufhebung*），既指壓抑又指昇華的一個詞，黑格爾認為代表著德國語言的純理論冒險的一個詞，當時，整個世界都認為這是一個不可譯的詞——或者說，在一種穩定的、令人滿意的翻譯上，從沒有達成共識的一個詞——我曾提出用名詞 *relève* 和動詞 *relever*。在把他們合成一個詞時，我就能保留昇華和移位的雙重母題，即保留它所否定或破壞的東西，保留它使之消失的東西。（德里達2005, 168）

德里達通過翻譯黑格爾的哲學詞語“*Aufheben, Aufhebung*”，不僅將名詞“*relève*”和動詞“*relever*”合為一體，而且由於這個譯名的經典化，使“*relève, relever*”生髮了新的意義，即哲學意義上的“*Aufheben, Aufhebung*”，此譯例展示了語詞的意義鏈條如何不斷地發生延異。“*relevant*”是“*relever*”的現在分詞形式，而“*relevante*”則是“*relevant*”的陰性形容詞形式，是滑動的意義鏈上的一環。作為現在分詞使用時，*relevante* 指向一個正在發生卻未完成的動作，這種未竟之姿恰如翻譯之行動，在語言之間的空隙中徘徊與遲疑（Levine 2022, 11）。德里達一直強調自己所關注的翻譯是詞的翻譯，而詞義的潛在性在翻譯中不斷被激發，不受詞性所局限。在德里達的語境中，當一個動詞被賦予了特定且深刻的哲學含義時，其派生形式亦即會承載這種增補的意義。當“*relever*”通過德里達的翻譯實踐被提升到“揚棄”的哲學高度時，“*relevante*”便不再僅僅指“相關的”或“恰當的”，而是被賦予了“*Aufheben, Aufhebung*”——即既提升又替代、既保留又取消——這種複雜、矛盾且動態的意義。對德里達而言，“揚棄”並不是一個在翻譯中可被直接“再現”的概念，而是一種在否定與保存、損失與存續之間搖擺的動態過程。

在黑格爾和後黑格爾（當然也包括馬克思）哲學研究的語境中，“揚棄”幾乎已

經成了“*Aufheben, Aufhebung*”的汉语定譯（俞吾金 2011，52）。然而，“扬弃”一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而是形成于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李永傑、潘沁 2021，18）。早期曾有“废止”（陈望道 1920）、“废除”（吳亮平 1930）、“消灭”（博古 1943）等译法，但均未传达出黑格爾（2004，98）所强调的双重含义：“既意谓保存、保持，又意谓停止、终结”。直到吳亮平（1940）明确使用了“扬弃”译法，成仿吾（1978）等人反复校勘德文原典之后，才逐渐确立“扬弃”这一译名。“扬”与“弃”表面上对立，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一个词：没有“弃”，便无法克服旧阶段的局限，也就无从谈“扬”；没有“扬”，单纯的“弃”只是抽象否定，无法生成更高阶段的肯定。因此，扬与弃在辩证运动中互为条件，共同构成“否定—保存—提升”的逻辑结构。“扬弃”一词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语言的生成性，与德里达以法语词“*relève, relever*”翻译“*Aufheben, Aufhebung*”在跨语言的生成逻辑上呈现出相似性。

三、“揚棄的”翻譯觀與哲學觀互為印證

根據德里達的文本線索，筆者將標題譯為“何為‘揚棄的’翻譯？”，一方面是因為德里達對“*relève, relever*”的詞義增補為賦予“*relevante*”一詞相應的哲學意涵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因為對德里達而言，翻譯與揚棄二者在概念上極具相似性。

“揚棄”是黑格爾哲學體系中的重要概念，馬克思對其詮釋最為深刻（李永傑、潘沁 2021，15），他指出“揚棄了的質 = 量，揚棄了的量 = 度，揚棄了的度 = 本質，揚棄了的本質 = 現象，揚棄了的現象 = 現實，揚棄了的現實 = 概念，揚棄了的概念 = 客觀性，揚棄了的客觀性 = 絕對觀念，揚棄了的絕對觀念 = 自然界，揚棄了的自然界 = 主觀精神，揚棄了的主觀精神 = 倫理的客觀精神，揚棄了的倫理精神 = 藝術，揚棄了的藝術 = 宗教，揚棄了的宗教 = 絕對知識”（馬克思、恩格斯 2009，215）。從以上鏈條可知，“揚棄”並非單純的否定或消除，而是一種辯證的轉化關係。每一個範疇在被“揚棄”後，既克服了自身的局限，又保存並提升了其積極內容，從而轉化為更高層次的規定。錢鐘書（2015，488）在對沃爾特·考夫曼《黑格爾重釋》的摘錄中記載了“*Aufheben*”一詞同時含有“取消”“保持”和“提升”之意。黑格爾本人對“揚棄”的定義如下：

揚棄在語言中，有雙重意義，它既意謂保存、保持，又意謂停止、終結。保存自身已包括否定，因為要保持某物，就須去掉它的直接性，從而須去掉它的可以受外來影響的實有。——所以，被揚棄的東西同時即是被保存的東西，只是失去了直接性而已，但它並不因此而化為無。（黑格爾 2004，98）

德里達將“*relève, relever*”用來翻譯“*Aufheben, Aufhebung*”，實際上是將翻譯的運動與黑格爾“揚棄”的轉化過程聯繫起來，從而為“*relevante*”成為意義鏈條上的一環提供了翻譯的潛在可能性。所謂“*relevante*”的翻譯，正是一種在新的媒介中對原文的“揚棄”——亦即：否定、提升並保留原作於新的形式之中（Trüstedt 2019，168）。

德里達認為哲學的起源在於翻譯或“可譯性”這個命題，一旦翻譯在這個意義上失敗了，那麼被打敗的不僅僅是翻譯，更是哲學。例如柏拉圖的“藥”（*pharmakon*）這類語詞本身就對哲學提出了持續的挑戰，無論是將“*pharmakon*”翻譯為“毒藥”或“解藥”，語詞的不確定性都將丟失。哲學話語無法做到對一詞多義的情況進行翻譯，而不導致意義的殘留（Derrida 1985, 120）。德里達（2001, 196）指出，人們曾相信沒有任何人能將黑格爾的哲學術語“揚棄”穩定地、滿意地翻譯為任何語言，而他提出由名詞“*relève*”和動詞“*relever*”組成的翻譯方案備受推崇，甚至被人們奉為一種經典的定譯，他卻不能確定這是否屬於翻譯的範疇，正如德里達（2001, 178）宣告自己演講標題中“*relevante*”一詞是不可譯的。“揚棄”的譯例體現了翻譯在“既可譯又不可譯”的張力中生成意義。德里達並未困於可譯性與不可譯性之爭，而是在演講中採取了以質和量的經濟原則假設並消解了這組二元對立的矛盾，點明任何一種翻譯都是處於這兩種極端之間的連續體的任意一點（2005, 151-152），正如他在《活下去：邊界線》一文中所表達的：“完全可譯的文本，會作為文本、作為書寫、作為語言的身體而消逝。而完全不可譯的文本，即便在被認為是同一語言的情形下，也會立刻消亡。因此，成功的翻譯既非文本的生命，亦非文本的死亡，而只是其存活，是其死後的生命，是其在死亡之後的生命”（Derrida 1979, 102-103）。

對於德里達而言，原文的書寫就是一種否定，會失去一部分意義，因為它遮蔽了另一部分意義的潛在性；而翻譯恰恰是揚棄原文的意義，將被遮蔽的內容凸顯出來，激發意義的潛在性，是否定之否定。但是，經由翻譯所還原的意義並非原來的意義，可能在原有的整體上生髮出新的意義，而這正是翻譯的價值所在，使意義的鏈條不斷地增補和延伸，從而保證原作的身體得以倖存（此處的“倖存”[*survival*]指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中所提到的雙重意義：既是延長的生命 [*prolonged life, continuous life, living on*]，也是死後重生 [*life after death*])（Derrida 2001, 199）。從德里達的視角來看，翻譯可以被解讀為一種“揚棄”的實踐，因為它在否定與保存之間實現了同步。正如德里達在演講稿中所提出的：“難道翻譯不正是通過變化的過程拋棄肉身來保證原文在這兩種意義上倖存嗎？通過將能指提升至它的意義或價值，同時保存悲傷的、負債累累的記憶，這些記憶屬於由翻譯提升、保存和否定的單一的身體、第一個身體、獨一無二的身體”（Derrida 2001, 199）。這段話可以看作是對“揚棄”這一哲學概念的挪用和解構：翻譯“拋棄肉身”是一種否定，指改變了原文的具象形式，例如語音、意義或結構等。翻譯“保存記憶”是指不會完全地清除原文的痕跡，必然有殘留的蹤跡。其“記憶”之所以“悲傷”和“負債累累”，是由於翻譯的實踐確實可能生成一些永遠無法償清的“債務”，而如何回應這些債務塑造出一種翻譯倫理（Bolduc 2023, 459-460）。翻譯“將能指提升”則是將原文中語言符號的形式部分轉化為更高層次的意義結構，從而進入目標語言之中。翻譯的這三個功能恰好對應了黑格爾哲學的核心概念——揚棄的三個環節：否定、保存和提升。對黑格爾而言，以上三個環節邏輯上是同時完成的，並無先後之分。德里達在對這三個環節總結時採用了“提升、保存和否定”的順序，消除了將這三者誤認為是線性運動的可能性。然而，德里達並未停留在黑格爾式辯證統一的圓滿，而強調翻譯始終是一種不可完全轉錄的過程，永遠殘留

痕迹，是“一种哀悼的经验”（Derrida 2001，199）。换言之，翻译所“保存”的价值永远伴随着损失与裂隙，这正是德里达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构性改写”。

四、標題中暗含的文本線索之解析

《何為“揚棄的”翻譯？》一文的文本組織和思想內核是同構的，其演講標題中暗含的文本線索與德里達“揚棄”的翻譯觀相吻合。德里達在演講之初就埋下了一條明線，即為標題的不可譯性向聽眾道歉，實際上將聽眾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他的標題上。德里達演講稿的標題為 QU'EST-CE QU'UNE TRADUCTION “RELEVANTE”？^[1] 德里達所面對的受眾是約 200 名法國文學翻譯工作者，所謂不可譯的東西難道不正是最吸引譯者孜孜不倦去追求的嗎？他總是嘗試以一種“抵抗”翻譯的法語去寫作，然而，他也是在以這種方式來召喚翻譯，因為譯者正是在他發現了某種限制的地方，在他發現了翻譯之困難的地方，才會產生翻譯的欲望（德里達2001，24）。

德里達既然宣稱標題是不可譯的，自然會在其中埋下“抵抗”翻譯的線索。第一條是明線，由德里達自己所揭示，即無法確定“relevante”一詞所屬的來源語言。他認為，要確定“relevante”一詞所屬的來源語言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把它放在引號裏。他也不能確定自己在使用“relevante”的這個時刻，即在重新抄寫它的句法或語句裏，它所屬的那種語言。這個詞是否在同一種語言中講同一種語言？同時，我們甚至不知道它是否真的是一個詞，具有單一意思的單個詞，或是本身作為同音異義詞而在一個詞中構成一個以上的詞（德里達2005，149）。

在這段短短的論述中，德里達其實提出了兩個問題：（1）“relevante”這個詞是否在同一種語言中講同一種語言？（2）它是否真的是一個詞，具有單一意義的單個詞，或是本身作為同音異義詞而在一個詞中構成一個以上的詞？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暗含在德里達的文本之內。首先，“relevant(e)”這個詞作為一個翻譯實體，在不斷的語言轉換中顯現其價值和意義的流動性。在這一過程中，“relevant(e)”不僅僅是文字的轉譯，更是文化和語境的跨界遷移。這個詞承載了記憶和痕跡，展示了它作為翻譯的痛苦與挑戰，並且在這種轉換中，它被賦予了一種特殊的光環（aura）或光暈（halo）。同時，這個辭彙在進入法語的過程中，也體現了跨文化的動態，它既呈現出源自英語的流行性，又不斷地經歷法語化的過程，這種雙重性體現了其在歐洲語言環境中的複雜性和多維度的文化互動（Derrida 2001，177）。值得注意的是，此處德里達改換了上文提到這個詞時所用的陰性形式“relevante”，而使用了這個法語詞的陽性形式“relevant”，從形式上來看與英語辭彙“relevant”完全一致，讓讀者更無法分辨這個詞在此處的語境中到底是法語辭彙還是英語辭彙。此處“relevante”一詞的邊界不清，徘徊在英語或法語，抑或是其他的日爾曼語種的邊界之間，當然不是在同一種語言中講同一種語言。這也正是德里達在演講中要討論“relevante”的翻譯的必然性所在，因為翻譯就是那在多種文化、多種民族之間，因此也是在邊界處所發生的東西（德里達2001，22）。

其次，“relevante”無疑應當屬於詞，這符合德里達一貫以來對詞的興趣。德里達對語法和詞彙學都不感興趣，喜歡將詞語當作自己的話題（德里達2005，148）。德裏

達將“詞”稱作一個“身體”（corps），延續了將文本視為有機生命體的悠久思想傳統（Batchelor 2023，8）。他稱自己對詞的熱愛“在它那充滿語言特異性的肉身之中；正是在那裏，翻譯的激情仿佛一縷火焰，或一條愛欲之舌，前來輕舔其身”（Derrida 2001，175）。當他從經濟（質和量）的角度來討論可譯性和不可譯性時，提及自己更關心衡量的單位，即計算詞語，亦即詞語的辭彙單位的數量問題（德里達2001，152-153）。翻譯是在意義的轉化（質的維度）與文字實體的數量（量的維度）之間，以一種經濟的度量實現調和與創造（Cai & Zhang 2025，14-15）。德里達對詞的重視與本雅明（Benjamin）的思想是相似的：本雅明（2005，10）認為詞語而非句子才是翻譯的基本因素……它向翻譯的經濟問題敞開，無論是作為專有名詞的規則的經濟問題，還是作為量的關係的經濟問題。

“relevante”是一個詞，但肯定不是單義詞，而是本身作為同音異義詞所構成的多義詞。德里達在標題中使用“relevante”這個陰性形容詞，除了因為在語法上需要修飾“翻譯（traduction）”這個陰性的法語名詞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這個陰性形容詞“relevante”比對應的陽性形容詞“relevant”更接近英語單詞“relevant”的發音。德里達著力構建出一個難分詞源的同音異義詞。在演講中，德里達賦予“relevant”（注意：德里達在文中不斷地在“relevante”與“relevant”之間轉換）這個詞一個新的概念，即“同時既是形容詞又是動詞，既是表述性詞語又是謂語的現在分詞”（德里達2005，149），因為解構主義慣用辭彙的多義性來彰顯自己觀點。此處“relevante”這個詞在歷史的語境中，在翻譯的進程中，在不同語言的互動中，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詞義，如“使味道更濃、免除、接替、襯托、提高地位、修復、屬於……的”等。這個語詞通過一種增補的皺褶，來證明翻譯的資格（德里達2005，150）。

解讀德里達演講標題的第二條線索隱藏在文字背後，從語音中無法發現，這是德里達對於語音中心主義的一種解構。“語音中心主義”存在著一種符號的等級制，即語音對文字的優先地位，具體表現之一就在於“語音意味著意義的在場，而文字不過是表達意義的形式和手段”（孟憲清 2015，57），而德里達顯然不贊成這種觀點。縱觀德里達論述解構主義思想的文章，不難發現德里達擅長於智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術，他特意挑選了那些試圖貶損“文字”的作家的用詞，指出這些用詞的含義實際上依靠文字本身。他接著強調了文字的價值，用此來反駁“語音至上”的觀點，說明把“理性至上”作為唯一準則是一種內部矛盾且不可行的思考方式（趙敦華 2001，268-269）。

在演講稿中，德里達播撒了文字可以表達，而語音很難傳達的意義，從而解構了語音和文字這組二元對立關係，特別是語音之於文字的優勢地位。首先，德里達在演講中多處使用同音異義詞（例如“merci”與“mercy”，前者表示“憐憫、仁慈、恩惠或謝謝”，後者表示“憐憫”），或故意在同一句話中使用同一個詞的不同含義，甚至是一組二元對立的含義，例如“hôte”既表示主，又表示客人（Derrida 1998，23）。其次，標題中的雙引號也是德里達故意為之。德里達在標題中給“relevante”一詞加上了雙引號，實際上在法語中是不存在雙引號的，承擔雙引號功能的標點應寫為書名號的形式。在演講中，標點符號本來就是無法通過聲音來辨別的，雖然可以通過比手勢來

“翻譯”標點，但是一個原本在法語中就不存在的標點該如何翻譯呢？

這正是德里達“抵抗”翻譯的一種策略，也為聽眾的理解增加了很大的難度，可見他請求聽眾（即主人）原諒自己（即客人）沒有講一種“清晰透明、因而沒有含混的語言”（德里達2005，148）只不過是一種姿態而已。他感謝主人的熱情好客，然而又質疑這種好客之道，因為客人來到主人的地盤上就不得不說一種對主人而言是清晰透明的語言——唯一的屬於主人的一種語言。德里達曾指出，在拉丁語中 *hostis* 這個詞是“好客”（*hospitality*）和“敵意”（*hostility*）的共同詞根（Derrida 2000a，45）。對於新到達者而言，好客也使敵意成為了必要。“好客”這個概念假設了本國的主人（公民）與外國的客人（移民者）之間的差別關係。因為客人受到主人殷勤相待的前提，是被當作一個外來者，一位陌生人，並不完全屬於這裏（Claramonte 2014，251）。如果我們的歡迎是建立在要求客人接受我們的地盤的規則、語言以及價值觀時，好客會使他者更加遠離我們（Derrida 2000b，8）。事實上，好客有意無意地與敵意相聯系，因為如果我們表現得好客，是因為我們認為他者是錯置的，他者不屬於我們的地盤，但必須遵守我們的規則。語言問題以各種方式牽涉到好客的經驗之中。邀請，接待，避難和留居，都是通過語言或通過對他人講的語言進行的（德里達2008，133）。德里達認為“好客”（*hospitality*）與翻譯相關，翻譯是“一種神秘的現象或好客的經驗”（Derrida 2000b，6），因為它既邀請客人進入主人的地盤，又要求客人必須說主人的語言。實際上，德里達認為也許最好的定義我們對陌生人好客的真實情況的詞語是“*hostipitality*”，因為這個詞合併了詞根“*hostis*”（客人）和“*hospes*”（主人）（Claramonte 2014，252）。

既然德里達在講演之初就宣告了標題的不可譯性，那麼是否此標題就真的不可譯呢？一切答案皆在“*relevante*”一詞。該詞在文本的意義鏈條上不斷滑動，最終滑向開放的終點，即“揚棄”之意。筆者認為，德里達講座標題中“*relevante*”一詞，是德里達有意拋出的一個引子，用以吸引聽眾的注意力。“*relevante*”一詞蘊含著無窮的意涵，其詞源在法語、英語與德語之間模糊難辨，對任何將其譯為單一“清晰自然”語言的嘗試構成了挑戰（Ertel 2011，13-14）。鑒於聽眾是法國文學翻譯者，那麼德里達拋出聽眾可能關心的“*relevante*”一詞，看似在談論什麼是“關聯的/好的”翻譯，實則核心在於將自己的翻譯觀與其整體的哲學觀相印證。

對讀者而言，德里達對“*relevante*”翻譯的態度難以確認之處，在於他的行文策略和文本意義的構成方式。他利用本身就超越了辭彙單義的邊界，甚至超越了語言邊界，包含著巨大的混雜性的“*relevante*”等辭彙，來揭示這種語詞所具有的混雜性和超越的可能性。而翻譯，恰恰是將這種平時隱而不顯的混雜性和超越之可能性揭示出來的契機。所謂抵抗翻譯，召喚翻譯，乃是這種混雜性所提出的挑戰，也是這種潛在的和超越的可能性發出的召喚。德里達的最終目的是提出翻譯具有“超越限定”的可能性：翻譯總是一種揚棄。用“揚棄”來對譯“*relevante*”並解釋翻譯時，好處是可以揭示德里達與黑格爾的思想關聯，凸顯翻譯與哲學的同構性；弊端是使這個術語過度哲學化，從而丟失了日常語境中的“恰當的、相關的”含義。

五、結語

本文將德里達 “Qu’est-ce qu’une traduction ‘relevante’?” 一文的標題創造性地譯為 “何為 ‘揚棄’ 的翻譯? ”，從理據上聯系德里達的文本來把握他對翻譯的整體理解：翻譯是對原文的一種揚棄，在否定之否定這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意義不斷增補和延異。“揚棄的” 翻譯觀是對於譯者倫理的解放，譯者應該接受翻譯是一種 “揚棄” 的過程，既不對原文亦步亦趨，也不對原文隨意改變。

基金資助：

本文所涉研究由 2024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西部青年項目《龐德〈詩章〉中的譯創融合研究》（項目編號：24XJC740004）資助。

注釋

[1] 鑒於標題中的所有文字及標點符號都暗含意義，此處完整地保留了標題中的文字和標點符號。

參考文獻

- Batchelor, Kathryn. 2023. “Re-Reading Jacques Derrida’s ‘Qu’est-ce Qu’une Traduction “Relevante” ’?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29 (1): 1-16.
- Bolduc, Michelle. 2023. “The Relevance of Derrida’s Translation: Mercy and Ethos.” *The Translator* 29 (4): 449-463.
- Cai, Wei, and Yang Zhang. (2025). “Reexamining Derrida’s Deconstructive Translation Thou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ce’.” *Trans/Form/Ação: Unesp Journal of Philosophy* 48 (3): 1-14.
- Claramonte, M. Carmen África Vidal. 2014. “Translating Hybrid Literatures from Hostipitality to Hospita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18 (3): 242-262.
- Davis, Kathleen. 2001. *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Derrida, Jacques. 1979. “Living On.” In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edited by Harold Bloom, Paul de Man, Jacques Derrida, Geoffrey Hartman, and J. Hillis Miller, 75-176.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 Derrida, Jacques. 1985. *The Ear of the Other*.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Derrida, Jacques. 1998. “Qu’est-ce qu’une traduction ‘relevante’?” In *Quinzièmes Assises de la Traduction Littéraire (Arles 1998)*, edited by Claude Ernoult and Michel Volkovitch, 21-48. Arles: Actes Sud.
- Derrida, Jacques. 2000a. *Of Hospitality*. Translated by Rachel Bowlb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rrida, Jacques. 2000b. “Hospitality.” Translated by Barry Stocker and Forbes Morlock. *Angelaki* 5 (3): 3-18.
- Derrida, Jacques. 2001.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Lawrence Venuti.

- Critical Inquiry* 27 (2): 174-200.
- Ertel, Emmanuelle. 2011. "Derrida on translation and his (mis)reception in America." *Trahir* no. September: 1-18.
- Levine, Michael G. (2022). "Translation, transference, trouvaille: Derrida's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Diacritics* 50 (3): 4-28.
- Pym, Anthony. 1995. "Doubts about deconstruction as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 *Tradterm* (2): 11-18.
- Trüstedt, Katrin. 2019. "Derrida's Shylock: The Life and the Letter of the Law." In *Administering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Peter Goodrich and Michel Rosenfeld, 168-186.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Venuti, Lawrence. 2001. "Introduction." *Critical Inquiry* 27 (2): 169-173.
- Venuti, Lawrence. 2019. *Contra Instrumentalis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本雅明著，陳永國譯。2005。〈譯者的任務〉。陳永國編，《翻譯與後現代性》，3-12。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蔡新樂。2007。《相關的相關：德里達“‘相關的’翻譯”思想及其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德里達著，陳永國譯。2005。〈什麼是“確切的”翻譯？〉。陳永國編，《翻譯與後現代性》，147-170。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德里達著，張寧譯。2001。《書寫與差異（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德里達、杜弗勒芒特爾著，賈江鴻譯。2008。《論好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恩格斯著，吳亮平譯。1930。《反杜林論》。上海：江南書店。
- 恩格斯著，吳亮平譯。1940。《反杜林論》。上海：生活書店。
- 高乾。2014。〈本雅明與德里達翻譯觀之辨〉。《中國翻譯》3：25-29+128。
- 韓子滿。2009。〈解構主義翻譯理論的論爭與接收——以“確當的”翻譯為例〉。《外國語文》1：127-132。
- 黑格爾著，楊一之譯。2004。《邏輯學（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
- 金兵。2006。〈論德里達的“確當的翻譯”〉。《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75-79。
- 李永傑、潘沁。2021。〈揚棄概念在漢語語境中的生成與詮釋〉。《中共福建省委黨校（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13-20。
- 梁心愛。2012。〈從德里達的“Relevant 翻譯”思想談《理智與情感》的翻譯〉。《長春理工大學學報》3：80-81+122。
- 劉軍平。2009。〈德里達解構主義翻譯理論的六個維度及其特點〉。《法國研究》3：1-10。
- 劉全福。2006。〈詩意的暢想：在可譯性與不可譯性之間——德里達關聯翻譯概念考辨及誤讀分析〉。《外語研究》6：59-61。
- 馬克思、恩格斯著，博古譯。1943。《共產黨宣言》。延安：延安解放社。
- 馬克思、恩格斯著，陳望道譯。1920。《共產黨宣言》。上海：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

- 馬克思、恩格斯著，成仿吾、徐冰譯。1978。《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
- 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0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孟憲清。2015。〈論德里達對胡塞爾“語音中心主義”的解構〉。《江海學刊》6：56-61。
- 錢鐘書。2015。《錢鐘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40冊）》。北京：商務印書館。
- 孫志祥。2008。〈德里達晚年翻譯思想發生過轉變嗎？——從《何謂“確當的”翻譯》一文談起〉。《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76-79。
- 王東風。2004。〈解構“忠實”——翻譯神話的終結〉。《中國翻譯》6：3-9。
- 王寧。2005。〈德里達與翻譯理論的解構——悼念一代翻譯理論宗師德里達〉。《中國翻譯》1：45-47。
- 王穎沖。2011。〈再論德里達的“relevant” translation〉。《中國翻譯》5：11-19+96。
- 俞吾金。2011。〈“消滅哲學”還是“揚棄哲學”？〉。《世界哲學》3：49-59。
- 張霄軍。2010。〈德里達翻譯思想：回歸、轉變還是其他？〉。《外語研究》2：77-81。
- 趙敦華。2001。《現代西方哲學新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從譯作副文本看《人面桃花》在英語世界的話語言說與形象 建構

劉文傑¹ 孫會軍²

Address: ^{1,2}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E-mail: ¹18801794749@163.com

Correspondence: Wenjie Liu

Citation: Liu, Wenjie, and Huijun Sun. 2024. "Meaning Making and Image Building through Paratextual Means – with the English Version of *Peach Blossom Paradise* for a Case Study." *Translation Quarterly* 114: 13-26.

Abstract

Meaning Making and Image Building through Paratextual Means – with the English Version of *Peach Blossom Paradise* for a Case Study (by Wenjie Liu and Huijun Sun)

*Whether a translation can be so well received in the target culture as to present to the English readership a good literary image of the fiction in particular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s a whole depends to a large extent on the charm of the translated novel, the depth of thinking and narrative content and of the novel, the translator's aesthetic sensibilities, and the overall artistic quality of the translation. Meanwhile, we should als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aratexts of the translated novel, since the title, the front cover, the back cover, the preface, annotations, interviews and correspondences of the translator, as well as readers' reviews are also parts of the style of the translated version, making meaning and building image alongside the translated version itself.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ocus on how the paratexts of the English version of *Peach Blossom Paradise* constitute a discursive field surrounding the work itself and what kinds of novel image they have forged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potential readers. It is found that while agents of all descriptions in the English world appreciate the novel's humanistic value and artistic features, they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novel's role as historical records, it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Chinese politics, society, revolution and its relevance to reality. Various paratexts which are provided by the translator, the editor, the publisher and the readers have represented the humanistic and artistic value of *Peach Blossom Paradise*, but in the mean time frame it into a work with historical, cri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paratextual readings and interpretations, contributing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novel in English world, constitute a discursive field, providing a stage for meaning making and image build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一、引言

作為中國當代先鋒寫作的代表人物，格非早期以其“博爾赫斯式”的實驗敘事手法創作了眾多先鋒小說。20世紀90年代起，其作品開始向傳統與古典回歸轉型，而《人面桃花》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代表。

格非小說在英語世界的呈現方式共有三種：其一是其7部中短篇小說被收入由華裔學者或西方漢學家編纂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作品選集中；其二是其4部中短篇小說刊載於英語世界學術期刊 *World Literature Today* 以及《人民文學》英文版雜誌 *Pathlight* 上；其三則是其3部中長篇小說以單行本形式被譯介到英語世界，分別為《褐色鳥群》(*Flock of Brown Birds*, 2016)、《隱身衣》(*The Invisibility Cloak*, 2016)、以及《人面桃花》(*Peach Blossom Paradise*, 2020)。其中，《人面桃花》是2015年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江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也是格非創作轉型後“新古典敘事”的代表作。該小說於2020年由青年漢學家莫楷(Canaan Morse)譯成英文，由紐約書評出版社(New York Review Books)於2020年出版，並於2021年入圍了美國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翻譯文學獎決選名單，這也是中國文學作品首次入圍該獎項。該書現已被英語世界252家圖書館收藏，並分別在美國亞馬遜網站和Goodreads網站獲得4.5星和4.06星(總共5星)的好評。西班牙知名作家恩裡克·維拉-馬塔斯(Enrique Vila-Matas)曾指出，“不深入格非的世界，就無法深入當代中國文學的深處”(Ge and Morse 2020)，格非作品在海外文學界的認可度由此可見一斑。

瞭解他者如何闡釋和定位中國文學作品，不僅使我們有機會瞭解他者的文化心理，而且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瞭解本民族的文化。正如格非在與李洱的對談中所言，“我們認識中國文化，如果沒有西方這個他者的存在，是根本不可能認識清楚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他者’的在場，反過來有助於理解我們自身”(格非等2018)。那麼，英語世界包括譯者、編輯、出版商、專業讀者和普通讀者在內的“他者”具體是如何闡釋和定位《人面桃花》這部作品呢？他們的闡釋與言說又塑造了怎樣的小說形象？這對潛在讀者的閱讀和作品的傳播會產生何種影響？筆者將從譯作副文本的角度切入分析。

“副文本”這一概念由法國敘事學家、文學理論家熱奈特(Gérard Genette)於1979年首次使用。根據所處位置的不同，熱奈特將副文本劃分為內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其中內副文本是文本內部呈現的資訊，包括封面、封底、標題、副標題、前言、出版資訊、附錄、注釋、插圖等，而外副文本是文本外部呈現的資訊，指外在於整書成品的、由作者與出版者為讀者提供的關於該書的相關資訊，包括訪談、評論、日記、通信等(Genette 1997, 1-15)。副文本圍繞並伴隨著正文本，補充甚至強化正文本，它協調的是譯文的正文本和譯文讀者之間的關係(耿強2016, 105)。Kathryn Batchelor認

為，“副文本包含文本評價、將文本呈現給讀者以及影響文本如何被接受的元素。副文本是為文本有意打造的門檻，可以影響到文本的接受”（Batchelor 2018, 12、142）。她將 Rockenberger 對副文本功能的分類應用到翻譯研究中，認為“副文本具備闡釋性、評價性、商業性及引導性，可以闡釋和評價作品的特徵、價值及文化意義，引起讀者的注意，引導、促進作品的接受”（Batchelor 2018, 160–161）。雖然 Batchelor 的理論為研究翻譯中副文本的運作提供了可參考的研究框架，但其對翻譯語境下的副文本與非翻譯語境下的副文本功能差異，探討尚顯不足。本文將在此理論基礎上，著重探討翻譯特有的動態性對翻譯語境下副文本運作特殊性的影響。雖然譯作的副文本，如封面、序言、書評等在形式上與非譯作相似，並共用一些基本功能，如闡釋與定位文本、引導讀者閱讀等，但翻譯行為涉及跨語言與跨文化的轉換，譯本的運作中會牽涉到比非譯作更多的行為主體，如譯者、譯作出版商、譯作書評人等，這些行為主體極有可能賦予這些副文本元素以獨特的維度與功能側重點。例如，在文化仲介層面，譯作的副文本，如譯者序、譯作封面圖像與宣傳語、譯作注釋、分類標籤、譯作書評往往承擔著比非譯作更顯性的文化解釋與調適功能。它們不僅介紹內容，而且主動架設溝通的橋樑或過濾差異，引導譯入語讀者理解源語文化中的特定概念、歷史背景或價值觀念等，這種“仲介”本身就是翻譯副文本的獨特功能之一。

此外，譯者的可見性問題在譯作副文本中尤為凸顯。譯作副文本成為譯者宣示其主體性、闡釋其翻譯策略、甚至與作者或讀者對話的關鍵場域，這和非譯作副文本由作者主導的情形完全不同。譯者序、後記、注釋甚至譯者姓名在封面/扉頁的顯著程度，本身就是一種強有力的副文本陳述。除此之外，譯作出版商通過副文本，如封面圖像設計、標語、分類標籤、推介語等對文本“異質性”進行框定，是譯作區分於非譯作所獨有的重要的功能。出版商可能通過圖像與分類強調文本的“異域風情”，迎合譯入語讀者對異域的想像，也可能通過包裝與宣傳淡化原作的“異質性”，從而靠近譯入語文化的詩學規範和讀者的審美旨趣。這種對“源語文化身份”的標記、強調或隱匿策略，為譯入語讀者構建了外來文本的文化身份與價值定位，預設了其閱讀與認知路徑，直接影響了讀者的預期和接受方式，是區別於非譯作副文本的功能。由此可見，考察文化仲介、譯者可見性、異質性框定等翻譯特有的動態因素，有助於更加準確地描述譯作副文本的功能，也可以鞏固副文本理論在翻譯學領域的理論基礎。這種基於翻譯動態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譯作副文本作為“文化仲介”的獨特價值——它既是文本意義的闡釋載體，亦是文化權力的運作場域，更是市場接受的塑形工具。

之所以選擇《人面桃花》譯作副文本作為本文的研究焦點，其一在於《人面桃花》是格非創作轉型之後的“新古典敘事”的代表作，也是格非首部探索中國現代性起源的小說，其文學性、美學性及思想性均與此前的“先鋒”作品有較大差異，而且也是首部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的中國文學作品；其二在於與此前格非小說譯本的副文本不同，《人面桃花》譯作行為主體合力打造的各類副文本既凸顯了小說的“東方情調”與“中國性”、又強調了小說的普世性主題與政治批判性，與此同時還關注小說自身的歷史意義、人文及美學價值，這些副文本策略符合譯入語讀者的東方想像、審美旨趣、

閱讀期待以及文化心理，也為其預設了認知框架與路徑，促進了小說在譯入語文化場域中的傳播與接受。接下來，本文將具體分析《人面桃花》英譯本的封面、封底、譯者序言、訪談通信以及讀者評論等副文本，尤其關注這些文本如何形塑格非及其作品在英語世界的文化地位、作品形象及其傳播作用。

二、譯作內副文本

2.1 譯作標題、封面、封底

譯作標題、封面及封底是譯作內副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體現了譯者、編輯、出版商對作品的定位與形象的建構，也可以起到引導讀者的閱讀的作用。

原作標題《人面桃花》源於典故“人面桃花”。該成語最早出自于唐朝孟棨的《本事詩·情感》（王濤 2008，578）。唐人崔護題詩于長安城南一桃花繞宅門扉，“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只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王濤 2008，578）。後來，該成語用來形容偶然邂逅到某種美好事物，而當自己刻意追索時，卻已不可復得。格非將此成語作為書名，同樣包含著類似的情感。《人面桃花》這則故事發生在清百日維新時期，小說裡的主要人物，無論是被清廷罷官的秀米之父，還是金蟬党人張濟元及同黨，抑或是花家舍的眾盜匪以及後來建立革命黨人學校的秀米本人，其努力的初衷都意在建立桃花源般的烏托邦大同世界。但遺憾的是，他們的努力最終都以失敗告終。值得一提的是，“桃花源”貫穿本書的始終，無論是小說開篇中秀米之父視若珍寶的《桃源圖》以及他固執地將普濟視為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將村前的大河視為武陵源的想法，還是小說中篇秀米被綁架到的花家舍——一處眾盜匪首領努力打造、最終卻因其自相殘殺而遭毀滅的世外桃源之地，抑或小說末篇秀米逃回普濟後試圖啟民智建立桃花源般大同世界的理想與努力，“桃花源”亦真亦幻，始終都是不同社會身份的個體孜孜以求的目標。所以，書名中的“桃花”實際上與“桃花源”中的“桃花”有著相似的意味，都預示著轉瞬即逝、可望不可即的桃花源烏托邦理想。莫楷並未將其直譯為 *Peach Blossom Spring*，而是將其譯為 *Peach Blossom Paradise*，一方面，“Peach Blossom”（桃花源）保留了中國元素，具有東方情調和異域色彩，可以滿足西方讀者對東方的異域想像；另一方面，paradise 可以讓西方讀者聯想到《失樂園》（*Paradise Lost*）這一文學經典，通過“烏托邦幻滅”的敘事母題與西方讀者建立審美共鳴。

此外，編輯與出版商共同設計的英譯本封面、封底不僅具象化了小說的主題，同時也強化了視覺異質性，不僅可以滿足譯入語讀者的東方想像，而且也符合他們的期待視野。出版商採用古典設計範本，將譯作封面設計為一幅典型的中國水墨畫。封面圖像分為洞內洞外兩個部分，洞內一片世外桃源欣欣向榮的景象：綠樹成蔭、桃花茂盛、水面開闊、旭日東昇，充滿希望；洞外則是一片黑壓壓暗無天日的場景，觀之令人窒息。這種“洞內桃源/洞外黑暗”的二元構圖，以及洞內洞外色彩的強烈反差，既具象化了原作“烏托邦幻滅”的主題，又暗合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中“光明/黑暗”的隱

喻，暗含了對中國政治的批判，有一定的意識形態色彩。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封面將原作核心意象“桃花”這一象徵“革命理想與幻滅辯證關係”的文學隱喻簡化為東方美學符號，凸顯了視覺異質性。不論是水墨畫的整體設計、還是對“桃花意象”的簡化，都滿足了譯入語讀者對“東方情調”的想像；二元構圖對“烏托邦幻滅”主題的凸顯，則符合西方的主流詩學規範，以更好地引起西方讀者對作品的共鳴；構圖所暗含的對中國政治的批判，則強化了西方自身的優越性，迎合了讀者的西方中心主義思想，這些都使得小說作為“文化他者”更易被西方市場接納。同時，封面右上角還有一枚圖書的徽章，上面寫著 NATIONAL BOOK AWARD FINALIST（美國國家圖書獎終選名單），意在強調小說在英語世界的受認可度與影響力，在彰顯作家與小說象徵資本的同時提升了文本的經典性，為小說進入西方讀者的視野進行了背書。

此外，小說封底的推介語介紹了小說的政治歷史背景，“1898年，中國改良派知識份子說服皇帝將僵硬的帝制改良為繁榮的現代政體。隨之而來的百日維新成為了能夠帶來空前絕後改變與無盡希望的一場運動，但它卻因一場流血的軍事政變而突然結束。破滅的希望推動了中國歷史即將發生的革命轉折，也導致不久之後數百萬人的喪生。《人面桃花》這則故事正是發生在這一改良時期”（Ge and Morse 2020）。推介語將該虛構故事置於1898年百日維新和戊戌變法失敗這一真實歷史節點，使讀者明白該小說並非架空寓言，而是根植於中國近代化的歷史進程，為讀者解讀故事提供了歷史密碼。與此同時，推介語簡要闡釋了小說的內容，“出現在普濟的神秘人胸懷天下，意在將中國改造為人人平等的烏托邦，並不惜一切代價要付諸實現。其計畫敗北後，秀米開始拿起武器，反抗視女性為奴的儒家世界。她主張革命，並努力成為自己身體與命運的主人，但這一切卻因主張建立烏托邦的男人們的空想而變得岌岌可危”（Ge & Morse 2020）。推介語先後提及者有二：1、書中神秘人意欲改造中國卻最終失敗；2、極具女性反抗意識的女主人公在男權社會中的作為與處境；不僅強調了小說的烏托邦實踐與性別反抗敘事，也凸顯了個體局限性這一母題。個體所受到的局限，不論是宏大歷史語境下微小個體為變革社會而不懈奮鬥卻受到阻撓的主題，還是個體烏托邦理想最終幻滅的現實、以及女性個體在兩性權力不平等社會中個人意識覺醒卻最終受限的處境，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問題，也是世界各民族和人類普遍共同存在的問題。文學即人學，關注人類的命運與個體的成長。編輯和出版社在小說的封底正是強調了小說中個體在宏大歷史語境和權力關係中所受到的局限性這一主題，可以引起英語世界潛在讀者對小說主題的共鳴。封底的推介展現了作品對中國歷史進程及歷史洪流中個體命運的關注，塑造了具有歷史意義和人文價值的小說形象。

此外，紐約書評出版社將該書貼上“亞洲文學”“歷史小說”以及“國際文學”的標籤，並將其納入“經典叢書”（NYRB Classics），這在提升作品權威性的同時，也將其納入西方經典譜系，肯定了小說的價值。

由此可見，譯者與出版商所打造的標題重構、圖像敘事、獎項標識、分類標籤、封面宣傳語等副文本建構了小說作為一部具有歷史與人文價值且在譯入語世界有一定分量的烏托邦主題異域作品形象，不僅滿足了譯入語讀者對“東方情調”的想像，也迎合了譯入語的詩學規範與讀者的審美旨趣；出版商打造的譯作封面在一定程度上體

現和迎合了讀者的西方中心主義思想，這些都讓小說更易被西方市場接納。

2.2 譯者序言

譯者序跋是譯作內副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助於譯入語讀者更深刻地瞭解小說的歷史背景、主題意義及作品價值等，也有助於塑造作品在譯入語世界良好的作品形象。在《人面桃花》英譯本的序言中，莫楷指出，“小說呈現了中國的一小段歷史，在這一時期，延續千年的封建王朝政府名存實亡，但我們通常編入中國現代史中那些聞名於世的宏偉事件發生的時期（共和時期、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時代、文化大革命時期以及經濟改革時期）都還尚未開始。1898 年百日維新至 1911 年清王朝覆滅之間的這段歷史，讓這部小說充滿了可怖之感，這會讓讀者凝神屏息，也會讓他們感覺像在經歷暴風雨前夕的寧靜”（Ge & Morse 2020）。不難看出，譯作序言簡要介紹了小說的歷史背景，也說明了該小說與之後的重大歷史事件之間的內在聯繫，充分肯定了小說的史料價值，同時也強調和預設了讀者的閱讀體驗，從而從側面突出了小說的震撼力和藝術感染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引導潛在讀者閱讀的作用。

同時，莫楷也在序言中專門提到了調整文內注釋位置這一情形，“作者按照中國小說的傳統，將注釋放在小說正文中。譯文則將它們作為章節附註呈現”（Ge and Morse 2020）。經筆者統計，小說原作中共出現七次文內添加解釋說明的情形，即在文中提到《桃源圖》、皂龍寺、薛祖彥、小驢子、譚功達以及兩次重要的事件的時候，作者在行文中添加了一些背景資訊。添加的背景資訊放在正文中，用括弧括起來，字體也與正文有所不同，以示區別。原作作者以這樣的方式介紹了這段歷史上的一些真實事件與真實人物，將其插入虛構作品的正文當中，帶給讀者一種亦真亦幻的感覺。莫楷在翻譯過程中將這些添加的歷史資訊調整為了章節附註，並在序言中充分肯定了文內注釋的史料價值與重要作用，“作者將虛構與歷史交織在一起，並在小說中插入一些資訊，用以呈現 20 世紀風捲殘雲的中國史中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地點與人物（包括其人生與命運）”。由此可見，譯者認為小說對譯入語讀者瞭解 20 世紀的中國歷史大有裨益。譯者對小說的歷史價值的推崇與認可，不僅有助於吸引潛在讀者的閱讀，也有助於建構小說的正面形象。需要指出的是，將這些原作中添加的歷史資訊在譯作中改為章節附註，雖然確保了譯入語讀者閱讀的流暢性，但割裂了原作歷史與敘事的共生關係。

縱觀《人面桃花》包括標題、封面、封底、譯者序言等在內的英譯本內副文本，不難看出，包括譯者、編輯、出版商等在內的一系列行為主體都對小說的史料價值、人文價值以及藝術特色進行了較高的評價，這不僅有助於吸引潛在讀者閱讀小說，也有助於在譯入語世界建構充滿史料價值、人文價值及藝術特色的作品形象。除了譯本的內副文本外，一系列外在於整書成品的任何文本評價也會影響到作品形象在異域的建構以及潛在讀者的閱讀。那麼，英語世界圍繞《人面桃花》譯本展開的外部文本評論又有哪些呢？它們對引導潛在讀者閱讀有怎樣的作用和影響？筆者將從譯者訪談與讀者評論兩個方面著重展開。

三、譯作外副文本

3.1 譯者訪談

訪談也是外副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歷史學家 Anthony Seldon 列舉了訪談的三個重要益處：“它讓我們瞭解主體對於人物與事件的觀點；它有助於闡釋文本；此外，它能給我們提供新的材料和其他幫助”（Seldon 1996, 353-365）。作為文化傳播的載體，譯者不僅需要對原作的字詞語句進行反復斟酌考量，同時也要對原作的社會歷史背景、主題思想、內涵意蘊有較深入的研究，訪談內容對作品具有一定的闡釋性與評價性，對作品在譯入語世界以何種形象進行呈現與建構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同時，作為推介作品的一種商業性模式，訪談可以引起潛在讀者的注意力，具有一定的商業性與引導性。

在一篇接受美國 *The Literary Tourist* 雜誌主編 Andrea Gregovich 的訪談中，莫楷提到，“格非早期的先鋒實驗小說深受美國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由此，他名聲大振，但他後來的小說更加個性化”（Gregovich and Morse 2016）。《人面桃花》作為格非轉型之後的作品，在敘事特色與主題上都與其前期的小說相去甚遠，譯者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將“個性化”的標籤貼在其後期的小說上，有助於引導譯入語讀者關注格非後期寫作的“個性化”維度，從而產生對其後期作品風格轉變的閱讀期待。至於作家的風格和作品如何有個性，莫楷曾談道，“格非是我讀到過的最言簡意賅的中國作家之一。他能將眾多包含感官資訊的情節編織為一小段文本，這一點令人震驚，這讓讀者的感官體驗更加豐富”（McEvoy 2022）。莫楷向讀者指出了格非獨特的創作風格，即極高的語言密度與感官意象的密集交織。通過強調這種區分於其他作家的語言特質及其帶給讀者的獨特體驗，他強調了格非小說中所特有的感官現代性及美學感染力，引導譯入語讀者在閱讀作品時，特別留意文本如何通過精煉的語言引起多重感官體驗，從而更好地感受小說的美學特質。此外，在一篇關於《人面桃花》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終選名單的訪談中，當莫楷被問及格非最好的作品及其內容時，他認為非《人面桃花》莫屬，“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人面桃花》不容錯過。它講述了世界大多數人——包括中國人自己——已然忘卻的一段歷史。人人皆知孫中山在 1911 年發動了民族運動，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並建立了中華民國。然而，鮮有人知道在 1898 年近 100 天的日子裡，一群受西方思想啟發的知識份子，想要在一夜之間將中國變為人人平等的天國。他們相信可以以儒家的模式建立強大的聯合政體，那裡人人權利平等、科學與民主盛行。然而，這種實驗最終以完全失敗告終。人們幾乎忘記了這段歷史，而《人面桃花》則是這段意義非凡的歷史的印證”（Koldas Dec 8, 2021）。在譯者看來，《人面桃花》不只是一部文學經典，也印證了一段中國歷史，這種史料價值讓這部小說意義重大。他認為閱讀該小說可以填補歷史認知空缺，這不僅可以引導譯入語讀者關注小說的歷史維度，也為讀者理解文本的思想深度提供了必要的歷史背景。與此同時，譯者將該書定位為“文學經典”與“歷史印證”，引導讀者對小說產生“既有文學高度、又有歷史見證意義”的閱讀期待。除卻歷史意義之外，莫楷也強調小說的文學、美學價值與思想性，他認為，“作為中國首屈一指的作家，格非的創作有種鋒

利的美感，這種美感源於他本人成熟深邃的思想、對美學的嚴謹態度以及他對神秘感的非凡鑒賞能力，這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是無與倫比的”（Koldas Dec 8, 2021）。他特別指出了作家創作的“神秘感”，暗示文本可能存在的闡釋難度與多義性，引導讀者預期並接納敘事中的模糊地帶，並將其視為作者的美學策略和思想深度的體現。

莫楷對《人面桃花》的評論與闡釋強調了小說的感官現代性、美學感染力、歷史意義以及闡釋的複雜性，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引導框架，塑造英語讀者對《人面桃花》的閱讀預期，並為其理解這部蘊含豐富文化歷史密碼與獨特美學追求的中國當代小說搭建了認知橋樑，從而促進小說在譯入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這些評論將小說構建為具有“現代性、美學性與歷史意義”的作品，與封面、序言等“內副文本”既相互配合，共同影響《人面桃花》在譯入語市場中的形象定位與讀者接受。

3.2 讀者評論

讀者評論也是外副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讀者評論，我們可以瞭解讀者從何種角度對譯作作出何種闡釋與評價。根據專業度劃分，讀者一般可以分為兩類：專業讀者（譯者、編輯、出版商、作家、漢學家、學者等）和普通讀者。為吸引讀者閱讀興趣、提升譯作銷量，出版商往往邀請專業讀者在具有影響力的報刊雜誌上撰稿評論譯作，專業讀者的評論往往會影響到潛在讀者對作品的閱讀，他們對小說的言說也影響著小說在海外的形象。鑒於《人面桃花》譯者、編輯、出版商對原作的評論與推介在上文中已詳述，下文不再贅述。

3.2.1 專業讀者的闡釋與推介

3.2.1.1 小說的文學性與藝術特色

首先，西方專業讀者對《人面桃花》的敘事風格和詩學特徵給予了較高的評價，他們將關鍵字聚焦在“神話敘事與歷史敘事相融合”“歷史傳奇敘事”“史詩性”“神秘性”“兒童視角敘事”“情節曲折”“語言簡潔優美”上，對小說的文學價值與藝術特色進行了較高的肯定，塑造了充滿文學藝術性的小說形象。他們的評論話語通過聚焦小說的敘事技巧與詩學特徵，共同塑造了小說在英語世界的接受框架。

美國《每月公開信》（*Open Letters Monthly*）雜誌主編兼《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小說記事”專欄作家 Sam Sacks 評價了小說的敘事風格，認為“格非後期的作品向社會現實主義和歷史傳奇敘事轉變，並保留了小說的神秘性和荒誕色彩，《人面桃花》亦是如此。這部小說具備傳統歷史小說中人物眾多、背景凸顯、情節曲折的特徵，但對夢境及幻想的癡迷，則賦予了它超世俗的神話傳說的感覺，小說的部分章節採用兒童視角敘述保持了故事的神秘氣氛”（Sacks Dec 18, 2020）。不論是前期抑或是後期，格非小說中的“敘事迷宮”及其神秘與荒誕性一直是其作品的文學與藝術特色，並為讀者所津津樂道。Sam Sacks 將文本定義為“歷史傳奇”與“超世俗神話”的共生體，製造“亦真亦幻的感官謎題。這種對“神秘感”“荒誕色彩”“夢境”“幻想”“超世俗”“兒童視角”的強調，潛在地將小說的敘事世界定位於一個與讀

者自身文化經驗顯著不同的“他者空間”，啟動了東方主義話語中關於“東方”神秘、非理性、超脫現實的印象，迎合了潛在讀者對異域文化的想像與期待。他認為，“這段情節曲折的史詩故事，呈現在歷史書上遠不如呈現在這部亦真亦幻的小說中來得有趣迷人”（Sacks Dec 18, 2020），一方面，肯定了這部小說歷史座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小說獨樹一幟的敘事風格。其他幾位評論者對小說敘事風格與藝術特色的鑒賞與 Sam Sacks 類似：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 Jeffrey Wasserstrom 認為這部小說“虛構的人物完成了平行時空裡 19 世紀 90 年代及 20 世紀初真正的革命人士所完成的事蹟，打破並重塑了眾多革命浪漫歷程”（Wasserstrom Mar 26, 2021），Wasserstrom 的“平行時空”解讀建構了小說對歷史的非傳統介入方式，暗示其並非簡單記錄歷史，而是通過虛構人物“打破並重塑”革命敘事，提供了一種具有文學想像力的歷史反思路徑。這在另外兩位評論者的評論中亦可見一斑：Nowruz Journal 雜誌主編 Mandana Chaffa 認為小說“將神話敘事與歷史敘事融為一體，故事中時間的推進有如蜂蜜流淌般緩慢，亦如雹暴般迅疾”^[1]，這暗示，小說的敘事節奏建構了一種富有張力和詩意的閱讀體驗；《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資深編輯 Alida Becker 認為這部小說是“對歷史、神話與虛構的巧妙融合”，甚至認為《人面桃花》之于作家格非的分量與意義非同一般，“正是《人面桃花》，讓格非的地位更上一層，也讓他成為中國 21 世紀最受尊敬的作家之一”（Becker Feb 10, 2021），以《紐約時報》權威為其全球經典性加冕。這種對“亦真亦幻”敘事風格的集體聚焦，建構了小說作為打破歷史寫實與文學想像界限的作品形象，它引導譯入語讀者將小說視為一種獨特的歷史敘述方式——既植根於特定歷史語境即中國革命，又通過神話、夢境、荒誕和兒童視角等元素，賦予歷史以更強的文學吸引力和異域特色，從而引導讀者的閱讀與接受。

除了敘事風格外，英語世界評論家也很關注小說的語言風格。美國小說家、散文家 James McElroy 指出小說“風格簡潔直接，語言隨性而又充滿詩意”（McElroy Dec 31, 2020），並將這部作品定性為“具有史詩意義的家族傳奇”（McElroy Dec 31, 2020），這一定性建構了小說的宏大格局、歷史分量以及其在描繪家族變遷上的深度與廣度，將其提升到具有經典潛質的層面；《紐約時報》資深編輯 Alida Becker 也稱讚了格非的文筆，認為“秀米企圖匡正時弊，洗清自己和他人遭受的冤屈的一系列場景，都被刻畫得惟妙惟肖，引人入勝”（Becker Feb 10, 2021），強調了語言在塑造人物和場景感染力上的作用；Mandana Chaffa 稱讚小說“情節複雜、語言美輪美奐”^[2]。小說的語言直接影響到作品的風格和文學形象，也最直接影響到讀者的閱讀感受，幾位元評論家對小說語言的剖析，不論是“簡潔”“詩意”“惟妙惟肖”還是“美輪美奐”，都是對這部文學作品語言風格的肯定，不僅構建了語言優美的作品形象，也有助於吸引潛在讀者的閱讀。這種對語言高度凝練與情感衝擊力的持續關注，建構了《人面桃花》獨特的語言美學形象，策略性地解碼、闡釋並重新編制了《人面桃花》的美學密碼，引起讀者對其形式層面的閱讀期待，為這部來自中國的文學作品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奠定了基礎。

由此可見，英語世界評論者關注小說亦真亦幻的敘事模式，聚焦小說中的“夢境”“幻象”“超世俗”“兒童視角”等神秘性元素，並反復強調其“史詩性”的宏

大格局與“詩性語言”的美學價值，既突出了小說的東方情調，也突出了小說的文學與美學價值。此外，亦真亦幻的敘事技巧也很容易讓西方讀者聯想到西方的魔幻現實主義創作手法。這些要素構建了一部代表中國當代文學高度、以獨特方式融合歷史與想像、語言簡潔且具有重要作家里程碑意義的作品，影響了作品在英語世界傳播的解讀方式。

2.3.2.1.2 小說的批判性與反思性

除卻對《人面桃花》文學性與藝術特色的關注之外，西方專業讀者對小說的批判性主題也進行了較多的分析，認為這部小說是對中國政治、社會與革命的歷史審視，小說被建構成一部具有一定批判性與反思性的作品。

Mandana Chaffa 認為，“小說建立在‘桃花源’傳說的基礎之上，預示著對烏托邦的追尋會帶來可怕的鎮壓、精神的錯亂甚至是理想的夭折……當權者，尤其是女性當權者，往往總是被戲弄。此外，當權者當政的時間也總是短暫的”^[3]；同時，他也進一步指出，“格非探索了 20 世紀初中國政治圖景的變遷。打著革命旗號的理想主義者對抗根深蒂固的統治階層，最終以失敗告終。但是，前者會在往後的年歲中取得成功，進而成為另一高壓專制統治政權。這種反復與重複，包括政權的交替、經濟社會等級制度以及權力結構的更迭，在書中佔據了十足的分量。”^[4] 從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中解讀出作品的政治色彩和批判意味是西方評論者的慣常視角，Mandana Chaffa 將小說視為對 20 世紀中國政治與社會的探索並認為小說總結了政權的更迭規律，認為小說是對中國政治與社會的歷史批判與反思。他將“桃花源”“烏托邦”“革命”等解讀為對中國政治的隱喻，將文本簡化為對“政權更迭規律”的印證，帶有歷史決定論色彩。這種解讀既受到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也印證了東方主義批評話語中的簡化傾向——將複雜的文學敘事等同為政治寓言。

除了認為《人面桃花》是對 20 世紀中國政治與社會的探索外，也有西方專業讀者認為這部小說是對中國革命道路的審視：James McElroy 認為小說並不推崇革命，他指出，“這部小說是對《桃花源記》的再述，並用這則古老的故事去審視 1911 年的中國革命。《人面桃花》在政治主張上是傳統和保守的。對格非而言，‘革命’一詞完全只有負面的內涵，革命只會引起混亂”（McElroy Dec 31, 2020），這種非黑即白的評判，暴露了他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美國威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教授兼《紐約客》（The New Yorker）副主編 Victoria Uren 則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認為，“《人面桃花》血腥、憂傷且振奮人心，它並未告知我們該如何去思考歷史；只是告訴我們，將革命評定為‘好’抑或‘壞’都不可靠”（Uren Jun 16, 2021），他雖指出革命評價的複雜性，但“血腥、憂傷且振奮人心”的表達仍將文本體驗停留在政治創傷敘事中。此外，Jeffrey Wasserstrom 將這部小說與政黨的目的論歷史觀聯繫起來，他指出，“小說關注了革命黨人理想未能實現的這一事實。小說結尾的注釋中闡明了一些歷史人物及其後代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的命運，有接受目的論歷史觀的姿態”（Wasserstrom 2021），用西方熟悉的“共產主義敘事”框架來強行解讀中國的文學文本，而不是討論格非對

歷史偶然性與個體命運的書寫。當他把小說結尾注釋與我黨的歷史觀關聯時，實際上在暗示文學文本必須回應政治現實，這種要求體現了西方對中國文學的特定期待。

英語世界專業評論家從這部小說中解讀出作者對中國社會、政治與革命的批判與審視，在一定程度上建構了批判性與反思性的小說形象。西方評論者的評論集中於小說的政治隱喻，如革命、政權更迭、烏托邦批判等以及歷史批判性，評論將複雜的文本簡化為“中國政治寓言”，體現並強化了西方對中國的刻板認知。這些解讀通過選擇性強調、意識形態投射、歷史嫁接等策略，以中國文學文本轉來驗證西方的政治認知，既體現了東方主義的認知慣性，又服務於西方中心主義。這是東方主義話語機制與市場選擇共謀的結果，即通過政治術語替換複雜的文學文本來將中國文學文本納入西方熟悉的批判敘事模式；此外，“中國政治寓言”更易在西方出版、評論並被讀者關注和接受。

2.3.2.1.3 小說的思想性與現實意義

除了認為《人面桃花》是對中國政治、社會及革命的審視外，也有西方專業讀者從大國關係的視角出發，挖掘小說的思想性與現實意義，認為小說給美國本土的文化革命及構建良好的中美關係提供了有益啟示，“在新一輪冷戰有可能出現的今天，這部歷史小說可以引起共鳴。閱讀這部中國文學作品，會令美國人受益。這則關於政權坍塌與政治烏托邦幻滅的故事能為思考如何構建良好的中美關係提供有益的框架”（McElroy Dec 31, 2020）。他還指出，“如今，華盛頓正不停地在美國煽動文化革命。意識到下一個十年將由中美關係來定義的美國人，應當花些時間閱讀中國文學。美國的小說不停煽動文化革命，《人面桃花》則在探索烏托邦主義的危害，並向那些試圖自毀家園的統治者提出了警告”（McElroy Dec 31, 2020）。在當今世界，大國關係佔據國際關係的主導地位，直接影響著全球局勢的演變，James McElroy 一再強調閱讀這部作品以及中國文學的重要性，認為這部作品對美國當政者如何鞏固統治以及如何構建良好的大國關係大有裨益，無疑是對小說思想性與現實意義的高度認可，不僅有助於引導潛在讀者閱讀，也建構了具有鮮明思想性和現實意義的小說形象。

可以看出，英語世界專業讀者從《人面桃花》的文學價值和藝術特色、小說對中國社會歷史革命的審視、小說與現實的關聯等方面對其進行了闡釋與解讀，總體而言，他們對小說的評價較高，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小說的文學與藝術特色，構建了具有批判性、思想性和現實意義的小說形象，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引導潛在讀者的閱讀。

3.3 普通讀者的評論

與專業讀者的評論一樣，普通讀者的評論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潛在讀者對小說的閱讀與作品的傳播。就《人面桃花》英譯本的普通讀者而言，筆者通過整理發現，在美國亞馬遜網站上，《人面桃花》英譯本平均下來得 4.5 星（其中 5 星占 66%、4 星占 21%），共有 36 條評論；另一大型網站 Goodreads 共有 486 位讀者投票，平均下來

4.06 星（其中 5 星占 34%、4 星占 40%），共 94 條評論。普通讀者的積極評價雖展現文本魅力，實則暴露西方受眾對中國當代文學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與認知範式。

部分讀者的評論延續了東方主義話語傳統，關注小說的異國情調，如讀者 Dree 評認為，雖然這部小說很現代，“但敘述方式與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與《西遊記》相互呼應”，將小說與古典情調對接；讀者 L.S. Popovich，認為這則故事充滿了“民間傳說的魅力”，“詭異離奇而又變化莫測”，將這部革命史詩簡化為“民間奇觀”。也有讀者受到冷戰思維解讀框架的影響，將文本簡化為政治隱喻的載體，如讀者 P.Friel 認為小說有批判政治行為的意味，他提到，“一種強烈的不穩定性在秩序與混亂、烏托邦與幻滅間擺動。小說人物引人入勝，多數女性的經歷令人可怖，或許這意味著政治行為所帶來的危害”，將女性處境與政治危害掛鉤；讀者 L.S. Popovich 認為，小說通過“諷刺與寓言的方式討論了女性角色與文化革命”，將小說簡化為政治寓言。此外，也有少部分讀者關注到小說的語言形式和敘事風格，如讀者 Areeb Ahmad 認為，“格非將歷史與虛構交織在一起，創造了一部極富深度且極其敏銳的小說。格非的文筆沉靜而又精緻華麗，故事節奏不疾不徐”。

由此可見，英語世界普通讀者在闡釋和解讀這一小說時，雖然也注意到了小說的語言形式，但還是較多地關注到小說中的異國情調以及小說的政治批判色彩，這不僅是受到譯入語文化意識形態的影響，也折射出西方對現代中國文學的某些既定文化想像和閱讀期待。總體而言，《人面桃花》在英語世界的話語言說塑造了良好的作品形象，這與譯者、編輯、出版商、讀者連袂打造的包括標題、封面、封底、序言、訪談通信、讀者評論在內的英譯本副文本息息相關，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作品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和吸引潛在讀者的閱讀。

四、結語

在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歷程中，他者的話語言說，對於構建作品的海外形象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作品在海外的傳播與接受。

研究《人面桃花》英譯本的副文本，筆者發現，譯作副文本是積極參與構建文本意義、引導譯入語讀者與文本跨文化相遇並最終傳播文化的關鍵場域。《人面桃花》在英語世界的積極接受，其背後是一系列副文本協同運作的結果。這些副文本由包括出版商、編輯、評論者、譯者等在內的不同行動者共同生產，承載著其各自的意識形態立場、商業考量、文化預設與認知框架，共同影響西方讀者對這部中國小說的理解與定位。在這一過程中，三方的副文本策略既有合力又有張力。其中，出版商基於自身文化意識形態立場與商業考量，通過圖像敘事、獎項標識、分類標籤、封面宣傳語等副文本對小說的“異質性”進行框定，凸顯了小說的東方特質以及普世性主題並同時暗含對中國政治的影射與批判，將中國文學轉化為符合西方市場期待的“認知商品”，既滿足了譯入語讀者對“東方情調”的想像，又迎合了譯入語的詩學規範和譯入語讀者的審美期待；西方評論者受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在副文本中較多闡釋作品的異國情調及其政治功能與現實意義，以迎合了譯入語讀者的文化心理，並預設了其認知框

架；譯者考慮到譯作的傳播與接受效果，一方面通過標題重構和調整注釋位置增強小說的可讀性，但另一方面也通過序言以及訪談報導等副文本策略，積極干預並引導讀者跳出認知慣性和思維定式，關注小說自身的價值，包括其史料意義、現代性與美學價值等。總體來說，他們基於各自的立場、動機和預設運用副文本策略來闡釋和定位文本，多維度展示了《人面桃花》的作品魅力，在展示作品的人文價值與藝術特色的同時塑造了具有史料意義、批判性與現實意義的作品形象。這些協同且具有張力的副文本元素深受譯入語文化的意識形態、市場邏輯、文化預設和認知框架的影響，共同引導西方讀者認識和理解《人面桃花》及其所代表的中國當代文學。

本研究對中國文學形象的海外構建提供了有益啟示，即在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過程中，除了要在選材和翻譯的過程中關注和再現作品自身的文學形象外，也要充分發揮譯作副文本在塑造中國文學形象中的作用，努力協調並調動各方，如譯者、編輯、出版社、讀者等的積極性，讓中國當代文學領域的專家深度介入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話語言說，多管道、多方位、多角度連袂打造能充分闡釋作品內容、作品特色、作品價值與作品意義同時又能吸引讀者的副文本，為塑造良好的中國文學形象創造條件。

注釋

- [1] Chaffa, Mandana. 2020. "Peach Blossom Paradise by Ge Fei," last modified October 27, 2020, accessed March 25, 2023. <https://blog.pshares.org/peach-blossom-paradise-by-ge-fei/>
- [2] 同上。
- [3] 同上。
- [4] 同上。

參考文獻

- Batchelor, Kathryn. 2018. *Translation and Paratext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Becker, Alida. 2021. "From Turkey to China to Norway, these novels take you back in time."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0, 2021.
- Ge, Fei. 2020. *Peach Blossom Paradise*. Translated by Canaan Morse.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Press.
- Genette, Gérard. 1997.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egovich, Andrea, and Morse Canaan. 2016. "The Literary Tourist Interviews Canaan Morse." Last modified December 7, 2016, accessed May 20, 2023, <https://www.fictionadvocate.com/2016/12/07/the-literary-tourist-interviews-canaan-morse/>
- McElroy, James. 2020. "A Chinese guide to our cultural revolution." *Washington Examiner*, December 31, 2020.
- McEvoy, Beth. 2022. "Mainer turns passion for Chinese culture into an award-winning career

- translating.” Last modified January 13, 2022, accessed May 21, 2023. <https://www.newscentermaine.com/article/news/local/207/mainer-turns-passion-for-chinese-culture-into-an-award-winning-career-translating-literature/97-309f8c0d-287e-47b9-82fe-ce801e37e597>
- Koldas, Kardelen. 2021. “Morse’ s Named National Book Awards Finalist.” *Colbynews*, December 8, 2021.
- Sacks, Sam.2020. “Uncanny Revolutions A tale of conspiracy and dreams, a story of high-stakes board games and a catalog of fool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8, 2020.
- Uren, Victoria. 2021. “On Ge Fei’ s ‘Peach Blossom Paradise’ .” *Book Post*, June 16, 2021.
- Wasserstrom, Jeffrey. 2021. “The Good China Story? Literature as a nation’ s Lifeblood.” Last modified March 26, 2021, accessed April, 22, 2023, <https://archive.ph/b3EkC>
- 格非、李洱、呂約。2018。〈格非 vs 李洱：現代寫作與中國傳統〉，2018.9.10。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910/c405057-30283633.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瀏覽日期：2023 年 4 月 10 日。
- 格非。2019。《人面桃花》。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 耿強。2016。〈翻譯中的副文本及研究：理論、方法、議題與批評〉。《外國語》5：104-112。
- 王濤。2008。《中國成語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金庸早期的新聞翻譯實踐探蹟

刁洪

Address: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E-mail: jacksglj123@163.com

Correspondence: Hong Diao

Citation: Diao, Hong. 2024. "On Jin Yong's News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His Early Career." *Translation Quarterly* 114: 27-37.

Abstract

On Jin Yong's News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His Early Career (by Hong Diao)

Jin Yong's identity as a translator and his millions of words of translation have long been under-researched. Based on the approach of "description-interpretation" of translation microhistory, this study probes into Jin Yong's news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his early career (1946-1951) through historical data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analysis. It explores his translation motivations and strategies, and analyzes his translation production field, so a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Jin Yong as a translator". It lays bare that Jin Yong has adopted strategies such as abridged translation, transcreation, and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He has ensur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news and the readability of the translation. His practice of news translation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his vernacular discourse in future martial arts novels. As a "translation agent", Jin Yong's patriotism and broad world vision embodied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have important valu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alents.

一、引言

金庸是不世出的百科全書式人物。金庸小說研究的開創者之一陳墨（2020）認為金庸有八種身份：報人、譯者、作家、影人、商人、時事評論家、國士和學人。學界多著墨於金庸的作家、報人和時事評論家身份，就其武俠小說發表的論文、感想、書評不可枚舉，甚至有“金學”之論。事實上，金庸文字生涯早期的譯作遠多於創作。1946-1969年間，他先後用“查良鏞”“鏞”“查理”“香光”“白香光”“宜孫”“徐宜孫”“樂宜”“子暢”“林歡”“小查”“小渣”“徐慧之”等筆名在各類刊物發表譯

文 100 餘篇。此外，金庸獨立完成並出版譯作四部：《中國震撼著世界》（香港文宗出版社，1952），《朝鮮血戰內幕》（香港文宗出版社，1952），《最厲害的傢伙》（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56），《情俠血仇記》（野馬小說雜誌出版社，1962-1969）。他還譯有安德烈·莫洛亞（André Maurois）的《幸福婚姻講座》（*The Art of Being Happily Married*）以及達蒙·魯尼恩（Damon Runyon）的多個短篇小說。他原本還打算翻譯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最終因忙碌且“見到陳曉林兄的譯本在臺灣出版”，便擱置下來（金庸、池田大作 1999，8）。如果不是後來走上小說創作和辦報經商之路，金庸有可能成為二十世紀譯家百舸爭流中的一艘“大船”。

遺憾的是，學界鮮有討論金庸的譯者身份與翻譯實踐。作為金庸文字版圖生動面向的翻譯被長期忽略，“尚處於隱學階段”（李以建 2024a，3）。目前只有兩篇關於金庸翻譯實踐的論文：賈立元（2023）分析了金庸 1945 年至 1949 年間關於國際形勢和核威懾的數篇譯文和評論文章，並探討了金庸與科幻的結緣。沈偉（2024）探究了金庸的法學背景，提及了其對國際問題相關文獻的譯介。此外，幾篇報紙文章（李以建 2024b；嚴曉星 2024）大致勾勒了金庸的翻譯生涯和主要譯作，為後續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依託，但材料鋪陳較多，分析稍顯“平面化”，未及探賾其翻譯活動的歷史性與複雜性。最後，嚴曉星的《金庸年譜簡編》羅列了金庸的主要翻譯活動，為本文提供了史料基礎。本研究依循“描寫—解釋”的翻譯微觀史研究思路（張汨 2021），通過史料爬梳及闡釋與譯本分析，探究金庸的外語教育背景，橫向掃描其早期（1946 年至 1951 年）的新聞翻譯活動，並縱向發掘其翻譯動機與策略，以期還原金庸翻譯實踐中的個體抉擇與歷史場域，深化理解“作為翻譯家的金庸”，並揭示“金氏白話”的“源頭活水”。

二、金庸的外語啟蒙與翻譯學習

2010 年 9 月，86 歲的金庸獲得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為《唐代盛世皇位繼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Tang China, 618-762*），全英文撰寫。金庸的英語水準不亞於中文，不僅聽說讀寫樣樣精通，還略通古英語（李以建 2024c，1）。他卓越的英語水準首先得益於青少年時期所受的良好外語教育。

金庸本名查良鏞，1924 年出生於浙江省海寧市的世家望族—海寧查氏。詩人、翻譯家查良鏞，詩人徐志摩皆為金庸親戚。金庸兒時家境殷實，家裏藏書也極豐富。祖父查文清曾任江蘇省丹陽縣知縣，在“丹陽教案”中竭力保護同胞，反抗帝國主義壓迫。其偉大人格對金庸日後的翻譯和創作影響極大。與同時代的許多知識份子不同，金庸並未上過私塾，他的啟蒙教育是在現代學校完成的。金庸七歲時就讀於村口的十七學堂，高小轉入龍山小學堂（傅國湧 2013，11）。他這樣回憶小學的閱讀經歷：“我家和各位伯父堂兄堂姐等人所擁有的書是相流通的，大家借來借去……我上的小學，圖書館裏書籍也相當豐富……我記得有一位姓傅的老師，特地借出他珍藏的《小婦人》《好妻子》《小男人》三部書給我閱讀。這三部書的譯者鄭曉滄先生是美國留學生

……”（金庸、池田大作 1999，87）。金庸十二歲時父親送給他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說《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作為新年禮物（嚴曉星 2021，15）。可見，兒時富足的家庭和開明的學校為金庸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讀書環境，打下扎實的中英文基礎，也涵養了他好學不倦的品質。

1939年，金庸升入高中，英語成績優異，高一兩個學期的英語考試分別獲得87分和92分。高中期間，他涉獵了大量文學譯作，包括《萬有文庫》《漢譯世界名著》《悲慘世界》《秋天裏的春天》（傅國湧 2013，30）。1941年在浙江衢州中學的文藝匯演上，金庸改編並主演了英語話劇《月出》（*Rising of the Moon*）^[1]（嚴曉星 2021，30）。該話劇由愛爾蘭劇作家格雷戈裏夫人（Lady Gregory）創作，是展現愛爾蘭民族文化和革命理想的重要作品。次年，為了躲避戰火，金庸輾轉來到湘西的湖光農場。在這裏，他嘗試將《詩經》譯成英文，還計劃編譯《牛津袖珍詞典》，但最終作罷（傅國湧 2013，51）。1943年，金庸以優異成績考取當時的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並在此讀書一年。這年暑假，金庸閱讀了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金庸、池田大作 1999，7）。第二年，二十歲的金庸在中央圖書館任幹事，閱讀了英文原著《撒克遜劫後英雄略》（*Ivanhoe*），並用英法兩種語言參看《俠隱記》與《基督山恩仇記》（嚴曉星 2021，34）。另據嚴家炎對金庸的採訪記錄，金庸在此期間閱讀了大量西方文學作品，有一部分還是外文原著（嚴家炎 1999，216）。1945年，金庸與同學模仿當時頗具影響力的《時與潮》半月刊，合辦《太平洋雜誌》，刊登從國外翻譯過來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方面的文章。然而由於時局不穩和經費短缺，該雜誌出版一期就告夭折（傅國湧 2013，49-50）。金庸青少年正值動盪歲月，求學路上歷盡艱辛，但他志堅行苦、手不釋卷，閱讀了大量英文原著和中文譯作。豐富的譯文閱讀不僅夯實了他的雙語能力，提升了其文學素養，奠定了其審美傾向與知識結構，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總之，良好的中英文教育，扎實的寫作功底，廣博的百科知識為金庸日後的新聞翻譯實踐打下堅實基礎。成長過程中培養的強烈的探索欲，開闊的視野，深厚的家國情懷也塑造了金庸作為譯者的“職業慣習”，即“社會行動者在持續參與職業活動中所形成的社會實踐方式和心理圖式的特定傾向”（Diao 2022，1061），影響了以後的翻譯選材與策略。下文將聚焦金庸1946年到1951年間的新聞翻譯實踐。

三、中國情懷、世界眼光：金庸的新聞翻譯實踐

3.1 金庸新聞翻譯實踐概況

金庸早年就立志成為外交官，報效國家，因此選取了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讀大學時，他表現出對國際時事的濃厚興趣，曾熱衷於閱讀共產黨在重慶發行的《新華日報》，特別喜歡外交家喬冠華以“於懷”為筆名發表的國際時事述評（傅國湧 2013，47）。金庸的新聞翻譯實踐集中於1946年到1951年。1946年11月，金庸經友人陳向平推介入職杭州《東南日報》，正式開啟了新聞翻譯生涯。據時任總編輯汪遠涵回憶，報

館聽聞金庸英語水準上乘，便請他負責收聽“美國之音”(VOA)和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廣播，然後摘譯成中文，也會讓他選譯一些英文報紙(汪遠涵 1997, 246)。12月5日，金庸以“查良鏞”為署名在該報發表題為“英國最近的外交政策”的新聞譯文，這是他的第一篇見報文章(趙躍利 2018)。1947年下半年間，金庸還受《時與潮》之邀，做過一段兼職編輯(傅國湧 2013, 65)。1947年6月，上海《大公報》公開招聘三名譯員，應徵者多達一百零九人，金庸最終被錄取(嚴曉星 2021, 50)。但在上海《大公報》工作期間，金庸並未發表譯文，直到1948年3月被調往香港《大公報》才開始翻譯工作。金庸在幾家報館的新聞翻譯經歷也為以後在香港創辦《明報》打下基礎。

筆者對“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2]進行高級檢索，然後結合《金庸年譜簡編》的相應條目，再細讀甄別^[3]，最終確定金庸在1946年到1951年期間共發表新聞譯文110篇，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表 1: 金庸新聞翻譯概況

發表時間刊物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時與潮》半月刊		25	16			
香港《大公報》			22	11	1	1
《東南日報》	1	7				
《新晚報》						8
《時與潮》副刊		15	3			

以今日之標準，110篇不算很多，但當時的新聞翻譯效率普遍不高。金庸在翻譯中面臨獲取原文難度大，資訊傳播速度慢，查詢背景知識不易，缺乏翻譯助手等困難。此外，金庸還擔任其它新聞工作。上述譯文名後標注的著作方式有：譯、譯述、節譯、輯譯等，部分譯文會標注原文作者，卻很少標注原文所登刊物，這為筆者尋獲原文帶來很大困難。以上五種刊物當時都頗具影響力。《時與潮》半月刊是一份以譯文為主的政治性綜合刊物，1938年創刊。香港《大公報》是面向全球華人的綜合性報紙，1938年創刊。《東南日報》是抗戰時期東南地區的著名報紙。《新晚報》屬《大公報》子報，也是金庸日後發表武俠小說的主要刊物之一。《時與潮》副刊主要選譯外國雜誌精華，內容五花八門。

作為新聞譯者，金庸獲得了上司信任(傅國湧 2013, 58)，他對翻譯材料的選擇和加工有一定自主權。金庸很大程度上“可以篩選新聞人物和新聞內容，並決定新聞當事人、主題和話語的呈現方式”(Perrin and Ehrensberger-Dow 2012, 367)。主題方面，上述譯文以世界主要大國的時事政治和國際關係事務為重點，兼有體育、文化、經濟、科技、健康等主題，還有少量的奇聞異事。這一方面說明金庸的翻譯選擇根植於大學時的專業學習，另一方面又體現了他廣泛的閱讀興趣。選材方面，原文多出自英美重要報紙與雜誌，如《泰晤士報》(*The Times*)、《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世界報導》(*World Report*)、《哈珀月刊》(*Harper's Magazine*)、《觀察家報》(*The Observer*)、《國家》(*The Nation*)《經

濟學人》(The Economist)、《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心理學家》(The Psychologist)、《科利爾雜誌》(Collier's)。原文多數作者為當時知名的時事評論家和記者，如因報導二戰聞名的英國記者亞曆山大·肯德裏克(Alexander Kendrick)，美國著名軍事評論家漢森·鮑德溫(Hanson Baldwin)，以及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新聞時效性方面，譯文刊登離原文發表往往僅一兩月，緊跟時代脈搏，反映歐美最新動態。

3.2 金庸新聞翻譯策略：文本分析

新聞翻譯是譯者將一種上下文重新定位到新語境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原文話語會發生背景更換、視角重置、重點轉移、聲音雜糅等變化(Kang 2007, 221)。換言之，新聞翻譯往往是干預、操縱和改寫的過程(Zhang 2013, 398)。下麵，我們以一篇譯文(見圖1)為例，分析金庸在重新定位語境中的策略與風格。原文題為“Britain's next big crisis”，1947年7月發表在《哈珀月刊》。它是美國最古老的文學和時政期刊之一。譯文題為“英國的危機”，題目後標注“查良鏞節譯”。該譯文1947年9月發表在《時與潮》半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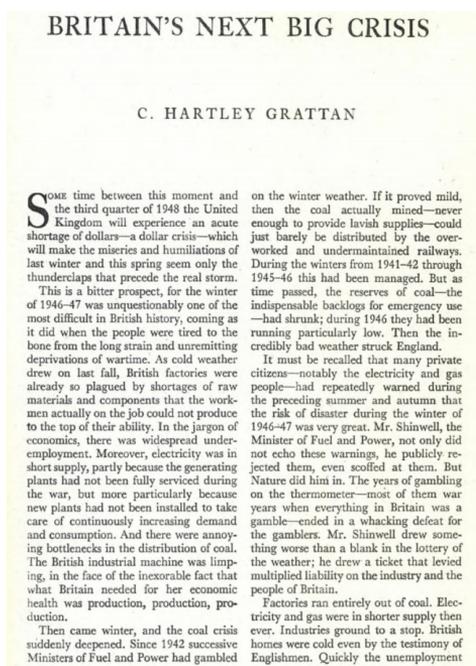


圖 1: “Britain’s next big crisis” 原文及譯文

通過比較原文與譯文，我們發現了許多編譯的痕跡。新聞編譯(transediting)作為一個學術概念，最早由凱倫·斯戴汀(Karen Stetting)(1989)提出，指新聞翻譯和新聞編輯的灰色中間地帶。斯戴汀將新聞編譯分為三類：1. 提升表達效率的“清理性編譯”；2. 適應譯文在新社會環境中預期功能的“情景性編譯”；3. 適應目標文化需求

和慣例的“文化性編譯”(Stetting 1989, 377)。

首先，原文沒有配圖，譯文卻出現一幅題為“美金之價值”的漫畫插圖：1946年，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和一頭象徵英國的獅子蹲坐在美元織就的飛毯上穿越風暴。此插圖屬於情景性編譯，運用直觀、形象、誇張、幽默、反諷的漫畫幫助讀者理解文意，加深新聞事實的既視感，提升新聞可讀性。標題“Britain's next big crisis”譯作“英國的危機”，而非看似更為忠實的“英國的下一場重大危機”。前者簡潔明瞭，更具當下性與接近性。譯者運用了清理性編譯和情景性編譯。這是一篇節譯文章，原文長達八頁，譯文則只有三頁，以白話文為主。未譯出的內容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1. 經濟學術語，例如原文第一段的“In the jargon of economics, there was widespread underemployment”。2. 時代背景，例如原文第四段中關於 Great Depression (美國經濟大蕭條)的描述。3. 語義重複的內容，例如原文第五段的“no wonder black discouragement produced such dismal reflections”，此句未譯出，因為它是對上一句“No wonder...began to talk about the ‘end’ of Britain”的重述。三處節譯涉及三種新聞編譯方法。再透過下麵長難句的處理來管窺金庸的翻譯風格：

It was only a cruel demonstr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defect of the postwar British economy – a defect which is not incurable but which will bring a succession of disasters still more ominous if its real nature and dimensions are not fully grasped and it is not met with well-calculated and unremitting action.

這只表示英國戰後經濟有一個基本的缺點，這缺點並非不可補救，但假使不充分瞭解這缺點的性質，用精確的計算與努力不息的行動來應付，它將帶來一連串更加可怕的災難。

原文較長，且結構複雜，既有並列，也有嵌套句結構。譯文調整了句型結構，切分為五個短句，準確地傳遞了原文資訊，通順流暢，符合中文句法習慣。此外，金庸還多處運用了詞性轉換、重新詞化等翻譯技巧和濃縮概括、化整為零等新聞撰寫手段。上述方法使譯文篇幅簡短、內容簡練、語言簡樸，而且邏輯清晰，條理分明。值得一提的是，“dollar”在正文中也譯作“金元”。金庸很早就關注到了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關係。他的譯文中至少有三篇屬於這個話題：“中美貿易衰退”、“動盪中的美國對華政策”、“朝鮮美軍被俘記”。然而，由於無法獲取原文，筆者無從分析金庸的翻譯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金庸發表的報刊文章雖未標記為譯文，但通過細讀，作者發現它們很可能是金庸閱讀國外新聞後的以譯代創或者夾譯夾評，即新聞編譯的一種特殊形式。例如，發表在1948年5月4日《大公報》的“下屆白宮的女主人是誰？”寫到：

這位美國參院議長，兼外交委員會主席的夫人是高大，精力充沛而又相當漂亮的人……人家問她怎樣幫助她的丈夫，她用輕快的中西部土音說：“我是他與別人之間的緩衝，是他的秘書，他的用人”……如果這位參院議長變成了總統，她將極聰明極有技巧地擔任“美國第一夫人”的任務……。

此文是一個新聞短評，翻譯的成分恐怕多於評論，粗體部分明顯有些翻譯腔，而“她”的說話內容也應是譯文，但金庸絲毫未透露引用的外媒來源。筆者通讀《大公報》當期發現，許多文章都屬於以譯代創，反映出當時版權意識的薄弱，也說明翻譯在新聞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關於翻譯對二十世紀初新聞業崛起與專業化的影響，參見 Valdeón 2020）。類似的，發表在 1948 年 12 月 20 日《大公報》的“為美最高法院擔憂”一文寫到：

二十五名日本戰犯的命運正等待著美國最高法院的決定，法官傑克遜說：**這一決定將影響美國與世界各國的關係。最高法院聽取口頭辯論的工作已完畢，現在只等這九位大法官作一個在國際關係上，外交史上，國際法上，美國國內法上都占極重要地位的裁定……一切法理問題且撇開不談，我們只覺得最高法院受理這案件實在是做了一樁糊塗事。**

上文粗體部分並未標注雙引號，但實際上是對法官傑克遜的表態的直接引用。而前一句與後一句則是金庸的新聞敘述和評論。金庸通過引用權威人士的發言，為自己的結論提供支撐。通過這種迂回敘述，金庸表達了對美國最高法院的批評態度。金庸以譯代創的新聞稿還有“日本賠償問題”“以色列開國第一次普選”“最完美的容貌”等。

上述分析表明，金庸的新聞翻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不忠實”的編譯或“翻譯框定 (transframing)” (Liu 2017) 行為。由於中英文俱佳，且受到刊物老闆及主編信任，金庸獲得了雄厚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在新聞生產場域中具有較強“議程設置”力 (agenda-setting) (McCombs and Shaw 1972)。他在翻譯中的自主空間大，將自己的人生志趣和政治主張投射到翻譯選材，多處運用改譯、節譯、以譯代創等策略。他的譯文以白話文為主，言簡意賅，注重讀者審美心理與閱讀興趣。必須指出的是，時空的距離和中外文化的異質性對金庸的翻譯實踐造成了巨大障礙，導致了部分譯文的失真與變形。

3.3 金庸的中國情懷與世界眼光

譯者的翻譯選擇受多種因素制約，其中，“最活躍且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是翻譯的主體因素，是譯者的翻譯動機” (許鈞 2014, 156)。金庸的新聞翻譯彰顯了他深厚的中國情懷與廣闊的世界眼光：一方面，譯者的家風與青少年時期的經歷鑄就了他的拳拳愛國之心。他志在報國，其主要翻譯動機是搜羅天下新聞以饗中國讀者，其筆下的譯文為讀者瞭解歐美政治、經濟、社會現實提供了重要窗口，在知識匱乏、資訊閉塞的年代滋養了廣大普通民眾。透過新聞翻譯實踐，他獲得一種世界性語境去討論、回望、體察中國，關照中國和世界（特別是英美國家）的全面關係，促進中國與世界的對話。另一方面，金庸的新聞編譯未局限於個人喜好，也未設限於族別觀念和中西文化之分野，體現了“天下為公”的博大情懷。金庸的新聞翻譯實踐再再表明，他並非被動的傳話人，而是主動的“翻譯行動者” (translation agent)，即“通過翻譯在重大歷史、文學及文化的轉型/變革/創新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的行動者” (Milton and

Bandia 2009, 1)。金庸通過新聞翻譯積極參與資訊傳播、知識啟蒙、形象建構、文化調適、價值引領、思想建構及社會改造。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新聞翻譯屬於一種機構實踐，因此受制於機構條件和價值觀（Kang 2007, 222）。例如，《東南日報》曾是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機關報，而由英華創辦的《大公報》則以“開風氣，牖民智”為宗旨。兩者在辦報風格和讀者群體方面頗有差異，這對金庸的翻譯選材和策略也有影響。

新聞譯文之外，金庸 1946 年至 1951 年還在《大公報》發表了多篇中外關係的社評，如“從國際法看新中國政府的承認”、“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產權”、“從國際法論援朝志願部隊”、“試論廢除舊約的根據”等，其中的部分內容也有以譯代創的痕跡。這些文章也充分體現了金庸的“中國意識”，即對國家尊嚴與利益的維護（沈偉 2024, 19）。

四、新聞翻譯與“金氏白話”：互文性視角

新聞翻譯與武俠小說創作的關係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話題，限於篇幅，本文僅從互文性視角聚焦新聞翻譯對金庸小說語言風格的影響。“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即“文本間性”。這一概念最早由法國文論家與符號學家朱麗葉·克雷斯蒂娃（Julia Kristeva）創立。她指出：“任何文本的構成都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對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轉換”（Kristeva 1969, 146）。互文性揭示了文本的動態生成機制，為分析文本的模仿、流轉和衍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工具。翻譯與創作的關聯也是互文性的表現形態，學界已有大量相關研究（王家平 2020；朱芳 2021）。

金庸小說有別於明末至民國的舊派武俠小說^[4]，體現在主旨構思，也體現在語言風格上。嚴家炎將金庸小說視為“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特別指出：“金庸的語言是傳統小說和新文學的綜合，相容兩方面的長處”（1999, 212）。金庸小說的語言不僅“明白曉暢，言文一體”，而且十分豐富，“將成語、方言、俗語等等全都‘化’入他的現代口語之中”（陳墨 1998, 40）。金庸小說一方面更新了古典文言文，另一方面又對“五四”後過分歐化的白話文進行補偏救弊，成就了獨樹一幟的“金氏白話”，是“真正意義的白話文學的開花結果”（陳岸峰 2022, 41）。學界多關注“五四”新文學對金庸小說敘事風格和語言質地的塑造，卻忽略了新聞翻譯的影響。

金庸的報業和小說創作是不可分割的（嚴曉星 2024）。正如前文指出，金庸文字生涯早期的譯作遠多於創作，新聞翻譯是他語言風格的發軔點，給後期的小說創作與社評撰寫打上烙印。一方面，金庸家學淵源，古文功底扎實。另一方面，新聞翻譯極大地提升了其外語水準，也使得英語的構詞句法，行文體例內化於心，對其語言風格的影響滲肌浹髓。金庸的新聞譯文平實易懂，條理清晰，邏輯性強，可讀性高，這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也有跡可循。具體而言，新聞翻譯在以下四個方面塑造了“金氏白話”：一、簡約曉暢的口語化語言，金庸小說有典雅古樸之處，又不失現代的可讀性，但無詰屈聱牙之嫌，大學教授和田野村夫都能讀懂、愛讀之。二、上文分析指出，金庸在新聞翻譯中注重語句流暢度和句式多樣性。相應地，他的小說如行雲流水，句式

多樣，長短結合、繁簡交錯。例如，《射雕英雄傳》第一回寫道：“丘處機拋下敵屍體，勒韁控馬，四下兜截趕殺，但見鐵蹄翻飛，劍光閃爍，驚呼駭叫聲中，一個個屍首倒下，鮮血把白雪皚皚的大地片片染紅”（金庸 2009，20）。此類句子在金庸小說中俯拾皆是。三、得益於長期的新聞翻譯，金庸掌握了緊湊有序的敘事手法。他的小說敘事性強，節奏明快，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和心理需求，許多情節（例如《天龍八部》的三主角視角，《雪山飛狐》的多線敘事，以及《射雕英雄傳》中郭靖與黃蓉連闖漁樵耕讀四關尋得一燈大師療傷）跌宕起伏卻條理清晰，像新聞報導一樣將複雜故事有條不紊地展開。四、新聞翻譯加深了金庸對外國歷史文化的理解，為小說創作提供了借鑒，即豐富的認知資源和多元的歷史文化元素。例如，《倚天屠龍記》融入了波斯明教文化元素，其中重要人物“青翼蝠王”的設定則借鑒了西方文學的經典形象：吸血鬼德古拉伯爵。而《天龍八部》《射雕英雄傳》《笑傲江湖》《書劍恩仇錄》等小說對西方戲劇藝術的挪用更是十分普遍（嚴家炎 1999）。正是這些與新聞譯文的互文特徵改變了小說的語言風格，革新了小說的劇情架構，使得金庸小說大大區別於前代文白夾雜，“武”勝於“俠”的舊派武俠小說。以新聞翻譯為開端，金庸開啟了自成一體的文人書寫範式。由此，我們不妨說，金庸小說創作中的“金氏白話”很大程度上受益於新聞翻譯實踐。概言之，翻譯與小說創作互為徵引、互為表裏、互為鏡像。反之，金庸小說創作對他之後的新聞社評自然也有影響，而這卻是另一個話題了。

五、結語

金庸青少年時期手不釋卷、博聞強記、探索欲強，展現了一名優秀譯者的良好潛質。金庸在新聞生產場域中具有較強“議程設置”力，採取了節譯、以譯代創、夾譯夾評等策略，兼顧了新聞真實性和譯文可讀性。他通過新聞翻譯積極參與資訊傳播、知識啟蒙、形象建構、文化調適、價值引領、思想建構及社會改造。他的新聞翻譯實踐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也影響了他後期的小說創作風格和辦報理念。他在新聞翻譯實踐中顯露出對世界格局深切的審視內涵，體現了強烈的“中國意識”，對當代翻譯人才培養具有重要借鑒價值。

長期以來，學界忽略了金庸的譯者身份，其上百萬字譯文未進入學術視野。本研究依循“描寫—解釋”的翻譯微觀史研究思路，通過史料爬梳及闡釋與譯文分析，厚描了金庸早期的新聞翻譯實踐，揭示了金庸作為新聞譯者的生動面向，為深刻認識金庸的文化貢獻提供了新的視角。本文是首篇專門的金庸翻譯實踐研究，旨在拋磚引玉，引起更多相關討論。限於篇幅，我們未針對新聞翻譯對“金氏白話”的影響展開細緻的文本分析。後續將探討金庸的文學翻譯、傳記翻譯和百科知識翻譯實踐，進一步還原“作為翻譯家的金庸”。

基金資助：

本文系四川外國語大學 2023 年度規劃項目“《射雕英雄傳》英譯中的古代中國形象建構研究”（項目編號：sisu202305）及 2023 年度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博士項目“金庸小說英譯中的中國形象建構研究”（項目編號：2023BS11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 [1] 原文中的中文名為《月亮升起》，但實際上《月出》一名更為通用。
- [2] 該資料庫為國內最權威的綜合性中文報刊文獻服務體系。
- [3] 通過細讀甄別剔除了無效結果。例如 1943 年刊登在《建築》雜誌上的“可塑體：新興的建築材料”一文雖為“良鏞”編譯，但這位譯者是建築學家吳良鏞，而非金庸。此外，金庸發表的數篇短篇小說譯文不屬於本文的研究範圍，也被剔除。
- [4] 舊派武俠小說以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宮白羽的《十二金錢鏢》，王度廬的《臥虎藏龍》等為代表。

參考文獻

- Diao, Hong. 2022. “Translating and Literary Agenting: Anna Holmwood’s *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30 (6), 1059-1073.
- Kang, Ji-Hae. 2007. “Recontextualization of News Discourse: A Case Study of Translation of News Discourse on North Korea.” *The Translator* 13 (2): 219-242.
- Kristeva, Julia. 1969. *Séméiotikè -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Paris: Seuil.
- Liu, Nancy Xiuzhi. 2017. “Same Perspective, Different Effect: Framing the Economy through Financial News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25 (3): 452-463.
- McCombs, Maxwell E., and Donald L. Shaw. 1972.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 (2): 176-187.
- Milton, John, and Paul Bandia. 2009. “Introduction: Agents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Agents of Translation*, edited by John Milton and Paul Bandia, 1-1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Perrin, Daniel, and Maureen Ehrensberger-Dow. 2012. “Translating the News: A Globally Relevant Field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In *Future Direction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Lo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Richard B. Baldauf, and Christina Gitsaki, 352-372.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 Stetting, Karen. 1989. “Transediting: A New Term for Coping with the Grey Area between Editing and Translating.” In *Proceedings from the Fourth Nordic Conference for English Studies*, edited by Graham Caie, 371-382. Copenhag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 Valdeón, Roberto A. 2020.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Journalism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 Historical Overview and Suggestions for Collaborative Research.” *Journalism Studies* 21 (12): 1644-1661.
- Zhang, Mei Fang. 2013. “Stance and Mediation in Transediting News Headlines as Paratexts.”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21 (3): 396-411.
- 陳岸峰。2022。〈清末的武俠啟蒙與金庸武俠小說的新境界〉。《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1：35-45。

- 陳墨。1998。〈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當代作家評論》5: 32-40。
- 陳墨。2020。〈金庸的頭銜、功業及相關問題研究〉。《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 115-124。
- 傅國湧。2013。《金庸傳（修訂版）》。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金庸。2009。《射雕英雄傳》。廣州：廣州出版社。
- 金庸、池田大作。1999。《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李以建（編）。2024a。《金庸隨筆》。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 李以建。2024b。〈金庸先生的中文秘書李以建：作為翻譯家的金庸〉。《新快報》08-18. <https://www.xkb.com.cn/articleDetail/334914>
- 李以建。2024。〈編者語：揭示人性深層的困惑和抉擇〉。金庸譯。安德烈·莫洛亞著。《幸福婚姻講座》。廣州：廣州出版社。
- 賈立元。2023。〈太空核威懾背景下金庸對海因萊因的翻譯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6: 100-123。
- 沈偉。2024。〈大俠與法：金庸和國際法的邂逅〉。《新文學史料》2：16-26。
- 王家平。2020。〈創作與翻譯的互文性研究——以魯迅作、譯美學風格的對話為中心〉。《文藝爭鳴》7: 67-75。
- 汪遠涵。1997。〈與查良鏞鍾沛璋通信敘舊。何揚鳴編。老報人憶《東南日報》〉。《浙江文史資料（61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許鈞。2014。《翻譯論（修訂本）》。南京：譯林出版社。
- 嚴家炎。1999。金庸小說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嚴曉星。2024。〈作為翻譯家的金庸〉。《中國社會科學網》04-24.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04/t20240424_5747691.shtml
- 嚴曉星。2021。《金庸年譜簡編》。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
- 張汨。2021。〈翻譯微觀史書寫：理論與方法〉。《外語與外語教學》5：129-137+151。
- 趙躍利。2018。〈金庸筆名知多少〉。《澎湃新聞·上海書評》12-08.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06591
- 朱芳。2021。〈勃萊詩歌與中國古典詩歌譯文之間的後現代互文性〉。《外語學刊》2: 97-101。

《秦律遺文》中刑名術語誤譯研究

劉國生

Address: Department of Basic Courses, Guangdong Police College, Guangzhou, China

E-mail: liuronny@163.com

Correspondence: Guosheng Liu

Citation: Liu, Guosheng. 2024. "On the Mistranslation of Penal Terminology in *Remnants of Ch' in law*." *Translation Quarterly* 114: 39-55.

Abstract

On the Mistranslation of Penal Terminology in *Remnants of Ch' in law* (by Guosheng Liu)

The excavation of the Shuihudi Qin Bamboo Slips has provided valuabl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legal system in the Qin Dynasty. Remnants of Ch' in Law compiled by Hulsewé i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the Qin law in the bamboo slips from the Qin tombs at Shuihudi.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enal terms in Hulsewé's work exhibit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while also having unavoidable flaws. This study selects two typical cases of mistranslations of the penal terms in Remnants of Ch' in Law, and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ter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linguistic, leg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context based on the mistranslation theory, then proposes translation reconstruction strategies for mistranslated penal terms by combining the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Finally, the root causes of mistranslation are thoroughly analyzed from four dimensions: language, legal culture, philology, and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Systematic improvement methods are then proposed, including enhancing translato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nnovating translation methods, strengthen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pplying contextualiz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establishing a post-translation verification mechanism. This research aims to improve the translation accuracy of ancient Chinese legal classics and promote the exchange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egal cultures by studying the mistranslation of penal terms in Remnants of Ch' in law.

一、引言

1.1 研究背景與意義

睡虎地秦簡出土為秦代法律制度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國內秦律研究成果豐碩，但秦律外譯研究還剛剛起步，成果極為稀缺。比較而言，國外學者對秦律外譯研究起步更早，成果較多。從時間線來看，1977年 Donald Harper (夏德安) 首先將“睡虎地秦墓竹簡的發掘情況、釋文及概述摘譯至《古代中國》(Early China)” (陳松長 2019, 2)，開啟了秦律外譯的早期探索；1981年 Robin David Sebastian Yates (叶山) 與 Katrina C.D. Mcleod (麥克勞德) 合作將《封診式》單獨譯註出來；1978年 Anthony François Paulus Hulsewé (何四維) 在第 26 屆歐洲漢學會議上專門介紹睡虎地秦墓竹簡，並隨後在《通報》(T'oung Pao) 中對其進行了更為詳實的譯介與分析；1985年 Hulsewé 出版《秦律遺文》(Remnants of Ch' in Law)，作為睡虎地秦墓竹簡的完整英譯本，成為西方學界研究秦代法律制度的里程碑式文獻，不過此書尚無中譯本，難以為中文學界直接了解。此後，國外秦律外譯研究持續推進，如 2014年 Ulrich Lau (勞武利) 在相關研究中涉及秦律文本譯介，2021年 Maxim Korolkov (馬碩) 與 Yates 分別從不同角度對秦律外譯及解讀展開探討；2016年 Ulrich Lau 與 Thies Staab (史達) 還針對《嶽麓書院藏秦簡(叁)》進行了英譯與專項解析。此外，美國學者 Charles Oscar Hucker (賀凱) 於 1985年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也對秦代部分官職的英譯及釋義進行了初步嘗試。相較於國外，國內學者如唐俊峰 (Tong 2023)、張晉藩 (Zhang 2020) 雖在秦律研究領域成果顯著，但在秦律外譯方面的專門探索仍相對有限。這些國外的早期譯介與後續研究，既反映了西方學界對中國古代法律典籍的高度重視，也證明了我國古代法律典籍的重要研究價值。然而何四維譯本等因秦律文本語言晦澀、文化背景複雜及年代久遠等問題，在刑名術語英譯中存在諸多誤譯，這些誤譯不僅影響國際學界對秦代法律制度的準確理解，更會阻礙中外法律比較研究的深入開展。

1.2 核心術語界定

學術語境中的“誤譯”，依“信、達、雅”準則，指違背術語翻譯核心規範，導致語義失真、文化流失或體系混亂的現象，含語義偏離、文化語境缺失、術語體系破壞、歷史認知錯位四類情形，有別於語言差異引發的“可接受性偏差”，本質是損害源術語“語義-文化-體系”三維屬性。

近年學界對“誤譯”的研究呈多領域、多視角特徵，核心成果分三類：其一，解析典籍專名與術語誤譯成因，多源於文化語境割裂，如翟理斯英譯蘇詩與《千家詩》(王燕 2025)、阿瑟·韋利譯《詩經》(曾素英、Eric Poirier、岳巧雲 2023)，與術語專業性缺失，且譯者慣習與文化認知框架影響術語語義傳遞精度，如霍克思譯《紅樓夢》(孟天倫 2024)、羅慕士譯《三國演義》(錢屏勻 2022)；其二，探索誤譯規避策略與學術價值重估，如《道德經》(張旭冉、戈玲玲 2024)、《西廂記》(曾建萍 2024) 研究提出“語境還原 + 跨學科校驗”，《備急千金要方》譯本研究區分“有意/無意誤譯”(曲倩

倩 2023)，科學經典研究提出“語料信息庫介入”方案（方芳 2020）；其三，開展特定領域誤譯類型化分析，如民族經典英譯本《塵埃落定》《薩迦格言》（魏清光、李躍平 2023）研究揭示，文化專屬術語誤譯致文化流失，法律術語研究指出“不精確”“概念混淆”或引發理解偏差。

基於術語學理論，術語翻譯是特定專業詞彙的跨語言轉換，需遵循“語義對等”“文化適配”“體系兼容”三大原則。如秦律刑名等歷史專業術語，需傳遞語義確定性、體系關聯性、文化嵌入性，需兼顧歷史語境還原與讀者認知，規避文化隔閡導致的信息損耗。近年術語翻譯研究呈現“理論深化、標準聚焦、方法創新”的特徵，法律與典籍領域成果最具參考價值，核心方向有三：其一，法律術語翻譯理論與原則建構，萬立（2025）提出行政法術語英譯需“概念內涵、功能屬性、語用場景”三重對等，胡波（2025）指出其本質是“地方性法律知識跨文化遷徙”，與吳萇弘（2022）提出的“平衡語義準確性與文化可接受性”觀點呼應，並強調技術工具的支撐作用（吳萇弘 2021）；其二，典籍術語翻譯標準化與語境適配，戴擁軍（2024）以“法家”英譯為例，提出需傳遞“概念內涵”與“話語功能”，肖海燕、徐琚（2024）認為規範化需經“語義變異篩選—文化適配選擇—內涵保持確認”過程，劉性峰、魏向清（2021）指出古代術語翻譯需嵌入“三重語境”框架；其三，技術賦能與實踐創新，張法連、賈小蘭、湯文華（2024）用概念整合理論解析《民法典》術語語義轉換，以及吳萇弘（2021）提出建數字術語語料庫，均契合知識翻譯學相關理念。

本研究以《秦律遺文》為研究對象，以刑名術語誤譯問題為核心，通過運用對比分析法、文化闡釋法等，深入分析“棄市”“城旦舂”等典型刑名術語的法律文化內涵、誤譯多維解析，並提出翻譯策略重構，綜合分析《秦律遺文》中刑名術語誤譯根源，並據此建議改進策略。本文旨在探究現有譯本的刑名術語誤譯問題，為未來秦律重譯提供參考，並推動中外法律制度和思想的深入比較研究，將真實的中國古代法律還原予國際學界。

二、《秦律遺文》中刑名術語英譯概述

秦代的刑罰體系極為精細，據文獻記載，其刑罰大體分為十三類，包括死刑、肉刑（黥、劓、膺、宮）、笞刑、徒刑、髡刑和耐刑、遷刑、費刑、贖刑、廢、誅、連坐、收、謫戍等。每類刑罰皆蘊含深厚的歷史底蘊與法律意義，反映了秦代社會治理的複雜架構。何四維在《秦律遺文》中對這些刑名術語進行了英譯，具體如下：

第一類，死刑。“棄市”譯為“beheading”，“磔”譯為“execute and expose”，“定殺”譯為“kill alive (in the water)”或“kill by drowning”，“生理”譯為“bury alive”，“戮”譯為“dishonour sb when alive and cut him asunder”。此類翻譯多聚焦行刑動作，旨在直觀呈現死刑執行方式。

第二類，肉刑。“黥”譯為“tattoo”，“劓”譯為“slice off nose”，“斬止”譯為“amputate foot”或“have foot cut off”，“宮”譯為“castration”，“塗足”譯為“the feet shackled”或“shackle legs”，“笞”譯為“bastinado”。用詞簡潔明瞭，精準指向肉刑的

核心動作。

第三類，恥辱刑。“耐”譯為“the shaving of the beard”，“髡”譯為“shave off the hair and whiskers”。通過描述外在行為表徵該類刑罰的特性。

第四類，徒刑。“城旦舂”譯為“a ch'eng-tan and a grain-pounder”，“鬼薪”譯為“Gatherers of firewood for the spirits”或“kuei-hsin”，“白粲”譯為“sifters of white rice”，“隸臣妾”譯為“bond-servants and bond-women”或“Li-ch'en and li-ch'ieh”，“司寇”譯為“a ssu-k'ou”或“robber-guard”，“候”譯為“hou”。此類翻譯保留了原詞發音，旨在傳承文化記憶點。

第五類，其他刑罰。“遷”譯為“banishment”，“貲”譯為“fine”，“贖”譯為“redemption”，“廢”譯為“remove from office”，“誶”譯為“reprimand”或“berate”，“坐”譯為“(co-)adjudicate”，“收”譯為“confiscate”，“謫戍”譯為“assign to the frontier with remuneration”。此類翻譯綜合考慮了刑罰目的與實施場景，力求精準表意。

何四維對刑名術語的英譯呈現出以下鮮明特點：

第一，用詞精準簡潔。無論肉刑還是其他類別刑罰的翻譯，多採用簡短且直擊要害的詞彙。例如，肉刑中“劓”直譯為“slice off nose”（Hulsewé 1985, 120），清晰傳達刑罰行為本質，毫無冗餘，使讀者能迅速理解其含義。

第二，文化特色保留。在徒刑翻譯上表現突出，像“城旦舂”“鬼薪”等保留原發音，未生硬套用現代詞彙，使古老刑名術語攜帶的文化基因得以留存，外國讀者藉此可窺探秦代法律文化獨特風貌。

第三，行為描述詳實。諸多刑罰英譯聚焦於執行細節。例如，“定殺”譯為“kill alive (in the water)”或“kill by drowning”（Hulsewé 1985, 155），生動還原行刑場景，幫助讀者構建直觀畫面，理解刑罰實施流程。

然而，何四維譯本也存在不容忽視的缺陷：

其一，法律概念轉譯失準。如“磔”刑被譯為“execute and expose”（Hulsewé 1985, 138），實則更契合“棄市”刑特徵，而“磔”的實際行刑方式為“割裂、肢解人的身體並懸掛於木進行示眾”（連宏 2016）。“謫戍”之“謫”誤譯為“remuneration（賠償）”（Hulsewé 1985, 73），與《說文解字》“罰也”的釋義形成根本性悖離，“‘謫戍’即罰戍邊”（蔣非非 1995）。此類誤譯折射出譯者對中國古代刑名制度認知的系統性偏差。

其二，文化意象傳遞缺位。“城旦舂”簡化為“a ch'eng-tan and a grain-pounder”（Hulsewé 1985, 168），“候”直譯為“hou”（Hulsewé 1985, 15），均未呈現其“刑徒分級管理制度”的實質；“耐”譯為“shave off beard”（Hulsewé 1985, 68），僅聚焦體膚之損，未能揭示“去髮毀容以示恥”的社會身份重構功能。這種表意策略造成文化深層結構的翻譯耗損。

其三，術語規範體系缺失。核心法律術語存在多重譯法：“鬼薪”交替使用“Gatherers of firewood for the spirits”（Hulsewé 1985, 68）與音譯“kuei-hsin”（Hulsewé 1985, 150）；“隸臣妾”“司寇”“斬止”“盜足”等譯名亦缺乏統一標準。這種術語混雜現象嚴重削弱了譯本的學術參考價值。

其四，現代闡釋維度錯位。將“司寇”譯為“robber-guard”（Hulsewé 1985, 66），遮蔽了其“傳遞文書、運輸物資、協助偵捕疑犯及監管刑徒的複合職能”（張新超 2018）；“坐”譯作“co-adjudicate”（Hulsewé 1985, 138）偏離“連坐”制度的集體擔責本質，較之“collective punishment”的現代法理表達顯失精準。此類譯法暴露出歷史語境與現代認知的闡釋斷裂。

綜上所述，何四維《秦律遺文》中刑罰英譯既有閃光點，又有亟待改進之處。誤譯理論認為，誤譯不僅源於語言差異，還涉及文化、歷史、社會背景等多重因素；而文化翻譯理論則強調，翻譯不僅是語言的轉換，更是文化的傳遞。基於這兩種理論，本文從《秦律遺文》中選取刑名術語誤譯的典型案例，從語言、法律和文化三個層面深入分析誤譯現象，並結合文化翻譯理論提出更優翻譯策略和譯文。

三、《秦律遺文》中刑名術語誤譯案例兩則

3.1 “棄市”誤譯分析

3.1.1 《睡虎地秦墓竹簡》中“棄市”的法律與文化內涵考析

(1) 文獻實證與法律界定。“《漢書·景帝紀》注引師古曰：‘棄市，殺之於市也’”（沈家本 1985, 139），《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進一步明確其執行流程：“士五（伍）甲毋（無）子，其弟子以為後，與同居，而擅殺之，當棄市”（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以下簡稱“整理小組” 1990, 110）。案例顯示，“棄市”適用於破壞宗法倫理的重罪（擅自殺害擬制繼承人），印證其作為法定刑的規範屬性。據《竹簡》釋義“在市場中當眾處死”，結合《釋名》“市死曰棄市。市，眾所聚，與眾人共棄之也”的訓詁，可析出該刑罰的構成要件：一是空間要件，行刑必須發生於“市”這一特定公共場域；二是程序要件，處決需公開執行（“當眾”）；三是結果要件，屍體須留置示眾（“棄”）。

(2) 法律功能的雙重維度。一是規範層面，宗法秩序的維護。該案例中“棄市”的適用，體現秦律對宗法繼承制度的嚴格保護。弟子作為擬制繼承人，其身份受法律認可（“以為後”），擅殺行為直接破壞“同居共財”的家族結構，故以極刑懲戒。這與《二年律令》“殺嗣子者棄市”（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2001, 139）形成法體系印證，表明秦漢律對血緣倫理的共性維護。二是社會層面，威懾機制的構建。通過“市”這一空間符號實現三重威懾：視覺威懾，通過公開處決形成感官衝擊，正如《商君書·賞刑》主張“明刑之尤至於無刑也”（石磊 2022, 120）的預防性懲戒理念；心理威懾，通過棄屍製造持續恐懼，其機制類似《韓非子·內儲說》“棄灰於道者刑”（韓非 2000, 598）的累積效應—以嚴懲輕微過失強化普遍畏懼，使民眾在長期震懾中自我約束；文化威懾，通過“與眾棄之”的儀式感強化集體排斥，其源頭可追溯至“《禮記·王制》‘刑人於市，與眾棄之’的禮制表達，以公開處決將個體罪行轉化為集體道德淨化，通過儀式性懲戒鞏固社會共識”（王文錦 2016, 245）。

(3) 文化符號的深層解讀。“棄市”超越單純刑罰，成為權力展演的文化裝置。空

間政治學認為，市場作為“權力容器”（Henri Lefebvre 1991，285—286），通過肉體懲戒重構社會空間秩序，這與秦代“棄市”中的“市”具有同構性；身體政治學認為，曝屍實現“規訓肉體”（Foucault 1975，30）向“懲戒肉體”轉化，體現早期帝國對身體的絕對支配；立法同構性認為，“棄”的儀式呼應周代“戮屍”傳統，《周禮·秋官》所載“凡殺人者，踣諸市”（孫詒讓 2015，2847）正是通過市集曝屍的公開懲戒，將法律威懾轉化為視覺化的禮制秩序，展現儒法思想的制度性融合；從刑罰輕重與治國理念的關聯來看，景帝“德政”思想下亦能印證“棄市”的權力展演特性，雖“‘棄市’與‘磔’在秦和漢同為死刑的一種，但棄市應較磔為輕”（劉海年 2017，87），這種刑罰梯度的設置，既體現了秦代對死刑執行方式的精細化掌控，也通過“輕刑”表象強化了德政治理的合法性，進一步凸顯“棄市”作為權力展演文化裝置的多元功能。

（4）學術爭議與本文立場。何有祖（2018）強調“棄屍”要素的獨立性，但本文堅持要件統一論，“刑殺”與“棄屍”構成不可分割的程序鏈條，秦簡“當眾處死”已隱含後續處置；從功能整體論看，若關注處決而忽略曝屍，將削弱其“持續示警”的社會功能。

3.1.2 《秦律遺文》中“棄市”誤譯分析：基於語言、法律和文化層面的考察

關於“棄市”的英譯，中國學者唐俊峰和張晉藩分別將其譯為“executed and cast away in the marketplace”（Tong 2023，110）和“exposing the executed body publicly at markets”（Zhang 2020，250），兩譯文體現兩大優點：一是語義完整性，均包含“處決”與“示眾”兩層關鍵語義，符合“棄市”在鬧市處死並暴屍的制度原貌；二是文化關聯性，保留“market”的場景信息，讓目標讀者感知該刑罰“公開羞辱”的文化功能，避免語境丟失。然而，何四維在《秦律遺文》中將其譯為“beheading”（Hulsewé 1985，139）。從誤譯理論視角審視，根據“概念—功能—語用”三重對等標準（萬立 2025），此譯法在概念上存在不對等，從而衍生出“功能不對等”，譯文在語言、法律及文化三個維度均存在系統性偏差，導致源語信息的嚴重損耗與目標語讀者的認知錯位。

首先，語言層面的誤譯，語義場的不完全映射。根據語義場理論，法律術語的翻譯應確保源語與目標語在概念範疇上的對應。然而，“beheading”僅聚焦於“斬首”這一行刑方式，而“棄市”的核心語義場包含三重要素：行刑方式（處決，不限於斬首）、執行場所（“市”，即公共鬧市）和後續處理（“棄”，即屍體示眾）。“beheading”僅覆蓋第一要素，導致語言層面的信息缺失，使目標讀者無法完整把握“棄市”的語義內涵。

其次，法律層面的誤譯，制度功能的錯位。從法律翻譯學角度看，刑罰術語的翻譯需兼顧制度功能對等。在秦代法律體系中，“棄市”並非單純的處決手段，而是具有特定法律邏輯的刑罰：一是適用範圍，適用於嚴重犯罪，如謀反、不孝等；二是程序意義，通過公開行刑強化法律威懾，正如《商君書·賞刑》所主張“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石磊 2022，124）；三是社會功能，以“與眾棄之”彰顯集體排斥效應。相比之下，“beheading”在普通法系中僅描述行刑方式，缺乏程序性、社會性維度，導致法律功能的窄化，使目標讀者難以理解其在秦律中的完整定位。

第三，文化層面的誤譯，象徵意義的消解。依據文化翻譯理論，“棄市”的翻譯

需考慮其作為文化符號的深層意義。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棄市”具有雙重象徵：一是空間象徵，“市”為人群聚集地，行刑於此強化“天罰”的公開性，《漢書·刑法志》“刑人於市，與眾棄之”（班固 1962，1099）與秦代“棄市”刑一脈相承；二是倫理象徵，屍體示眾體現“懲惡揚善”的禮教觀，契合《荀子·正論》“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思想（荀況 1988，328）。而“beheading”在西方文化中的聯想（如中世紀歐洲的貴族處決或伊斯蘭刑法）與秦代“棄市”的集體懲罰邏輯迥異，導致文化意象的錯位（cultural dissonance），遮蔽了其原有的社會規訓功能。

3.1.3 “棄市”翻譯策略與文化補充分析

針對“棄市”這一典型文化負載詞的英譯問題，本研究基於文化翻譯理論，通過對比分析不同翻譯策略的得失，提出最優解決方案。作為中國古代特有的刑罰術語，“棄市”蘊含三個核心文化要素：公開性、特定場所（鬧市）以及屍體示眾的懲戒功能，其翻譯難點在於如何在目的語中完整呈現這些文化特性。

在比較選擇翻譯策略過程中，研究發現：音譯法（Qishi）雖保留了原詞文化標記，但形成了語義真空；直譯法（abandon in the Marketplace）產生文化誤讀，將法律行為曲解為空間位移；傳統意譯法（public execution）存在文化損耗。這三種單一策略均未能有效解決文化缺省問題，導致譯文出現不同程度的“文化遮蔽”現象。

基於紐馬克文化分類理論，“棄市”屬於物質文化範疇中的制度文化術語，其翻譯應當遵循“文化補償”原則。本研究提出“音譯+註釋”翻譯法，譯為 Qishi (a form of capital punishment in ancient China, primarily implemented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here the convicted person was executed in a public market and their corpse was left exposed afterward.)，具有三重理論依據：首先，“public execution”對應刑罰的公示性本質；其次，“marketplace”還原《禮記·王制》“刑人於市，與眾棄之”的空間符號；最後，“corpse exposed”補充屍體示眾的懲戒語義。這種分層對應策略有效實現了文化翻譯的“最大等值”原則，音譯則保留了文化專有標識，避免概念被西方語境中的“public execution”消解。

從功能對等理論視角考量，該譯法雖在形式上有所擴展，但符合法律文本翻譯的準確性要求。通過同位語或註釋補充“棄市”的歷史語境，可進一步強化譯文的學術規範性。這種處理方式既避免了文化信息的過度簡化，又防止了譯文的過度異化，在文化傳真與讀者接受之間取得了平衡。

3.2 “城旦舂”誤譯分析

3.2.1 《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城旦舂”的法律與文化內涵考析

(1) “城旦舂”的法律屬性與刑罰體系定位。“城旦舂”是秦律中的核心刑名，衛宏《漢舊儀》載：“秦制：凡有罪，男髡鉗為城旦，城旦者治城也。女為舂，舂者治米也”（沈家本 1985，289）。“城旦舂”在《竹簡》中出現頻率極高，其相關術語（如“城旦”“小城旦”“完城旦”“城旦傳堅”“舂”“舂城旦”等）累計達七十餘次，表明其在刑罰體系中的關鍵地位。從法律性質來看，“城旦舂”屬於勞役刑，兼具身體刑

(如髡鉗)與期限刑(四年)的雙重特徵。據《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引如淳云:“律說,論決為髡鉗,輪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刑。”(整理小組 1990, 33)。這一記載明確揭示了“城旦”的刑罰內容:“刑期,固定四年;執行方式,男性‘城旦’強制築城,女性‘舂’則為搗米勞役”(張述錚 1994);常伴隨“髡鉗”(剃髮戴刑具)等身體刑,體現刑罰的複合性。

(2)“城旦舂”的文化內涵與社會功能。從文化視角看,“城旦舂”的設定體現了秦帝國兩大治理邏輯:一是資源榨取,通過制度化勞役將罪犯轉化為勞動力,“服務於長城、陵墓等國家工程”(李均明 2009, 223);二是威懾控制,公開化的勞役刑(如“城旦”築城)兼具儀式性懲罰功能,強化權力威懾。值得注意的是,“舂”對女性的專屬化處理,凸顯秦律“男女異刑”的傳統,其根源可能在於:一是生理差異,女性體力不適用於築城;二是社會分工,糧食加工為女性傳統職責;三是生育價值保護,避免女性在重勞役中傷亡。

(3)術語考辨的學術意義。對“城旦舂”的精準解讀,不僅關乎秦律刑罰體系的還原,亦對理解早期中國“刑徒經濟”(利用罪犯勞動支撐國家工程)與“性別化司法”具有範式意義,還關涉準確外譯和中國古代法律文化的國際傳播。

3.2.2 《秦律遺文》中“城旦舂”誤譯分析:基於跨法律語言學視角的考察

(1)誤譯問題分析。西方學者對“城旦舂”的翻譯雖各有側重,但均以“傳遞秦代勞役刑制度內涵”為核心目標,形成一定共識:Korolkov (2021)譯為“wall-builder for men or grain-pounders for women”,精準錨定“城旦—築牆”“舂—舂米”的勞作對應關係與性別分工,直接呼應刑名“適用對象差異化”的制度屬性;Yates (2021)補充“convicts”(刑徒)一詞,以“wall-builder (for males) and grain-pounder (for females) convicts”的表述,進一步強化“城旦舂”作為刑罰術語的“身份標識功能”,貼合秦律“刑名綁定身份”的制度邏輯;Lau (2014)雖將“城旦”簡化為“earth-pounder”(夯土者),但通過“an earth-pounder convict”與“a grain-pounder convict”的拆分譯法,仍保留“勞作內容+刑徒身份”的核心信息,未脫離“制度內涵傳遞”的基本框架。三者差異僅體現在對“城旦”勞作場景的細化程度,本質是對同一制度內核的不同表述側重。

相較之下,何四維在《秦律遺文》中將“城旦舂”譯為“a ch' eng-tan and a grain-pounder” (Hulsewé 1985, 168),其譯法與上述學者形成顯著差異,前者均以“解構制度要素(性別、勞作、身份)”為翻譯起點,而何四維的譯文卻陷入法律翻譯的三重核心矛盾,完全偏離“制度內涵傳遞”的目標:一是術語對等性缺失,不同於Korolkov等學者通過“wall-builder”“grain-pounder”等具象表述搭建“秦代刑名—現代認知”的橋樑,何四維對“城旦”採用音譯“ch' eng-tan”,未做任何制度性解釋,導致普通法系讀者無法關聯“築城勞役”的核心含義,形成術語認知斷層;二是文化負載信息流失,秦律“城旦舂”的性別分工(男築城、女舂米)與刑罰層級(勞役刑核心刑名)是兩大關鍵文化符號,Korolkov等學者通過“for men/for males”“for women/for females”明確傳遞性別屬性,而何四維以“a...and a...”的並列結構,既未區分性別差異,也未暗示二者同屬勞役刑體系,徹底消解術語的文化制度屬性;三是法律語域偏離,法律術

語翻譯需遵循“正式性、權威性”的語域要求，Yates、Lau 等均通過“名詞短語 + 身份限定”的嚴謹結構（如“wall-builder (for males) convicts”）貼合法律文本風格，而何四維“a ch’eng-tan and a grain-pounder”的非正式表述，更接近日常口語化表達，完全破壞法律文本的嚴肅性與專業性。何四維的譯法缺失“刑徒身份”這一核心概念要素，無法傳遞“懲戒”與“制度管理”的功能，根據“概念—功能—語用”三重標準（萬立2025）的邏輯關聯來看，其譯法核心問題始於概念殘缺，進而引發功能傳遞失效。

這一差異本質上是翻譯策略的分野：Korolkov 等學者採用“功能適配”策略，試圖在目標語中重構秦代刑罰制度的核心要素；而何四維的直譯策略，恰好印證 Šarčević (1997, 73) 提出的“法律翻譯困境”，即當源語言（秦律體系）與目標語言（普通法體系）存在“系統衝突”時，缺乏適配性調整的直譯，必然導致術語功能與制度內涵的雙重失真。

(2) 誤譯的多維解析。一是語言層面，術語生成機制的缺陷。原譯採用“混合譯法”（hybrid translation）：“城旦”音譯（ch’eng-tan），僅保留語音外殼，割裂與“築城”（city-wall building）的語義關聯；“舂”意譯（grain-pounder），則過度泛化，未體現“強制勞動”（penal servitude）屬性。由此可見，原譯違反了“術語一致性原則”，同一刑名被拆解為兩個獨立詞彙；而英文法律術語慣用“單一命名單位”（如 life imprisonment），而原譯結構鬆散，不符合專業文本規範。二是法律層面，系統功能的對等失效。秦律中“城旦舂”是“性別化勞役刑”的典型，其法律特徵見表 1。功能主義翻譯理論指出，法律翻譯需優先保障“文本功能對等”（Nord 1997, 50—52）。原譯未能實現規定功能，即未明確其作為刑罰的強制性，以及分類功能，即未區分其與“鬼薪”“白粲”等其他勞役刑的等級差異。三是文化層面，認知框架的傳遞斷裂。“城旦舂”蘊含文化模因（cultural meme），包括刑徒經濟，即國家通過制度化勞役開發罪犯勞動力，以及男女異刑，即基於生理差異的性別化司法傳統。原譯的文化缺省導致目標語讀者無法關聯“築城”與秦帝國軍事工程（如長城）的象徵聯繫，以及“grain-pounder”被誤讀為普通職業，而非刑罰手段。

表 1: “城旦舂”法律特徵

中文術語	法律屬性	原譯缺失內容
城旦	男性，築城，四年刑，附加髡鉗	刑罰性質、刑期、肉刑關聯
舂	女性，舂米，四年刑	性別專屬性與勞動強制屬性

3.2.3 誤譯溯因與重構策略

原譯存在誤譯，究其根源有二：一是歷時性隔閡，譯者未考慮“城旦”在秦漢語義場中的專指性（現代漢語中該詞已消亡）；二是體系性忽視，孤立處理術語，未置於秦律“刑等—勞役—性別”三維框架中解讀。基於“功能對等 + 文化補償”原則，本文提出翻譯策略重構方案，見表 2。

上述案例表明，秦漢分類術語翻譯需遵循如下原則：一是系統對等優先，在目標語法律體系中定位近似功能節點，如將“城旦舂”類比為“penal servitude with gender-

表 2: 翻譯策略重構方案

翻譯模型	示例	優劣分析
學術性譯註	<i>Chengdanchong (penal labour: men building city walls, women pounding grain, 4-year sentence)</i>	保留音譯權威性，通過副文本補足信息
功能對等譯法	Gendered penal servitude (construction/pounding)	突出性別分工，但弱化歷史術語特色
系統移植譯法	Qin-era chengdan (forced construction labor) and chong (female grain-pounding servitude)	平衡術語獨特性與可讀性
最優方案	結合“音譯+限定性註釋”(如上述學術性譯註)，既符合“術語透明性原則”，又能通過副文本(腳註、術語表)實現文化補償。	

specific tasks”；二是文化模因顯化，通過註釋、圖解重建歷史語境；三是術語生成標準化，建立秦漢分類術語庫，如“城旦舂 → Qin chengdan-chong”，避免即興創譯。

四、誤譯根源剖析

何四維英譯本《秦律遺文》作為西方學界研究秦律的重要參考，在刑名術語翻譯方面存在若干系統性誤譯問題。本文通過跨學科視角，從語言、法律文化、文獻學和譯者主體性四個維度深入剖析誤譯根源。

4.1 語言層面的雙重障礙：基於“語言知識層”的精準核查

知識翻譯學“語言知識層”強調對術語“歷史性與邏輯性”的傳遞，這一視角可指導解析秦律刑名翻譯的語言障礙。

(1) 歷時性語言斷層。秦律古漢語詞彙通假(如“城旦”之“旦”(張述錚 1994)需結合《史記》如淳注“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方能確證其為“築”)、特殊句式(如“當黥為城旦”的判決句式易被誤譯為一般陳述)、語義歧義(如“盜足”與“斬止”同釋為“斷足”(整理小組 1990, 119、123)，卻分屬刑具(鐵鐐)與肉刑(剕足))，本質是譯者未充分掌握秦代語言知識的歷史性，未銜接簡牘語境與傳世文獻注疏，導致術語語義傳遞偏離秦代真實所指。

(2) 共時性語言差異。中英法律語言的術語不對等(無“鬼薪白粲”對應勞役刑概念)、結構矛盾(漢語刑名術語的濃縮性 vs. 英語解析性表達)、功能偏差(如“棄市”的示眾功能在 execution 中缺失)，則反映譯者未實現語言知識的邏輯性適配，未針對法律語言體系差異調整表述，造成術語功能語義流失。

4.2 法律文化的結構性隔閡：依託“概念匹配”與“文化語境衝突”視角

現有研究的“概念匹配”與“文化語境衝突”視角，可揭示法律文化隔閡的核心問題。

(1) 思想基礎認知偏差。法家“以刑去刑”思想與西方人權觀念的衝突，導致譯者將“盜采人桑葉，臧(贓)不盈一錢，可(何)論？貲徭三旬”(整理小組 1990, 95)的“輕罪重罰”弱化為一般刑罰，“謫戍”的“懲罰性戍邊”(penal exile + frontier service)簡化為“assign with remuneration”(有償指派)(Hulsewé 1985, 73)，本質是未實現秦代“刑名概念”與西方“刑罰概念”的深度匹配，忽視了刑罰背後的威懾邏輯與制度功能。

(2) 制度體系理解缺失。譯者對秦律“刑徒等級制”(如“城旦舂”與“隸臣妾”存在勞役強度差異)、刑罰組合規則(如“黥劓為城旦”附加刑邏輯)的認知空白，體現“文化語境衝突”的制約，西方讀者對秦代法律體系的認知框架缺失，導致譯者未在譯文中傳遞制度關聯性，破壞術語的體系屬性。

(3) 文化符號解碼失敗。“棄市”誤譯為“beheading”，丟失“市”的懲戒劇場功能與“棄屍”的“規訓”機制(Foucault 1975, 30)，正是“文化語境衝突”的典型表現，譯者以歐洲中心主義認知類比秦代文化符號，未解碼“棄市”的空間與政治雙重語義。

4.3 文獻學的客觀限制：影響“語言知識”傳遞的前提條件

文獻學層面的物質載體局限(竹簡殘損如睡虎地秦簡 80 枚)與釋讀爭議(“盜足”的刑具/肉刑之爭、“收孛”連坐範圍分歧)，雖屬客觀條件，但會直接影響“語言知識層”的準確性，考古推測的偏差或錯誤釋讀觀點被譯者採納，將導致術語語義從源頭偏離，這也要求翻譯需結合文獻學研究成果，確保語言知識傳遞的前提可靠。

4.4 譯者主體性干預：結合“譯者慣習”與“技術知識層”分析

“譯者慣習”理論與知識翻譯學“技術知識層”(翻譯方法適配性)，可解析譯者干預的核心影響。學術背景局限，西方漢學家的法律知識盲區(如不理解“刑徒等級制”)、法學家的古文字學短板(如誤讀“盜足”語義)，反映“譯者慣習”中知識結構的缺陷，直接制約語言知識的準確傳遞；認知框架與技術策略失當，歐洲中心主義的類比傾向(“棄市”比附 beheading)，以及直譯、增譯等技術方法的適配性不足，均屬“技術知識層”問題，即譯者未根據秦律語境選擇適配策略，導致術語概念偏差，這與知識翻譯學“技術知識需輔助語言知識傳遞”的要求相悖。

五、秦律刑名術語英譯改進策略

針對何譯本的誤譯問題，結合新出秦簡史料與翻譯理論發展，可從譯者能力、翻譯方法、學術協作、語境把控及譯後驗證五個方面構建系統性改進策略。

5.1 建設專業能力矩陣

法律典籍譯者須具備深厚的古漢語與現代漢語功底，因而應系統學習古漢語語法和詞彙學知識，研讀經典古籍以提高古漢語文字理解能力。同時訓練現代漢語表達能力，確保準確還原古漢語語義並通順中文闡釋。此外，深入研究中國古代法律知識和目標語言國家法律知識，掌握其體系框架與法律術語內涵。若研究秦律翻譯，譯者還應研究秦代歷史文化背景，通曉秦漢刑罰、量刑標準和適用條件等，以實現刑罰名稱翻譯的準確性。有鑑於此，本文提出建設專業能力矩陣，如表 3。

表 3: 專業能力建設矩陣表

能力維度	培養內容	實施路徑
古漢語能力	通假字辨識、簡牘語法、訓詁學	精讀《說文解字注》《秦簡文字研究》
法律史學	秦漢刑罰體系、罪名分類、量刑規則	研修《秦漢法制史》《二年律令與秦律比較》
文化符號學	禮法關係、空間政治學、身體觀	研習《中國古代法律文化》《規訓與懲罰》

5.2 翻譯方法論創新

(1) “三維定位”翻譯法。這是一種基於文本類型、受眾需求和文化語境三個核心維度，動態調整翻譯策略的綜合性方法。其核心在於通過多維度分析，精準定位翻譯的功能目標，從而選擇最適配的轉換手段，平衡“準確性”“可讀性”與“文化適應性”。具體到秦律的刑名術語翻譯，其實施步驟見表 4。

表 4: “三維定位”翻譯法步驟表

實施步驟	操作內容	工具/方法
法律定位	確定刑罰在體系中的層級，如主刑/附加刑；在《秦律十八種》中出現的頻率與適用罪名	語料庫檢索
文化定位	解析符號背后的思想體系，如“鬼薪”與祭祀文化；分析《日書》相關記載，還原行刑場景	考古報告分析
語言定位	構建術語翻譯的“最小完整單元”，比較英語法律史中的近似概念，如羅馬法的“damnatio”	比較法學

(2) 分層補充策略。在翻譯過程中，它是根據文本類型、目標讀者需求或信息重

要性，將翻譯內容劃分為不同層級，並針對層級採取差異化的補充手段，如註釋、釋義、文化替換等，以實現信息傳遞的準確性與適應性的平衡。以“棄市”英譯為例，見表 5。

表 5: “棄市”英譯分層補充策略流程圖

A[基礎層] → B(音譯轉寫 + 術語表)
A → C(結構對譯)
B → D[“Qishi (棄市)”]
C → E[“public execution with corpse exposure”]
A → F[闡釋層]
F → G(文內說明)
F → H(腳註拓展)
G → I[“ritualized capital punishment”]
H → J[《漢書》引文 + 功能分析]

該分層補充策略流程圖包含基礎層和闡釋層。基礎層中，音譯轉寫（如“Qishi”）配合術語表，保留源語文化特徵；結構對譯（如直譯英文對應表達），則提供字面理解基礎。闡釋層中，文內說明，即用簡短語境化解釋（如“ritualized”）提升可讀性；腳註拓展，則是通過文獻引用和深度分析滿足學術需求。圖表用箭頭表示從基礎到闡釋的遞進補充；圖表分層清晰，基礎層側重形式傳遞，闡釋層側重意義與文化解析。

5.3 跨學科協作機制

秦律法律術語翻譯，應該加強跨學科協作機制構建：一是建立“三位一體”審校流程。這是一種系統化的翻譯質量控制方法，在譯文定稿前，由語言專家、領域專家、母語審校員三方分別從語言規範、專業準確性、文化適切性三個維度進行獨立審校，最終整合優化，確保譯文達到出版級標準。具體到秦律刑名術語翻譯，流程如：考古學家（文本釋讀）→ 法律史學者（制度定位）→ 翻譯學家（表達優化）；二是建設動態術語庫。建立秦律術語的“釋義-譯法-出處”數據庫，尤其要標註學術爭議點（如“盜足”的不同解釋），並根據術語的釋義進程對英譯術語庫予以動態調整。

5.4 語境化翻譯策略

這是一種以動態語境分析為核心的翻譯方法，強調在翻譯過程中綜合考慮文本內外因素（如交際目的、受眾認知、文化背景、適用場景等），靈活選擇適配的翻譯手段，使譯文既忠實於原文意圖，又自然融入目標語境。古代科技術語研究中提出的“歷史語境—學科語境—語言語境”三重框架（劉性峰、魏向清 2021），對秦律刑名術語英譯具有直接指導意義。可將刑名術語置於秦代“法律體系語境”（如律令條文的邏輯關係、刑罰制度的層級關聯）、“社會文化語境”（如刑罰的教化功能、刑名與社

會等級的適配性)、“語言表達語境”(如簡牘文書的簡潔表述習慣、術語在具體律文語境中的語義指向)中系統考察,由此精準揭示現有譯本中因單一語境解讀、多語境割裂導致的誤譯問題,為翻譯策略優化提供明確方向。

具體到秦律刑名術語英譯,語境化翻譯策略的實踐可聚焦兩類核心路徑:一是歷史語境還原。作為融合翻譯與闡釋的方法,需通過系統考察秦代社會制度、思想潮流、語言習慣等,在譯文中完整再現原文的歷史文化內涵,避免因時代差異導致誤讀或信息流失。例如,翻譯秦代刑名時可以配套製作“刑罰執行流程圖解”,直觀呈現刑名對應的執行流程;附加《秦代行政地理》中的市場分佈圖等史料,輔助解讀“遷刑”“謫刑”等與地域相關刑名的語義指向;二是文化語境補償。針對源語與目標語的文化差異,通過增補註釋、改寫說明、文化類比等手段,在譯文中修復或重建文化信息,解決因文化缺省導致的語義流失或誤解。例如,可插入“法家思想關鍵詞”對照表,明確“刑”“罰”“罪”等術語與法家“緣法而治”理念的關聯;提供《周禮》與秦律的禮法關係說明,幫助目標讀者理解秦律刑名對前代禮制的繼承與變革,進而準確把握“贖刑”“耐刑”等術語的文化內涵。

5.5 建立譯後驗證機制

為保障翻譯質量,需建立“學術同行評議+目標讀者測試”雙重譯後驗證機制,對譯文的準確性、可讀性與文化傳遞效果全面評估,形成“翻譯—驗證—修正”閉環。

一是學術同行評議:邀請秦史專家評估刑名內涵與歷史背景的準確性;法史專家評估刑名的體系定位與法律屬性是否精確;翻譯學專家評估譯文的語言規範性與可讀性,依據專家意見修正譯文,明確其體系地位。

二是目標讀者測試:選取西方漢學研究者(學術讀者)與英語母語普通讀者(大眾讀者)開展測試。對學術讀者採用深度訪談,評估譯法的學術嚴謹性與史料契合度;對大眾讀者採用問卷調查,評估譯法的可讀性與文化理解度,核心指標包括“職能清晰度”“文化內涵感知度”“術語接受度”。

六、結語

《秦律遺文》中刑名術語誤譯的產生,是譯者專業素養、翻譯方法適配性、跨學科協作程度及語境把握能力等多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精準還原秦律刑罰的真實面貌,不僅是學術研究的核心訴求,更對推動中國古代法律文化國際傳播具有現實意義。基於本研究總結的誤譯規律,後續研究可從三方面推進實踐與理論深化:其一,落實術語標準化研究,構建“秦律刑名術語英譯規範參照表”,既針對性解決譯本具體誤譯問題,也為古代法律術語翻譯體系完善提供實證支撐;其二,結合數字人文理念,依託新出土秦簡史料搭建小型秦律刑名術語語料庫,強化研究對翻譯實踐的指導價值;其三,通過強化譯者法律史學與翻譯學交叉素養、創新“法律語境+文化背景”雙維度翻譯方法、深化法學與語言學跨學科協作,全方位突破刑名術語翻譯困境,實現語言準確性、法律專業性與文化完整性的多維度統一,為國際秦律研究界提供精準文本參

考，為中國古代法律文獻國際傳播搭建可靠橋樑。

本研究仍存在明顯局限：從模因論“變異—選擇”視角來看，研究視野聚焦於英文譯本，未納入日韓等其他語種的秦律譯本，難以完整呈現刑名術語跨文化傳遞的篩選機制，也無法全面展現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下翻譯差異特徵；同時，未能構建可直接應用的刑名術語雙語對照工具。未來可從三方面拓展：一是參考民族經典多語種譯本對比方法，納入日韓等多語種譯本開展對比分析，探究不同語言體系對刑名術語語義傳遞的影響；二是借鑑語料庫建設思路，依託新出秦簡史料與大數據技術，構建“秦律刑名英譯對照數據庫”，為翻譯準確性校驗提供數據支撐；三是將研究對象延伸至漢律、唐律等其他朝代法律典籍，逐步完善中國古代法律術語翻譯體系，為古代法律文化的全球化傳播提供更系統的學術支撐。

基金資助：

2024 年度廣東省普通高校特色創新項目（哲學社會科學）《〈秦律〉法律術語的語境化英譯研究》（項目編號：2024WTSCX136）。

參考文獻

- Foucault, Michel. 197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Hucker, Charles Oscar. 1981.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lsewé, A.F.P. 1985. *Remnants of Ch' in law: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Ch' in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Rules of the 3rd Century B.B., Discovered in Yün-meng Prefecture, Hu-pei Province, in 1975*. Leiden: E. J. Brill.
- Hulsewé, A. F. P. 1978. "The Ch' in documents discovered in Hupei in 1975." *T' oung Pao*: 175-338. <https://www.jstor.org/stable/4528137>.
- McLeod, Katrina C. D., and Yates, Robin D. S. 1981. "Forms of Ch' in Law: An Annotated d Translation of the Feng chen shih."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1 (1): 111-163. <https://doi.org/10.2307/2719003>.
- Korolkov, Maxim. 2021. "Between command and market: Credit, labour, and accounting in the Qin Empire (221–207 BCE)." In *Between Command and Market*, 162-243. Leiden: E.J. Brill.
- Lau, Ulrich. 2014. "Qin Criminal Case Records of the Collection Wei yu deng zhuang." *Oriens Extremus* 53: 139-192. <https://www.jstor.org/stable/26372427>.
- Lefebvre, Henri.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 Nord, Christiane. 2014.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Šarčević, Susan. 1997. *New Approach to Legal Translation*. Dordrecht: Kluwer Law Interna-

tional BV.

Staack, Thies, and Lau, Ulrich. 2016. *Legal practice in the formative stages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exemplary Qin criminal cases from the Yuelu Academy collection*. Leiden: E.J. Brill.

Tong, Chunfung. 2023. “The Reformation of Social Order in the Qin Empire” . *Asia Major* 1: 95-136.

Yates, Robin.D.S. 2021. “Female Commoners and the Law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In *Rulers and Ruled in Ancient Greece, Rome, and China*, edited by Hans Beck and Griet. Vankeerberghen, 156-19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hang, Jinfan. 2020.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s in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egal Civilization+*, 249-380. Singapore: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981-10-1029-3_4.

班固。1962。《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陳松長。2019。《嶽麓秦簡與秦代法律制度研究》。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戴擁軍。2024。〈論典籍核心術語翻譯的言語行為特質與話語功能——從“法家”的英譯個案談起〉。《外語學刊》1：38-42。 <https://doi.org/10.16263/j.cnki.23-1071/h.2024.01.006>。

方芳。2020。〈科學經典誤譯及傳播問題之探——“語料信息庫”介入後的翻譯網絡重建〉。《上海翻譯》2：23-27。 <https://doi.org/CNKI:SUN:SHKF.0.2020-02-005>。

韓非。2000。《韓非子·內儲說上》（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何有祖。2018。〈再論秦漢“棄市”的行刑方式〉。《社會科學》11：137-145。 <https://doi.org/10.13644/j.cnki.cn31-1112.2018.11.015>。

胡波。2025。〈知識翻譯學視域下法律術語翻譯的語境原則探析〉。《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1：81-88。 <https://doi.org/CNKI:SUN:GWJX.0.2025-01-008>。

蔣非非。1995。〈秦代謫戍、贅婿、閭左新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55-61。 <https://doi.org/CNKI:SUN:BDZK.0.1995-05-009>。

李均明。2009。《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北京：文物出版社。

連宏。2016。〈漢代磔刑考辨〉。《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69-174。 <https://doi.org/10.16164/j.cnki.22-1062/c.2016.02.030>。

劉海年。2017。《戰國秦代法制管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劉性峰、魏向清。2021。〈交際術語學視閥下中國古代科技術語的語境化翻譯策略〉。《上海翻譯》5：50-55。 <https://doi.org/CNKI:SUN:SHKF.0.2021-05-010>。

孟天倫。2024。〈霍克思譯《紅樓夢》的誤譯現象及成因〉。《長春師範大學學報》5：115-118。 <https://doi.org/CNKI:SUN:CCSS.0.2024-05-022>。

錢屏勻。2022。〈似非而是的“誤譯”背後——以《三國演義》羅慕士英譯本策略考論為中心〉。《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148-160。 <https://doi.org/CNKI:SUN:GWJX.0.2022-02-017>。

- 曲倩倩。2023。〈有意誤譯或無意誤譯：《備急千金要方》海外譯本評析〉。《中國中西醫結合雜誌》2：241-245。
- 沈家本。1985。《歷代刑法考》。北京：中華書局。
- 石磊。2022。《商君書譯注》。北京：中華書局。
-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1990。《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 孫詒讓。2015。《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
- 萬立。2025。〈立法術語翻譯的規範對等原則——以三對行政法術語英譯為例〉。《中國翻譯》4：143-149。 <https://doi.org/CNKI:SUN:ZGFY.0.2025-04-019>。
- 王文錦。2016。《禮記譯解》。北京：中華書局。
- 王燕。2025。〈誤譯與傳承：翟理斯英譯蘇詩與《千家詩》的文化淵源〉。《文史知識》1：97-105。 <https://doi.org/CNKI:SUN:WSZS.0.2025-01-013>。
- 魏清光、李躍平。2023。〈我國民族文學經典英譯本誤譯及其應對——以《塵埃落定》《薩迦格言》《阿詩瑪》為例〉。《民族學刊》4：123 - 133+148。 <https://doi.org/CNKI:SUN:MZXX.0.2023-04-015>。
- 吳萇弘。2021。〈數字人文發展中的法律術語英譯規範與策略〉。《外語電化教學》6：81-86+13。 <https://doi.org/CNKI:SUN:WYDH.0.2021-06-011>。
- 吳萇弘。2022。〈中國特色法律術語英譯：困境與價值選擇〉。《外語與外語教學》5：125-133+149-150。 <https://doi.org/10.13458/j.cnki.flatt.004887>。
- 尚海燕、徐琚。2024。〈模因論視角下術語譯名規範化過程探析：變異、選擇與保持〉。《外語學刊》5：68-75。 <https://doi.org/10.16263/j.cnki.23-1071/h.2024.05.010>。
- 荀況。1988。《荀子集解》（王先謙（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 張法連、賈小蘭、湯文華。2024。〈概念整合理論下的《民法典》特色法律術語翻譯〉。《中國翻譯》1：152-159。 <https://doi.org/CNKI:SUN:ZGFY.0.2024-01-020>。
-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2001。《張家山漢墓竹簡 [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 張新超。2018。〈試論秦漢刑罰中的司寇刑〉，《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173-183+192。 <https://doi.org/10.13718/j.cnki.xdsk.2018.01.019>。
- 張述錚。1994。〈“城旦、城旦春、城旦書”考釋〉。《河北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106-110。 <https://doi.org/CNKI:SUN:HBSY.0.1994-02-019>。
- 張旭冉、戈玲玲。2024。〈中國典籍中的誤譯現象及其規避策略——以《道德經》英譯本為例〉。《翻譯與傳播》2：3-17。 <https://doi.org/CNKI:SUN:FYCB.0.2024-02-001>。
- 曾建萍。2024。〈許淵沖對王實甫《西廂記》英譯的文化誤讀與誤譯〉。《青年文學家》16：131-133。 <https://doi.org/CNKI:SUN:QNWJ.0.2024-16-128>。
- 曾素英、Eric Poirier、岳巧雲。2023。〈阿瑟·韋利對中國《詩經》的文化誤讀與誤譯〉。《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135-142。

他鄉的菱角花——《紅樓夢》香菱人物形象的英譯與再創造

張冰

Address: International College, Gu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Guangzhou, China

E-mail: 375115162@qq.com

Correspondence: Bing Zhang

Citation: Zhang, Bing. 2024. “The Caltrop Flower in a Foreign L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Re-creation of Xiangling’s Character in *Hong Lou Meng*.” *Translation Quarterly* 114: 57-76.

Abstract

The Caltrop Flower in a Foreign L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Re-creation of Xiangling’s Character in *Hong Lou Meng* (by Bing Zhang)

This article takes Yinglian (or Xiangling), a female character in Hong Lou Meng, as its research subject. Tracing her tragic life trajectory as the narrative thread, it examines the evolution and representation mechanisms of her character image across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se vers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directly affects the “visibility” and conveyance of the character’s connotations, while differences in translation form (complete or abridged) profoundly influence the completeness and coherence of the character portrayal. Translators,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translation poetics, target-culture presuppositions, and personal interpretation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ross-cultural reshaping and re-creation of Xiangling’s image. Specifically, the Hawkes translation employs strategies of dynamic correspondence and appropriate narrative intervention, visualizing the character’s fluctuating identity and symbolic fate through dynamic changes in translated names. This strategy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hermeneutic concept of the “fusion of horizons”, where the translator, after deeply engaging with the source text context, creatively transforms their understanding into a literary form perceptible to target readers. In contrast, the transliteration strategy consistently used in the Yangs’ translation, while maintaining maximum formal fidelity on a linguistic level, inadvertently sacrifices the narrative function and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names, resulting in some diminishment of the version’s literary expressiveness. The abridged translation by Wang interprets the character through plot refinement and condensation, making Xiangling’s image more prominent and intensifying the core tragic arc, representing a creative reconstruction centered on the cognitive habits of

the target-language reader. This confirms that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themselves constitute a potent form of criticism and reinterpretation. Conversely, McHugh's translation results in a "static" characterization due to indirect translation, underscoring how informational loss in cross-literary communication constrains the construction of artistic depth. By examining Xiangling's case,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systematic erosion of secondary characters' symbolic value in translation, offering a new critical perspective for studies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ong Lou Meng.

一、引言

中國傳統文學史上，香草與美人相互攀附而生是敘寫者常見且喜聞樂見的景觀。這一手法上至屈原的《離騷》、《九歌》中的人物精怪，下到宋元話本中的女神仙子，再延伸到明清小說文學作品中意涵不同的各種香草式人物的悲歡離合故事。朱顏皓齒的嬌嫩生命與由香草美花般青春所喚起的美感是如此之嬌媚動人，而以物喻人絕非中國傳統文學所獨有，古希臘神話故事中的月桂和向日葵就是由美麗的女性幻化而成（康來新 1985，37）。在《紅樓夢》（以下簡稱《紅》）所書寫的女性王國中，作者自然而然地使用了這一傳統書寫手法，讀者最為耳熟能詳的便是女性主角人物林黛玉——靈河岸邊的一株絳珠仙草。除了主角女性人物之外，次要人物中頗為讀者稔熟的女性人物便是“英蓮”，她是“全書的起結人物之一”，是“一部中之大關鍵”，“寓全書之旨”（何紅梅 2006，125-141）。“英蓮”始見於紅樓夢境展開之前（第 1 回），夢醒之後方才飄然而逝（第 120 回），同時還見證了賈府的興衰盛亡及主角人物的悲歡離合故事（全書共 11 回與之相關）。英蓮的一生飽受命運捉弄，難料的事和無常的人生在其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從她一連串的改名軌跡就可以窺見其苦難人生際遇的輪廓：從嬰孩時的“英蓮”到少女時代的“香菱”，再到嫁為人婦後的“秋菱”，最後再回歸至乃父口中的“小女英蓮”，這一組峰迴路轉式的改名歷程，體現出作者命名的匠心巧思，使其成為《紅》女性人物世界中的一朵奇葩。

二、文獻綜述

作為《紅》中極具象征意涵與命運張力的女性角色，英蓮（香菱）不僅承載著深厚的文學隱喻，其形象本身的複雜性與悲劇性也構成了跨文化傳遞的重要話題。然而，當前學界對《紅》女性人物的形象翻譯問題，雖已形成較為系統的研究譜系，卻仍存在明顯的關注失衡，主要角色如黛玉、寶釵等已有充分討論，而如英蓮（香菱）這般兼具符號意義與敘事功能的次要角色，其譯介與形象再現問題尚未獲得應有的深入探索。鑒於此，本節我們將回顧既有研究對《紅》女性人物翻譯的整體聚焦與演變脈絡，指出其中存在的缺失與可拓展空間。

2.1 《紅》女性人物翻譯研究的譜系與焦點演變

《紅》的英譯與研究，歷經近兩個世紀的沉澱，已形成一個豐富的學術譜系。在人物翻譯研究這一子領域，女性主要角色的形象傳達吸引了最多學術關注。學者們普遍以霍克思和楊憲益的兩大經典全譯本為藍本，對主要女性角色如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等人的形象翻譯進行了深入分析。例如，馮慶華（2006）系統對比了《紅》霍、楊譯本中釵、黛語言所展現的人物特質，探討了譯者如何通過選詞來塑造人物形象。陳德用、張瑞娥（2006）對王熙鳳個性化語言的翻譯展開譯本間（霍、楊譯本）對比分析，認為人物個性化語言翻譯須兼顧形式與內容，否則人物形象將失去“靈魂”。崔小清、李依芸（2025）從形象學視角對霍譯本中黛玉形象重塑進行討論，發現霍譯在忠實原文的基礎上，基於目標語讀者審美體驗的目的，對黛玉形象進行了創造性的重構，如強化黛玉的優雅氣質、外顯其情感與心理活動，弱化其柔弱與含蓄之美等。類似的研究還有薛傲霜、唐均（2016）、楊函琪（2021）、董天（2025）等，這些研究證實，譯者對主要角色的處理充滿主觀能動性，其文化立場和翻譯哲學深刻影響著人物形象的最終呈現。此外，還有學者從語料庫視角審視不同譯本對於《紅》主要女性人物的再現問題。如姚琴（2013）基於霍譯《紅》一對一平行語料庫指出，霍譯通過釋意與增添來實現意義顯化，動因在於對英漢文化差異的敏感及對西方受眾接受度的考量。張丹丹、劉澤權（2016）、劉澤權（2023）等在建立一對多平行語料庫的基礎對王熙鳳等《紅》女性主角人物英譯形象展開討論。這些借助語料庫工具對人物形象所進行的量化分析增強了結論的可觀測性。

2.2 次要女性角色翻譯研究的缺失與拓展空間

《紅》主要女性人物的翻譯研究已十分豐碩，而針對次要女性人物的翻譯研究卻顯得較為薄弱，儘管她們在建構小說宏大敘事和社會背景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當前研究呈現出零星提及，缺乏系統性的問題，部分學者在論述中偶爾對次要角色進行片段式分析（如劉澤權（2007）；洪濤（2010）；黨爭勝（2012）等）。系統性地以次要女性角色為核心，深入探討人物形象跨文化傳遞的研究則付之闕如，實有遺珠之憾。作為貫穿小說始終的次要女性角色，英蓮（香菱）是“金陵十二釵”副冊之首，更是串聯起薛家故事的紐帶，她的形象兼具符號性與悲劇性。現有的翻譯研究文獻中，對英蓮這一人物的專門探討尚屬匱乏，大多數研究僅在討論人物判詞翻譯或群體形象分析時對她有所涉及（如楊安文、馮家歡（2018）；劉澤權（2023）等），說明英蓮作為《紅》中一個具有獨特命運軌跡和符號意義的人物，在跨文化譯介中的表現值得更多關注。

英蓮作為貫穿小說“真一幻”二元敘事的紐帶式人物，其形象建構蘊含多重動態張力，“有命無運”判詞與詠月詩讖的互文性指涉，“香魂返故鄉”結局對儒家倫理秩序的終極解構等，使其成為檢驗譯本文化轉碼能力的特殊標本，譯者如何平衡中國古典詩詞的隱喻傳統與目標語讀者的認知圖式？是否保留了對封建才德觀的隱性批判？系統分析英蓮人物形象的翻譯，不僅能填補特定對象的研究不足，更能以小見大，揭示譯者在處理命運感強、文化內涵豐富的次要人物時所採取的策略及其背後的動因。

三、理論框架與研究語料

翻譯研究文化學派視譯者為具有主體性的文化重寫者，強調其在不同規範制約下對文本進行的創造性轉化。這一理論立場為我們考察《紅》中英蓮（香菱）形象的跨文化重構提供了立足點，譯者的選擇不僅關乎語言轉換，更涉及文化隱喻、文學意象和悲劇命運的傳遞。下面我們分別從理論框架和研究語料兩個側面進行論述。

3.1 理論框架

翻譯研究文化學派視文學為一個較為複雜的動態系統，主張對文學翻譯“進行以譯入語為中心的描述性、功能性及系統性的研究”，並重點關注那些控制翻譯產生及接受的“規範及約束機制”（謝天振 2008，198）。二十世紀 70 年代末以來，該學派的研究範疇持續擴大，如描寫翻譯理論和多元系統理論等（Hermans（1985）；Holmes（1988）；Zohar（2000）；Gentzler（2001）等）將研究視角轉向文化及其（再）生產，通過諸多探索性實踐，力圖揭示翻譯行為內在的“創造性”，並將其作為一種“寫作”形式進行重新審視。就翻譯與原作之間的關係來看，忠實不再是翻譯的絕對標準與終極目標，原文亦不再是至高無上的權威，譯者既不是處於翻譯過程中的隱形人，亦不是原作的僕人，而是可以對原作進行創作/改寫的主體，賦予原作以不一樣的來生（Benjamin 1992，17）。隨著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譯者的地位得到明顯提升，賦予譯者更多的自由與靈活性，可以使譯者最大程度地發揮譯者的主觀能動性，從而使改寫本身蘊含了豐富的創造性。本研究以文化學派對翻譯的上述定位為出發點，將譯者的翻譯行為視為一種具有創造力的文化實踐。在此框架下，將進一步探討譯者如何通過其主體性介入，對原文進行創造性轉化，並揭示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互動與權力關係。

3.2 研究語料

早在 1830 年，英國皇家學會會員 John Francis Davis 便翻譯了《紅》第三回的片段，開創了《紅》英譯的先河。事實上，《紅》的譯介歷程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漫長而漸進的過程。在近兩個世紀的時間裏，陸續產生了包括片段翻譯、章節翻譯、節譯本和全譯本在內的十餘種英文譯本（劉澤權、劉豔紅，2011）。這一持續的、多元的翻譯活動，共同構成了《紅》在英語世界的接受史。直至上世紀 20 年代，《紅》的英譯活動才逐漸擺脫了零散片段的格局，呈現出系統化與商業化的趨勢。王際真分別於 1929 年及 1958 年兩次節譯《紅》，這個譯本得到了“包括亞瑟·韋利、賽珍珠在內西方主流翻譯家和作家的高度認可，多次再版或重印，擁有數量眾多的西方讀者”（管興忠 2016，65）。麥克休姐妹（Florence and Isabel McHugh）於 1958 年根據庫恩（Franz Kuhn）的德譯本轉譯的英文本問世，進一步拓展了《紅》在歐洲的傳播範圍。然而，真正的翻譯里程碑出現於二十世紀下半葉，即霍克思（David Hawkes）與閔福德（John Minford）合譯的五卷本《石頭記》（*The Story of the Stone*，1973-1986），以及楊憲益與戴乃迭（Gladys Yang）夫婦合譯的三卷本《紅》（*A Dream of Red Mansions*，1978-1980）。劉澤權（2006，95）認為，在面向西方讀者的《紅》譯介歷程中，有五種英譯本被視

為最具代表性的實踐成果，這裏所述的五種英譯本，除了前文所述的兩個全譯本和兩個節譯本外，還包含了喬利（Bencraft Joly）的前 56 回譯本。考慮到喬利譯本的不完整性和研究的實際需求，本研究以《紅》兩個全譯本（霍克思翁婿譯本和楊憲益夫婦譯本）和兩個節譯本（王際真譯本和麥克休姐妹譯本）為研究對象，系統描述四位譯者在英語語境中對英蓮（香菱）形象的跨文化重構現象。

四、分析與討論

人物研究歷來是中國古代小說文本分析的核心問題（潘建國 2017，64），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巔峰之作，《紅》在情節敘事、形象塑造與建構小說框架方面展現出較高的藝術成就，諸多細節更體現出“草蛇灰線、伏脈千裏”的敘事美學。小說中“英蓮”一名的寓意，學界歷來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是“風雪落英之謂也”，“亦謂顰顰之應憐也”（轉引自一粟 1963，185-189）。也有觀點指出，該形象實為諸多女性的“小影”，象徵“偌多女子的命運”（邱瑞平 1997，138）。英蓮形象生動，卻命運多舛，她不僅親歷賈府由盛轉衰的過程，更在容貌氣質上與秦可卿互為映照，間接勾連起“寶釵”與“黛玉”之美，承載了深層的敘事隱喻與悲劇預示。因此，我們依據她在故事不同發展階段所呈現的形象特徵逐層展開分析與討論。

4.1 英蓮的出場

世人皆愛蓮花之“出淤泥而不染”，品質高雅。甄士隱以“蓮”為其女命名，是一種寄託與期冀，同時也影射出“英蓮”的不俗出身。英蓮首次登場於小說第 1 回，作者為其設定了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出生環境——“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的姑蘇城，生長於“鄉宦”之家。其父被描述為“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的“神仙一流人物”，母親則“性情賢淑，深明禮儀”，堪稱傳統閨秀的典範。儘管甄家“雖不甚富貴”，卻仍被推許為“本地望族”。這樣的家世背景，為英蓮的身份與命運埋下了深刻的文化與敘事伏筆。

原文：“又見奶姆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妝玉琢，乖覺可喜”（曹雪芹 2010，9）。

王譯：“Just then the nurse came up with his daughter Lotus in her arms and Shih-yin was filled joy and pride as he observed how pretty and lovable she had grown to be.” (Cao 1958，11)

麥譯：The nurse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with little Lotus in her arm. Shih Ying took the child from her, pressed it tenderly as a jewel to his bosom, and dandled it and played with it for a while. (Cao 1958，5)

霍譯：the wet-nurse at the door with his little daughter Ying-lian in her arms. Her delicate little pink-and-white face seemed dearer to him than ever at that moment. (Cao 2014，13)

楊譯：The nurse came up then with Ying-lien in her arms, and it struck Shih-yin that this daughter was growing prettier and more lovable every day. (Cao 1994, 9)

這是“英蓮”在《紅》中首次登場，年僅三歲的她生得“粉妝玉琢，乖覺可喜”，更是家中獨女，種種跡象都在向讀者展現英蓮的清白家世、嬌生慣養的嬰孩生活，以及清新可愛的人物本質。善用對比是《紅》的一大藝術特色，“英蓮”幼年的可愛形象與其日後坎坷多舛的命運形成強烈反差，在讀者心中造成深刻的敘事張力。曹雪芹在人物命名上基本遵循兩大原則：一是以人名暗寓深意，二是將配角名字系統化地配合成組（趙岡 1978）。“英蓮”之名正體現了前者，無論後來更名為“香菱”抑或“秋菱”，均隱含雙關意味，“英蓮”諧“應憐”，“香菱”諧“相憐”，“秋菱”則似“求憐”，始終不離一個“憐”字（李曉紅 2021, 170），暗示其一生悲情。四位譯者在翻譯“英蓮”之名時均未就雙關現象進行解釋，很大可能是為了避免過早介入闡釋，影響讀者理解、思考。就“英蓮”兒時的形象而言，霍譯將“粉妝玉琢”翻譯為“delicate little pink-and-white face”，給讀者一種直面其人的感覺；王譯和楊譯均用“pretty”和“lovable”等概括性的語言來描述“英蓮”，較為貼近原意；麥譯則使用明喻（as a jewel）來指涉“英蓮”，以珠寶喻其珍貴。相較之下，霍譯在再現幼年英蓮清秀靈動的形象方面更為傳神。

正所謂“福兮禍所伏”，美好的事物似乎往往潛藏著災禍和不幸。僧道的出現，尤其是“那僧便哭起來”稱英蓮為“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再附上一首意蘊深遠的讖詩，隱約預示了甄家的命運走向和英蓮的苦楚未來。古人云“禍起蕭牆”，在元宵佳節之際，僧道的預言果然應驗，僕人“霍啟”的疏忽導致“英蓮”失蹤，隨後一場大火令甄家徹底敗落。讀者在閱讀原文時，往往能從字裏行間感受到一種深切的悲憫，無妄之災加諸於天真爛漫的嬰孩之身，更被冠以“累及雙親”之名，令人不禁慨歎命運無常與天道不公，對英蓮的遭遇產生深切同情。我們來看原文中描寫“英蓮”命運的四句讖詩及其譯文：

原文：慣養嬌生笑你癡，菱花空對雪淅淅；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煙消水滅時（曹雪芹 2010, 9）。

王譯：Love and tender care will be of no avail;

The water caltrop will be blighted by snow.

Rejoice not even though it be the Feast of Lanterns,

For you may sorrow at what follows in its wake (Cao 1958, 12) (53 詞註腳)。

麥譯：A fool dotes;

Tender blossoms

Are cut by the frost.

Take care

At New Year,

Fire and flame (Cao 1958 , 6).

霍譯：Fond man, your pampered child to cherish so —

That caltrop-glass which shines on melting snow!

Beware the high feast of the fifteenth day,

When all in smoke and fire shall pass away (Cao 2014 , 15) (532 詞尾注) .

楊譯：Fool, to care for this tender child;

An image in the mirror, snow melting away.

Beware what will follow the Lantern Feast,

The vanishing like smoke when the fire burns out (Cao 1994 , 10).

原詩在形式上並不突出，也未嚴格押韻，作者試圖強調的是讖語的功效，提醒讀者可能或將要發生的故事，起著預示未來的作用。以七言絕句體例承載預示性敘事功能，其語言特徵體現為平仄格律（尾韻“癡”“澌”“時”）、雙關修辭（“菱花”兼指植物與人物本名、“雪澌澌”諧音“薛”氏）及時間隱喻（“元宵後”標誌情節轉折），通過自然意象與節慶符碼的對立建構宿命論框架。四位譯者均以詩譯詩，但在形式、內容及翻譯方法使用上卻大相徑庭。王譯以五句自由體詩意譯，弱化了原詩的形式約束，將“菱花空對雪澌澌”轉譯為“water caltrop will be blighted by snow”，雖保留植物意象卻消解了姓名雙關，以 53 詞註腳彌補譯文缺失的原文潛在信息，凸顯註釋介入的詮釋特質。麥譯對原詩進行高度重構，將四句壓縮為六行現代詩，以“tender blossoms are cut by the frost”泛化自然意象，省略諧音隱喻，將“煙消水滅”改寫為“Fire and flame”，雖強化戲劇張力，卻偏離原意。霍譯嚴格再現尾韻（so/snow, day/away）與對仗結構，創造“caltrop-glass”複合詞以相容“菱花”的植物與意象雙關，並以 532 詞尾注闡釋文化意象，體現出漢學家對詩歌功能與敘事預設的學術性觀照。楊譯採取直譯導向的異化策略，將“菱花”譯為“image in the mirror”以凸顯“鏡花水月”的虛無隱喻，但犧牲了植物指涉，而以“vanishing like smoke”直譯“煙消”，雖貼近字面卻弱化“水火相剋”的哲學張力。

四個譯本共性在於均以“元宵節”為敘事錨點（Feast of Lanterns/New Year），並試圖通過“雪—火”意象對立傳遞命運警示，然其差異實則反映了不同譯者的取向。王譯側重可讀性和文學表現，麥譯傾向於文化改寫，霍譯追求詩學形式與學術深度的平衡，楊譯則堅持文本忠實性。小說敘事中，未知與神秘往往是讖語的核心魅力所在，若忽略其預示功能，便難以體會這一極具中國特色的語言藝術之妙，而翻譯領域常說的不可譯性（untranslatability）也正在於此。然而，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原文內容加以補償性解釋，說明了翻譯的不可譯性中又隱含著某種程度的可譯性（translatability）。正如李爽學（2005，84）所述：“唯有勤加注釋，學者才能從譯本看出譯家的功力。退一步講，學者也才能從中受惠，認識自己對文本認識不清的地方”。注釋可以起到疏通語義、闡釋文化、比照指涉及溝通目標讀者等功能（張璐 2020，79-80），四個譯本中，王譯以 53 詞腳注簡要說明讖語功能與雙關含義，使讀者得以理解英蓮的命運預

示；霍譯則撰寫 532 詞尾注，廣泛涵蓋相關情節與文化背景，然而篇幅較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干擾閱讀的連貫性。錢鐘書（1981，18）曾提出“化境”之說，認為理想的翻譯應“不因語文習慣的差歧而露出勉強造作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我們在王際真的譯本中似乎能看到這一點。霍克思譯本固然成就卓著，然其本人亦謙稱“王譯勝過他自己的譯文”（林以亮 1976，1）。王譯更側重於感性與直觀的表達（如在譯文中使用第二人稱代詞“you”），從而營造出更強烈的閱讀代入感，其譯筆模糊了譯者與作者的界限，令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顯得更為自然和密切。

4.2 少女時期的英蓮

古代白話小說，多採取“說書人口吻的全知敘事”，此類敘事中，講述者往往置身於小說人物之外，“空間和時間的轉換不必依賴於小說人物”，而是掌握在充當“敘事者”的作者之手（劉勇強 2017，223）。《紅》憑藉其獨具特色的敘事結構與情節安排，構建出一個雖千頭萬緒，參差錯綜，但卻互有關聯，渾然一體的藝術世界。大事件中穿插著小故事，小故事中又埋伏著大變故，體現出“草蛇灰線，伏脈千裏”的敘事智慧。

原文中“英蓮”的出場與走失均以作者的“全知敘事”展開描述。幼年被拐賣的“英蓮”被“拐子”養至十二三歲“帶至他鄉轉賣”，“模樣雖然出脫得齊整好些，然大概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認”，這一描寫與也為“門子”認出“英蓮”埋下伏筆。當被問及家世時，英蓮回答“是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是他的親爹，因無錢還債才賣的”，得知被馮淵贖身時，她自歎“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寥寥數語，便勾勒出一個飽受摧殘、膽小懦弱的少女形象。以下為四個譯本對此時英蓮形象的處理：

王譯：I tried to question the girl, but apparently fear had been beaten into her...(Cao 1958，45).

麥譯：She must not speak or she would be beaten, she said, quite scared...(Cao 1958，37).

霍譯：But she said she was scared of being beaten and nothing would induce her to talk... (Hawkes 2014，91).

楊譯：She'd been beaten so much she was afraid to talk...(Cao 1994，58).

原文對英蓮的創傷敘事通過極簡對話建構主體性，以被動屈從的語言符碼（“打怕了”“萬不敢說”）及宗教化自責修辭（“罪孽可滿”）塑造其“受害—認命”的雙重心理結構，構成封建語境下女性主體消聲的典型範式。王譯以“fear had been beaten into her”再現暴力內化過程，通過被動語態（beaten）與完成時態（had been）強化創傷的累積性，但省略“罪孽”的宗教符碼弱化了英蓮自我異化的心理邏輯。麥譯採用指令性話語（“must not speak”）與條件從句（“or she would be beaten”），將恐懼呈現為外部脅迫的即時反應，以“quite scared”的情感副詞簡化原文中創傷主體的複雜性。霍譯通過否定結構（“nothing would induce her to talk”）及心理動詞“scared”的持續性時態，凸顯英蓮對權威的絕對服從，並以“induce”一詞暗示施暴者的操控機制，較完整

地保留了權力關係的隱性書寫。楊譯以因果句式（“beaten so much she was afraid”）直譯暴力的量變效應，但“afraid to talk”的泛化表述消解了“不敢說”背後對父權話語的結構性恐懼。四個譯本將“英蓮”孤苦無助的悲慘狀態在譯文中曝露無遺，與前文中嬰孩時期的英蓮的人物形象形成鮮明對比。這一手法既體現了古代小說家的“普遍創作經驗”，也成為“小說評點家津津樂道的理論共識”（劉勇強 2017，236）。

故事在這裏埋下了伏筆，英蓮的形象起到了承上啟下的功效，“紅顏禍水”這一傳統母題在她身上展開得淋漓盡致，“馮淵”因其喪命，薛蟠也由此捲入人命官司。“呆霸王”的強取豪奪，將英蓮推向人生的又一個轉折。從嬌生慣養的千金小姐淪為拐子養女，再至薛家婢女，身份的更迭不斷加劇故事的悲劇張力。正如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所言，悲劇有三種之別，尤以第三類“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最為感人（轉引自楊昌年 2004，236）。“英蓮”得遇“馮淵”，本應是她被拐賣後黑暗人生中的一線曙光。作者以“馮淵”命名頗具匠心，“馮淵”之諧音便為“逢冤”，暗示紅顏薄命、錯位相逢的悲劇性結局。值得注意的是，四個譯本中唯有王譯將“馮淵”音譯為“Feng Yuan”，並增加註腳“Homophone for ‘meeting one’s retribution’”，考慮到西方讀者未必具備原文讀者的文化背景知識，王譯通過注釋補償較好地再現了原名的隱含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助力目標讀者理解這一頗具中國特色的語言表達方式。

4.3 初入賈府的英蓮

一部作品若一直以悲劇的形式呈現，很可能會使讀者產生審美疲勞與心理不適。如蓮花般清淨的“英蓮”，因葫蘆僧和賈雨村的徇私枉法，錯失了與親人團聚的契機。至第7回再度登場時，她已被更名為“香菱”。“香菱”意即菱角花，類似於浮萍一樣的水生植物，隨波而動，四處為家。頗值玩味的是，菱花雖小卻仍有一縷清香，似在隱喻著她命運中尚未湮滅的一絲希望。果然，隨薛家進入賈府後，香菱的境遇有所改善，從以往多由他人轉述的配角，逐漸走向敘事的前臺。

前文提到，中國古代白話小說多採取說書人口吻的全知敘事，敘事者多超然於人物與情節之外。《紅》前48回中，對“香菱”的正面描寫較為有限，其形象多透過第三人稱或旁觀者視角間接建構。如第七回中，周瑞家的便拉了她的手，細細的看一回，因向金釧笑道：“到好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咱們東府裏蓉大奶奶的品格”（曹雪芹 2010，83-84）。

王譯：Chou Jui’s wife took her by hand and looked at her closely. “She reminds me of Jung Nai-nai³ of the East Mansion” (Cao 1958, 75).

麥譯：未譯。

霍譯：Zhou Rui’s wife took her by the hand and studied her curiously. Then she turned to Golden again. “You know,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is child’s face that reminds me of Master Rong’s wife over at the Ning mansion” (Cao 2014, 169).

楊譯：Mrs. Zhou took her hand and studied her intently, then turned to Jinchuan again: “She’s a handsome girl. Reminds me of Master Rong’s wife in our East Mansion” (Cao 1994, 105).

通過周瑞家的對英蓮的審視性話語“竟有些像咱們東府裏蓉大奶奶的品格”，以容貌比附建構人物階級隱喻與命運影射（秦可卿在書中容貌出眾，兼具寶釵與黛玉之美，而“品格”一詞更具有雙重意指，既指儀態氣質，亦暗涉家世血統）。四個譯本中，王譯將“東府裏蓉大奶奶”音譯為“Jung Nai-nai”並加註釋，保留了文化異質性；霍譯則明確譯出“Ning mansion”，並以“Master Rong’s wife”強化角色所處的權力脈絡；楊譯傾向於泛化家族關係以適應目的語讀者認知框架；麥譯未譯此段，反映其敘事節略對次要人物刻畫的犧牲。這些差異，反映出譯者在處理《紅》“草蛇灰線”敘事美學中對細節影射功能的不同處理，及其在跨文化語境中的闡釋取向。此外，香菱的形象並非僅止於第七回。第16中，作者還借賈璉之口再次強調了她“越發出挑的標緻”，而就連賈府中權勢顯赫、眼光苛刻的王熙鳳，也稱讚她“為人行事，更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的主子姑娘還跟不上他”（曹雪芹 2010, 167）。這些補充描寫，進一步豐滿了香菱雖命運多舛卻品格出眾的人物形象，也為其後續命運的發展埋下深層伏筆。

4.4 大觀園中的香菱

薛蟠的離家避醜，為香菱進入大觀園、展現才情創造了機會。“香菱學詩”是她“一生中的重要片段”。不少學者對此青睞有加，相關研究更是“不乏其論”，或認為是“香菱”人格化的“自我實現”（齊宏彬 1992, 185），或強調“香菱學詩”具有“自我肯定的意義與價值”（許玫芳 2000, 189）等。故事人物的性格變化，是文學的真實性、形象性、豐富性和生動性的必然要求（周中明 1985, 120），正是由於人物的生動形象，才得以留給讀者深刻的印象。

第48回“濫情人情誤思遊藝慕雅女雅集苦吟詩”中，香菱首次獲得正面的細緻描寫，其“學詩”經歷更成為她在《紅樓夢》中的高光時刻。回目中為故事人物定性，是《紅》的一大特色（張冰 2022, 89）。香菱被賦予了“呆”的稱號（如“憨湘雲醉眠芍藥茵呆香菱情解石榴裙”），這在其學習詩歌的過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現，其吟詩遣詞的癡迷程度更是達到了“茶飯無心，坐臥不定”的地步。她的專注與執著甚至贏得一貫挑剔的林黛玉的讚賞，探春亦主動邀其加入詩社。這些情節不僅豐滿了香菱的形象，也折射出詩歌對於大觀園中女性抒發心志、表達自我與生活渴望的重要意義。香菱搬進大觀園，並非是單純嚮往其中的景致或閒適生活，更是她對生命升華與精神歸屬的深切渴望。香菱學詩，所學並非無病呻吟之語，更不是矯揉造作、賣弄平仄的技巧，而是出於一種被認可、被平等對待的期待。師從林黛玉這位以才情與氣質著稱的人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香菱追求“雅”的內在動機。在聆聽黛玉評詩後，香菱陷入沉思，出現了“只在池邊、樹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掘土”的場景，這一描寫生動又富於幽默感，為大觀園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情趣與張力。

原文：(香菱) 默默的回來。越性連房也不入，只在池邊、樹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掘土（曹雪芹 2015，543）。

王譯：Lotus did not go back to her own apartment. She sat on a rock under the trees, absorbed with her poem, reciting to herself rhymes, and writing on the sand the words she was considering (Cao 1958，323).

麥譯：Lotus walked thoughtfully into the park.... So she lingered by the fishpond, wandered under the tree, rested on blocks of rock, staring absently into space, or, bending low, traced ideographs in the sand (Cao 1958，309-310).

霍譯：Caltrop returned in silence. This time she did not even go indoors but remained outside among the trees at the water's edge ...—sitting on a rock meditating, or squatting on her heels in order to scratch characters on the ground (Cao 2014，579).

楊譯：Xiang-ling went away in silence. She did not go back to her room but strolled by the pool and under the trees, sat lost in thought on the rocks or crouched down to scribble on the ground (Cao 1994，120)

“香菱學詩”達至廢寢忘食、如癡如迷的境地，文學的迷人魅力讓命運坎坷如“香菱”一般的卑微者有了奮發向上的力量。四個譯本在不同程度上再現了“香菱”學詩的癡迷狀態，對原文的再現效果也各有側重。王譯雖偏離原文結構較多，卻以流暢自然、動詞連用的方式生動傳達其神態，將香菱的神態刻畫得活靈活現。麥譯動詞豐富、貼近原文，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不遜於王譯。霍譯與楊譯更貼近字面，忠實傳達語義，但在語言表現力上略顯平實，不如王、麥譯本靈動鮮活。

沉浸於吟詩中的香菱忘記了一切，就連探春隔窗笑說道：“菱姑娘，你閑閑罷！”香菱竟然“怔怔答道：‘閑’字是‘十五刪’的，錯了韻了”（曹雪芹 2015，544）。

王譯：When Quest Spring called to her to rest for a moment, she answered, still thinking of the poem, “‘Rest’ ? That is not the rhyme I want” (Cao 1958，324).

麥譯：“Do take a rest!” Taste of Spring called out to her from the window. “Rest doesn’ t fit in with the rhyme!” replied Lotus absently (Cao 1958，324).

霍譯：When Tan-chun jokingly called to her through the window to ‘call it a day’ , she merely looked up with a somewhat dazed expression and replied that “day” didn’ t rhyme: the rhyme-word she was using was “sky” (Cao 2014，581).

楊譯：Presently Tan-chun called to her through the window, “Do have a rest, Hsiang-ling!” “‘Rest’ belongs to the fifteenth group of rhymes—you’ ve got the wrong rhyme,” she answered absently (Cao 1994，122).

“對話是人物性格的聲音”，人物的性格要通過行動來表現，與之相配的便是人物語言，兩者互為補充不可或缺（茅盾 1959，28）。原文透過巧妙的人物對話在讀者

心中勾勒出一副立體人物畫像。就異語語境中的人物形象的建構而言，很大程度上需要譯者對原文認真研讀，揣摩人物心理及個性特點，選擇適當的方式重構原文人物形象。黛玉命香菱以“寒韻”（第十四韻）作詩，而“閑”屬“十五刪”韻，香菱一心沉溺於推敲韻腳，以致誤將探春勸慰之語“閑閑”當作韻字，從而引發戲劇性的誤會。四位譯者的處理風格各異。王譯和麥譯較為簡單，前者將“閑閑罷”直譯為“rest for a moment”，後者為“Do take a rest”，均將“閑”字譯為“rest”，同時與下文一致，致使原文中的幽默效果有所減弱，難以完全再現原有的喜劇氛圍。楊譯在直譯基礎上添加了“‘Rest’ belongs to the fifteenth group of rhymes”這一解釋，雖貼近原文，但因文化背景差異，增加了譯入語讀者的理解負擔。相對而言，霍譯的處理更為巧妙，在充分考慮原文押韻及滑稽效果下，將“閑閑”譯為“call it a day”，並以“day”與“sky”構成韻腳誤解，既還原了情節的滑稽本質，又通過地道表達增強了可讀性，成功實現了功能上的等效，也更有利於激發目標語讀者的閱讀興趣。

4.5 婚姻束縛下的“秋菱”

中國古代社會對女性提出“三從四德”的要求，《紅》中的女性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明末清初才子佳人文學中“佳人”的典型特徵，這類女性對“社會、家庭、男子仍然有著天然的依附性”（毛忠賢 1994，214），難以自主掌握命運，往往被推向悲劇的深淵。大觀園中的香菱似乎一度尋得人生真諦，度過了一段相對安寧愉悅的時光。然而，正如小說中福禍相倚的敘事慣例，薛蟠的歸來與金桂的進門，再次開啟了香菱的悲慘命運之門。從“香菱”更名為“秋菱”，已然預示著她如菱花般漂泊無依的結局。她從丫頭變為妾氏，始終未曾做出反抗，即便嫁給了薛蟠這樣的“呆霸王”，仍在薛蟠捱打時“哭的眼睛腫了”，使讀者對她毫無心機的“呆”、“癡”歎息不已。胡文彬（2001，36-37）認為，“香菱”之“呆”並非“愚人”，而是“呆想”之呆，體現了“香菱”的純情與天真，雖有“呆”氣，但並不“傻氣”。當她得知金桂“在家裏也讀書寫字”並將嫁入薛家時竟滿心期盼，進一步揭示出她在封建禮教浸染下所形成的質樸與順從的內心世界。

香菱笑道：“奶奶說那裏話？此刻連我一身一體俱屬奶奶，何得換一個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奶奶說那一個字好，就用哪一個”（曹雪芹 2010，920-921）。

王譯：未譯。

麥譯：未譯。

霍譯：“Oh, madam, what a thing to say!” said Caltrop, smiling. “I am your chattel, to do with exactly as you wish; who am I to be willing or unwilling? If you wish to change my name, my name already is whatever you wish to change it to” (Cao 2014, 767).

楊譯：“What a thing to say, madam!” cried Xiangling gaily. “I belong to you completely, so why consult me about changing my name? This is doing me too

much honour. Just use whatever word you think best, madam” (Cao 1994, 688).

人物的刻畫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其性格特點。原文近乎討好的語言表達，凸顯出“香菱”作為妾氏在封建大家庭中的卑微處境。中國古代禮教所強調的“婦德”、“婦言”等規範，在她身上化為一種深層的奴性意識。妾的地位本就低下，“香菱”雖由丫鬟被抬為妾，身份略有提升，但仍未脫離奴僕本質，因此在面對正室“金桂”時，她只能小心應對，唯唯諾諾。兩個節譯本均未譯出該對話內容，但王譯對薛蟠娶妻情節進行了概括性改寫，麥譯則直接省略了薛蟠娶妻相關章節。兩個全譯本均準確理解了原文意圖，在語義和語用層面實現了較高照應，有效傳遞出原文的對話效果。相較而言，霍譯選用“chattel”一詞尤為精當，該詞在英語中意指“個人財物”或“奴隸”，準確暗示了香菱作為附屬物的身份地位，比楊譯中“belong to you”更具歷史語境與批判張力，也更貼合香菱被物化的悲劇命運。

4.6 英蓮命運的終結

“秋菱”本應在金桂的持續折磨下鬱鬱而終，但情節卻又一次峰迴路轉，一心置“秋菱”於死地的金桂反而誤服毒藥身亡，為香菱的命運帶來了一線轉機。正當讀者為其似乎迎來曙光而欣慰之際，情節卻再次急轉直下，命運多舛的“香菱”最終因難產而死。一波三折的情節設計，不僅增強了敘事的戲劇張力，也令讀者在情感起伏中更能深切地體會到命運的無常與悲劇性。四個譯本中，除王譯之外，其餘譯本均對第 103 回中金桂之死的情節進行了翻譯，儘管“香菱”被牽連其中，但其直接出場甚少，情節以第三人稱轉述推進。香菱的最終結局則在第 120 回中由其父甄士隱代為陳述，以間接敘事的方式為英蓮的故事畫上了句號。

士隱道：“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蓮，幼遭塵劫，老生生初任之時，曾經判斷。今歸薛姓，產難完劫。遺一子於薛家，以承宗祧”（曹雪芹 2010, 1193）。

王譯：Now the only important character in the book still unaccounted for is Lotus. ...One day, as Cassia was making brazen advances to Hsueh Kuo and thought that she was about to achieve her end, the unwitting appearance of Lotus provided Hsueh Kuo with a chance to escape. In retaliation, Cassia tried to poison Lotus. But the latter was not destined to die thus; Cassia herself drank the poison by mistake and perished. Later, when Hsueh Pan returned home as a result of a general pardon, he took Lotus as his chief spouse. One would think that after such an unhappy life, fate might have relented and allowed her to live out her life with a measure of happiness. But that is not fate's way; Lotus died in childbirth within the year of her marriage (Cao 1958, 564).

麥譯：未譯。

霍譯：Replied Shi-yin. “My daughter Ying-lian was, as you know, kidnapped when she was a little girl. You yourself gave judgement in the case when you first

held office. Now she is married to a certain Mr Xue and is about to give birth to his child. In so doing she will die. She will leave behind her a son to continue the Xue family' s ancestral rites” (Cao 2014 , 517).

楊譯：“You are unaware, sir, that my daughter Ying-lien met with misfortune as a child, and at the start of your official career you judged a case in which she was involved. She has married into the Hsueh family, but is dying now in childbirth leaving behind her a son to carry on the Hsuehs’ line” (Cao 1994 , 583).

原文中，甄士隱以冷靜而悲愴的口吻，揭示了其女英蓮（香菱）悲劇命運的終章——她將在為薛家誕下子嗣、完成傳宗接代的使命後，死於產難。這一資訊對於完整塑造英蓮這一貫穿全書的悲劇女性形象至關重要，它不僅是其個人“有命無運”讖語的最終應驗，也是對建社會中女性作為生育工具之殘酷命運的深刻揭示。麥譯並未給出“英蓮”的命運結局，對於塑造“英蓮”的人物形象是不利的。楊譯簡潔、含蓄，側重敘事的連貫性，以高效的敘事和清晰的邏輯，確保了英蓮命運結局這一關鍵情節資訊的準確傳達，對人物形象的完整性起到了基礎性的支撐作用。霍譯通過精心的句式編排和措辭選擇，傳達了基本資訊，再現了原文的悲劇氛圍與宿命感，強化了英蓮之死的儀式性和必然性，使其人物形象的悲劇結局更具震撼力和批判深度。王譯不守繩墨，在翻譯過程中劍走偏鋒，從全知敘事視角概述形式交待原文情節，譯述的過程中增加了譯者的主觀評價，原文中較為鬆散的情節在王譯中顯得極為緊湊，短短的百餘詞使讀者再次體會到“英蓮”命運的起伏與人生的無常。王譯雖在忠實程度上與原文相距較遠，但是在表達效果方面不弱於原文。兩個全譯本雖然忠實於原文，但對於那些原文中描述較為離散的人物來說，照應式翻譯反而不利於向譯文讀者展現人物形象，王譯提供了一個較好的翻譯視角。

4.7 “英蓮”之名的輪回

從“英蓮”到“香菱”再到“秋菱”，最後再回歸到“英蓮”，恰是“英蓮”人生的輪回。這一命名變化並非隨意為之，而是深具寓意，巧妙地映射了她從幼年罹難、為奴為妾到受盡凌辱，直至生命終結的悲劇人生軌跡，象徵著其個人身份在命運撥弄下的迷失與最終的象徵性解脫。我們來看四個譯本如何處理“英蓮”之名的變化。

英蓮

王譯：Lotus (Later under the name of Fragrant Caltrop, Lotus became the much abused concubine of the...) (Cao 1958 , 11-12).

麥譯：Lotus (Cao 1958 , 5).

霍譯：Ying-lian (Cao 2014 , 13).

楊譯：Ying-lien (Cao 1994 , 9).

香菱

王譯：Lotus (Cao 1958 , 75).

麥譯：Lotus (Cao 1958, 303).

霍譯：Caltrop (Cao 2014, 169).

楊譯：Hsiang-ling (Cao 1994, 105).

秋菱

王譯：Lotus (Cao 1958, 506).

麥譯：Lotus (Cao 1958, 522).

霍譯：Lily (Cao 2014, 769).

楊譯：Chiu-ling (Cao 1994, 689).

“英蓮”之名的翻譯四個譯本迥乎不同。王譯以“Lotus”來指涉原文，前後文保持一致，避免因同一人物名稱更迭而引發混淆，減少讀者的閱讀障礙。不過，王譯顯然注意到了“英蓮”之名的變化現象，因此以注釋形式交待了“英蓮”進入大觀園後被改名為“香菱”(Fragrant Caltrop)這一事實，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名稱統一所導致的文化資訊損失，體現了譯者在流暢性與資訊完整性之間尋求平衡的努力。麥譯僅以“Lotus”來指涉原文，忽略了名稱的變化，亦無任何說明，使得“英蓮”命運中極具象徵意義的命名環節在譯文中徹底消失，削弱了其人物形象的豐富性與悲劇層次。霍譯展現了較高的文學敏感度與動態照應性，根據人物身份與處境的變化，靈活運用音譯、直譯與意譯策略。當“英蓮”以鄉紳之女的身份初次登場時，霍譯採用音譯“Ying-lian”，賦予其完整的個人身份。當她淪為奴僕，被寶釵更名為“香菱”後，霍譯轉而使用直譯“Caltrop”，標誌著其物化與從屬地位。當夏金桂出於妒忌將其名改為“秋菱”時，霍譯則創造性地意譯為“Lily”。這種譯名的動態變化，不僅忠實再現了原著情節，更巧妙地引導讀者感知人物身份與地位的浮沉。尤為值得關注的是霍譯中體現的敘事介入，如第 80 回中，當薛姨媽庇護受冤的秋菱時說道，“秋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霍克斯將其譯為“Come, girl! She said to Caltrop”。此處，譯者並未遵循文本表面的“秋菱”(Lily)，而是讓人物恢復了“香菱”(Caltrop)的身份。這一偏離原文的處理，可被解讀為譯者對文本的深度闡釋與情感介入，譯者或許意在通過此舉暗示夏金桂的改名不被敘述者所承認，從而在細微之處為人物命運鳴不平，彰顯了譯者作為積極讀者與再創作者的能動性。最終，隨著人物命運的終結與本名的回歸，霍譯也將名稱復位為“Ying-lian”，完成了這一充滿象徵意義的命名輪迴。霍克斯與其女婿閔福德在後四十回翻譯中的無縫銜接，也確保了這一精心設計的連貫性。與霍譯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楊憲益伉儷的全譯本採取了嚴格的異化策略，無論人物名稱如何變化，譯本始終堅持使用威妥瑪拼音系統進行音譯，即“Ying-lien” → “Hsiang-ling” → “Chiu-ling”。此策略旨在最大限度地保留中文姓名的語音特質與文化他性，將理解名稱寓意的責任完全交由讀者。從文化傳遞的角度看，此舉保持了原語文化的純潔性。然而，從文學接受與敘事效果層面審視，統一的音譯使得“英蓮”之名背後豐富的寓意、身份的更迭以及作者精心設計的象徵體系幾乎完全喪失。對於不諳中文的目標讀者而言，名稱的變化僅僅是拼音符號的改變，難以引發對人物悲劇命運的深層次聯想與共情，從而使得譯文的文學表現力與感染力大打折扣。

4.8 四個譯本的讀者接受情況

[1] 大量優質書評為 Goodreads（好讀網）網站的特色之一。自 2007 年成立以來，該網站吸引了重多的讀書愛好者及書評人員，除了大眾化的書籍外，小眾書籍的讀者書評也頻頻現身，一方面為讀者選書、讀書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另一方面為研究者研究文本接受提供了有效的資訊。在 goodreads 讀書網上，王際真的譯本得到了 4 分好評，收到 259 篇書評。楊譯本評分為 4.5，共 167 篇書評。霍譯本評分為 4.3，共 551 篇書評（霍譯五卷共收到 551 個書評，其中第一卷書評高達 284 個）。麥譯本的評分為 3.9，僅收到 23 篇書評。從讀者書評數量上看，霍譯最高，王譯其次，然後是楊譯，最後是麥譯，這說明就讀者閱讀數量上看，霍譯和王譯要高於楊譯和麥譯。查閱相關評論，我們發現，大部分書評與原作主題、內容及風格相關，大部分書評者對霍譯本持積極態度，認為霍譯品質很高，譯者創造性地再現了原文特色。楊譯書評者多數認為楊譯傾向於直譯原文，對於原文的文化資訊再現較好。麥譯的書評者則認為該譯本是轉譯本，可讀性上要大打折扣。對於王譯來說，書評者多數認為王譯在忠實度上不及全譯本，但流暢程度和可讀性很高，並將王譯與霍譯進行對比，認為王譯可作為霍譯本的前導讀本。這在一定程度上對霍克思全英譯本在英文世界的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張愛玲（2012，4）曾表示，她在 60 年代的美國中西部大學城時發現，“知道《紅樓夢》的學生倒不少，都以為跟巴金的《家》相仿，都是舊家庭裏表兄妹的戀愛悲劇”，這些學生對於《紅》的認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王際真所譯的《紅》的緣故。張惠（2013，16）也認為，王譯逐漸激發了“普通讀者甚至專業學者的興趣，為美國紅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讀者書評中，僅有王譯書評中有讀者提到了香菱的問題，還有不少讀者提出了關於中文人名翻譯的問題，表示人物過多致使名字不易記住，但王譯所採取的多樣化翻譯策略則是一種較為適合的方式。這些粗略的讀者評論在一定程度上照應了本研究對於“英蓮”人物形象英譯的相關論述。

五、結語

翻譯，究其本質，是一種深度的闡釋與能動性的再創造。透過對《紅》中香菱人物形象在四個英譯本中變遷的細緻考察，本研究發現，譯者們並非透明地傳遞一個既定形象，而是基於各自的翻譯詩學、目標文化預設與個人解讀，積極參與了對香菱這一悲劇人物的塑造與重構。這一過程揭示了文學翻譯中一些根本性的學理問題：翻譯策略的選擇直接關乎人物形象的“可見度”與內涵的傳遞，翻譯的形態（全譯/節譯）深刻地影響著人物形象的完整性與連貫性。霍譯運用了動態照應與適度的敘事介入策略，通過譯名的動態變化將人物的身份浮沉與命運象徵視覺化，使其不再是抽象的音符，而是承載敘事功能的文學符號。這種策略深刻體現了闡釋學中“視域融合”的觀點，譯者在深入原文語境後，將其理解創造性地轉化為目標語讀者可感知的文學形式。楊譯堅持的直譯和音譯策略雖在語言形式上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忠實，卻無形中犧牲了名稱的敘事功能與象徵意義，導致其譯本的文學表現力有所折損。這引發了我們

對翻譯中“文化忠實”與“文學效果”之間永恆張力的思考。王譯通過情節的提純與緊湊化，使香菱的形象更為明顯，強化了人物的核心悲劇脈絡，是一種以目標語讀者認知習慣為中心的“創造性重構”，印證了改寫本身是一種強有力的批評與重構行為。麥譯因轉譯和省略所導致的人物形象“凝滯”從反面證明了在跨文學傳播中，資訊的損耗與變異如何直接制約著人物藝術深度的構建問題。香菱在英語世界所獲得的多元詮釋，恰是《紅》豐富闡釋空間的生動體現，每一個譯本都是原作生命在異域文化中的一次“重生”，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多維的、複雜的闡釋場域，從不同路徑參與了“香菱”這一人物形象的跨文化生成與傳播。對人物形象翻譯的探討，應超越“孰優孰劣”的簡單判斷，轉而深入剖析其背後的詩學抉擇、文化立場與傳播機制。正是這些抉擇與機制，共同塑造了英語世界讀者眼中這朵獨一無二、既熟悉又陌生的“他鄉的菱角花”。

基金資助：

本文所涉研究獲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 2023 年度學科共建項目“嶺南現當代翻譯家群體及其譯學思想研究”（GD23XLN25）和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十四五”規劃 2025 年度常規課題“跨文化仲介與地方性重構：近代嶺南翻譯家群體的譯介行為對嶺南文化現代轉型的影響（1840-1919）”（2025GZGJ296）資助。

注釋

[1] Goodreads 網四位譯者的譯本的書評網址分別為：

王譯本：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535739.Dream_of_the_Red_Chamber.

麥譯本：<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12069714-the-dream-of-the-red-chamber>.

霍譯本：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139874.The_Story_of_the_Stone.

楊譯本：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243900.A_Dream_of_Red_Mansions.

參考文獻

Benjamin, Walter. 1992.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n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edited by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o Xueqin. 1958.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ranslated by Chi Chen Wang.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Cao Xueqin. 1958.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ranslated by McHugh, Florence, and McHugh, Isabe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Cao Xueqin. 1994.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Vol. 1). Translated by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Cao Xueqin. 1994.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Vol. 2). Translated by Yang, Xianyi, and Gladys

- Ya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 Cao Xueqin. 1994.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Vol. 3). Translated by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 Cao Xueqin. 2014.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1 “The Golden Days”). Translated by Hawkes, Davi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Cao Xueqin. 2014.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2 “The Crab-Flower Club”). Translated by Hawkes, Davi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Cao Xueqin. 2014.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3 “The Warning Voice”). Translated by Hawkes, Davi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Cao Xueqin. 2014.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5 “The Dreamer wakes”). Translated by Minford, Joh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Gentzler, Edwin. 2001.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2nd ed.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Hermans, Theo. 1985.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 Holmes, James Stratton. 1988.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Lawrence Venuti, 172–185. London: Routledge.
- 曹雪芹。2010。《蔡義江新評紅樓夢》（上、下）。北京：龍門書局。
- 陳德用、張瑞娥。2006。〈實用主義話語意識形態與人物個性化語言的翻譯——《紅樓夢》中王熙鳳個性化語言的翻譯〉。《外語教學》5：81–84。
- 崔小清、李依芸。2025。〈形象學視域下《紅樓夢》霍譯本林黛玉形象重塑研究〉。《長江小說鑒賞》12：7–10。
- 黨爭勝。2012。《〈紅樓夢〉英譯藝術比較研究——基於霍克思和楊憲益譯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邱瑞平。1997。《紅樓擷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董天。2025。〈意象圖式理論視角下《紅樓夢》英譯本中林黛玉的形象研究〉。《名作欣賞》5：17–19。
- 馮慶華。2006。《紅譯藝壇——〈紅樓夢〉翻譯藝術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管興忠。2016。〈王際真英譯作品在海外的傳播和接受〉。《外語教學》3：104–108。
- 何紅梅。2006。《紅樓女性》。北京：中華書局。
- 洪濤。2010。《女體和國族——從〈紅樓夢〉翻譯看跨文化移殖與學術知識障》。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胡文彬。2001。《冷眼看紅樓》。北京：中國書店。
- 康來新。1985。《石頭渡海——紅樓夢散論》。臺北：漢光文化事業公司。
- 李曉紅。2021。〈再談楊、霍兩譯本中紅樓人物名翻譯——以一人三名的甄英蓮為例〉。《采寫編》10：169–171。
- 李爽學。2005。《經史子集——翻譯、文學與文化笱記》。臺北：聯合文學。

- 林以亮。1976。《紅樓夢西遊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劉澤權。2006。〈從稱謂的翻譯看文化內容的傳播——以《紅樓夢》的英譯為例〉。《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5：95-102。
- 劉澤權。2010。《〈紅樓夢〉中英文語料庫的創建及應用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
- 劉澤權、劉豔紅。2011。〈初識廬山真面目——邦斯爾英譯《紅樓夢》研究(之一)〉。《紅樓夢學刊》4：30-52。
- 劉澤權。2021。〈數字人文視域下名著重譯多維評價模型建構〉。《中國翻譯》5：25-33+191。
- 劉澤權。2023。《〈紅樓夢〉多譯本量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 劉宏彬。1992。《〈紅樓夢〉接受美學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劉勇強、潘建國、李鵬飛。2017。《古代小說研究十大問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茅盾、老舍等。1959。《關於藝術的技巧》。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 毛忠賢。1994。〈《鏡花緣》對《紅樓夢》女性問題的反思〉。文史知識編輯部，《怎麼讀文學古籍》。北京：中華書局。
- 錢鐘書等。1981。《林紓的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齊宏彬。1992。《〈紅樓夢〉接受美學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許玫芳。2000。《〈紅樓夢〉中夢的解析》。臺北：文史哲。
- 楊安文、馮家歡。2018。〈《紅樓夢》邦斯爾譯本中的詩歌翻譯——以香菱詠月為例〉。《紅樓夢學刊》3：303-322。
- 楊昌年。2005。《古典小說名著析評》。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楊函琪。2021。〈人際意義視閥下王熙鳳形象譯本建構研究〉。《散文百家》(理論) 06：111-112。
- 楊安文、馮家歡。2018。〈《紅樓夢》邦斯爾譯本中的詩歌翻譯——以香菱詠月詩為例〉。《紅樓夢學刊》3：303-322。
- 一粟。1963。《紅樓夢卷》(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 姚琴。2013。〈基於平行語料庫的《紅樓夢》意義顯化翻譯考察——以霍譯本林黛玉人物特徵為例〉。《外語教學與研究》3：452-463。
- 張愛玲。2012。《紅樓夢魘》。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 張冰。2022。〈《紅樓夢》邊緣女性人物形象英譯研究——以小紅為例〉。《外國語言與文化》3：87-99。
- 張丹丹、劉澤權。2016。〈基於語境的《紅樓夢》報導動詞翻譯顯化研究——以王熙鳳的話語為例〉。《外語與外語教學》4：124-134。
- 張惠。2013。《紅樓夢研究在美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張璐。2020。〈注釋作為典籍英譯翻譯補償手段有效性的實證研究〉。《外語學刊》4：78-83。
- 趙岡。1978。〈《紅樓夢》裏的人名〉，臺灣《聯合報》。胡文彬、周雷主編，《海外紅樓學論集》，198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張冰

周中明。1985。《紅樓夢的語言藝術》。臺北：木鐸出版社。

Navigating Modern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A Review of *Translation Tools and Technologies*

Tong Chu¹ Wanyong Wang²

Address: ¹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Jilin University, Jilin Province, China; ²Department of Langua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SAR, China

E-mail: ¹chutong@jlu.edu.cn; ²ottonicolo@163.com

Correspondence: Wanyong Wang

Citation: Chu, Tong, and Wanyong Wang. 2024. "Navigating Modern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A Review of *Translation Tools and Technologies*." *Translation Quarterly* 114: 77-82.

Andrew Rothwell, Joss Moorkens, María Fernández-Parra, Joanna Drugan, Frank Austermuehl. *Translation Tools and Technologies*. 1st Edition, 2023. 270pp. ISBN: 978-1-00-316079-3. London: Routledge.

The recent explosion of Generative AI (GenAI), particularly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is driv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This shift is redefining the very nature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altering what they are and how they are categorized. In turn, this creates new, complex dynamics in the power structures that govern their use. Against this backdrop, as Rothwell et al. (2023, 7) note, "knowledge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is now a required competence for both translation graduates and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Practitioners require not only operational skills but also the critical competency to know, use, and evaluate AI translation tools effectively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Zhang and Doherty 2025), enabling them to navigate the often-fraught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O'Brien 2024).

The book under review, *Translation Tools and Technologies*, serves as a comprehensive textbook exploring key concepts, development contexts, and critical considerations for using translation tools effectively. Authored by Andrew Rothwell, Joss Moorkens, María Fernández-Parra, Joanna Drugan, and Frank Austermuehl, all current or former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European Master's in Translation (EMT) Network (EMT Board 2022), the book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se sections progress from foundational knowledge to professional applications, culminating in a detailed critique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The book aims to help readers interested in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students in translation courses or self-learners, to gai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tools and technologies an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nterplay between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 and human-centered processes.

Translation goes beyond 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 it require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 and context. As the authors note, “If learning a language is hard, reach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s a translator is much harder” (Rothwell et al. 2023, 2). The evolution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powerful tools for translators. The first part of the book (Chapters 1-3) covers the basics of Computer-Assisted Translation (CAT) and modern translation workflows,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deeper discussions. From early mechanical translation machines to contemporary digital tools, mastery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has become essential, as it prevents “wasting effort translating the same sentence a second time” (Rothwell et al. 2023, 12). However, this also introduces new challenges. For instance, although Translation Memory (TM)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MT) tools can improve efficiency, they bring quality and consistency issues that require careful handling. Different CAT tool architectures cater to various workflows, making the choice of the right tool significant for managing translation projects effectively. To keep pace with evolving technology and market demands, translators require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t is essential to remember that “CAT tools do not themselves perform translation” (Rothwell et al. 2023, 21); they serve as aids, not substitutes, for translators. This reinforces the point that technology’s role is not to emulate human capability and replace human intellect but to amplify it (O’Brien 2024).

Terminology management is essential for quality control in machine translation, requiring a systematic and specialized approach. The second part of the book (Chapters 4-5) addresses terminology management within translation workflows and the creation of electronic corpora, which boost translat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A termbase ensures terminological consistency throughout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Unlike TM, “termbases are concept oriented. This means that each entry is organized around a concept, not around a word” (Rothwell et al. 2023, 57). This distinction allows termbases and TMs to complement each other, enhancing translation consistency. Meanwhile, electronic corpora are also invaluable for translators, offering numerous examples of language usage to aid in making precise linguistic choices. “A corpus is a systematic collection of naturally occurring texts (of both written and spoken language)” (Rothwell et al. 2023, 78). The empirical nature of corpus data provides objective evidence of language use, making it a powerful resource. Translators should master terminology management and corpus analysis tools to better understand language patterns in specific domains, thereby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accuracy of their translations.

Master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MT technology is vital for translators, as these advancements are revolutionizing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The third part of the book (Chapters 6-8) explores recent MT advancements, the integration of MT with CAT tools, and mod-

ern transl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methods. MT technology has evolved from Rule-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 (RBMT) and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SMT) to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NMT). NMT, in particular, uses encoder-decoder models and attention mechanisms to generate publishable-quality translations through post-editing. “NMT can usually produce fluent-sounding output that takes account of context” (Rothwell et al. 2023, 104), representing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ver SMT. In the meantime, Transl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TMS) are becoming essential tools for transl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offering a complete project management solution. Translators may consider adapting to working within a TMS environment to improve efficiency. Modern TMS supports Language Service Providers (LSPs) and project managers, changing how translators work and collaborate, and evolving towards comprehensive business management systems. As technology advances, transl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s likely to become more automated, requiring translators to adapt and use automated tools to enhance their workflow. Mastery of these tools enables translators to foster a controlled, human-centered workflow, particularly in AI-assisted contexts (Jiménez-Crespo 2025).

Localization in translation is an ever-evolving field. As the book notes, “Localization is often a task with no clear endpoint, as software, games, and websites are continually developed and updated as part of an agile workflow” (Rothwell et al. 2023, 175). The fourth part of the book (Chapters 9-10) focuses on specialized translation too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areas like subtitle editing and software and game localization. Localization involves not just language conversion but also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technical adapta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is requires translators to continuously adapt to new technologies. Subtitle editing, in particular, demands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aiming to convey “as much of the experience of watching with sound” as possible (Rothwell et al. 2023, 154). As a part of localization, the growing subtitle tool market also presents numerous opportunities for translators, setting new requirements for mastering professional tools. As technology advances, automation and AI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localization and subtitle editing. Therefore, translators need to understand and adeptly use these tools to enhance efficiency and translation quality. Despite the rising significance of technology, the fundamental skills of translators and their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target culture remain crucial for ensuring high-quality and effective translations. This holds true even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AI, as the uniquely human ability to act as a storyteller who can re-contextualize texts for different audiences helps compensate for the lack of cultural common sense in current AI (Nguyen, Razniewski, and Weikum 2024).

Translation quality has long been a challenge for professionals, researchers, educators, and students striving to improve their work standards. Assessing and managing translation quality is even more complex and requires integrating various tools and technologies. The final chapters of this book (Chapters 11-12) address issues in transl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Translation Quality Assurance (TQA), and the cognitive challenges translators face when using these tools. Specialized tools and technologies exist to measure and improve translation quality, but they can have unintended negative impacts, often unnoticed by users. For instance, ergonomic design failed to make new tools “intuitive to learn rather than slow and painful” (Rothwell et al. 2023, 192). Translation tools ought to be human-centered, considering the cognitive load and workflow of translators to enhanc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Meanwhile, translators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potential risks and learn to use these tools effectively while maintaining control over translation quality. Notably,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rs are also advised to consider th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of translators to help them achieve this state while ensuring quality, as the ideal state for translation work is achieving “flow,” where one is energized and fully engaged in the task (Rothwell et al. 2023, 203), and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significantly impact translators’ job satisfaction and motiv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discussion of quality, the accessibility of translation tools is essential, requiring industry and developers to collaborate in providing equal work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translators.

Undeniably, *Translation Tools and Technologies* provides a masterful survey of the field as it existed prior to the widespread disruption of Generative AI in 2023. Its meticulous overview of CAT, TM, terminology, MT, and localization tools offers an indispensable foundation for any student or professional. However, the upheaval and turmoil brought about by GenAI, as represented by LLMs, intensify questions the book raises concerning technological ontology and the human-centered paradigm.

The first issue, ontology, concerns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our tools. The book’s clear delineation between TM, termbases, CAT, and MT provides a crucial, orderly taxonomy. GenAI, however, presents a categorical challenge. An LLM like ChatGPT is not just one of these tools; it can function, often simultaneously, as all of them and more. This multifunctionality destabilizes established boundaries: is an LLM a CAT tool, an MT engine, a terminology assistant, a research portal, or a writing aid? Echoing Haraway’s (1994) *Cyborg Manifesto*, we may need to move beyond “antagonistic dualisms” and embrace a view where the machine is not a separate ‘it’ to be dominated but an aspect of our own embodied process. This perspective thus recasts the ontological question from “What is this tool?” to “What is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is tool?” Consequently,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are compelled to re-evaluate not only how we categorize these technologies but also what constitutes translation technology itself in an age of AI integration.

The second, and perhaps more critical, issue is the tens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 and human-centered processes. This tension is acute with GenAI because it alters the nature of the translated text. Where previous technologies primarily retrieved or matched existing text strings, LLMs generate novel text, thereby shifting the locus of authorial control. The emergence of the Human-Cente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CAI) paradigm provides a power-

ful perspective on this issue. As applied to translation by O'Brien (2024) and Jiménez-Crespo (2025), HCAI advocates for a shift in design philosophy from emulation to empowerment. That is, the goal of technology should not be to mimic and replace human translators but to amplify, augment, and enhance human performance (Shneiderman 2020).

As current GenAI affords unprecedented speed and fluency, translation education should pivot to focus on skills that machines currently lack: creativity, narrativity, contextualization, common sense, and empathy (Jiménez-Crespo 2025). The goal is to train translators who do not “translate like robots” (Esselink 2022) but who instead use AI to augment their uniquely human capacities. This requires a sophisticated level of “AI literacy,” which, as Zhang and Doherty (2025) demonstrate, can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Research reveals that while novice translation students are already using AI tools, they often lack awareness of their negative impacts and ethical dimensions (Zhang and Doherty, 2025). Given this, it may be necessary to integrate formal, critical AI training early in the curriculum, moving beyond post-editing to encompass prompt engineering, ethical evaluation, and an understanding of data privacy and bias.

In summary, *Translation Tools and Technologies* offers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modern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Ami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AI, the discussions in this book can help translators maintain professional acumen and critical thinking in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However, given the advent of GenAI, the future of translation will inevitably involve a complex collaboration between human expertise and AI. Future research could explore how translator training programs should evolve to encompass prompt engineering skills, AI ethics, an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mitations of LLMs. Moreover, additional work should also examine how GenAI reshapes the textual status of translations and redistributes power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 in the act of meaning-making. Furthermore, empirical studies are needed on the impact of GenAI on the labor market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ts effects on compensation model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job satisfaction.

References

- EMT Board. 2022. “European Master’s in Translation Competence Framework 2022.” Brussels, Belgium: European Commission.
- Esselink, Bert. 2022. “Thirty Years and Counting: A Global Industry Growing Up.”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9 (1): 85-93. <https://doi.org/10.1075/jial.00020.ess>.
- Haraway, Donna. 1994.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In *The Postmodern Turn: New Perspectives on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Steven Seidman, 82-11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

1017/CBO9780511570940.007.

- Jiménez-Crespo, Miguel A. 2025. “‘If Students Translate like a Robot ... ’ or How Research on Human-Centered AI and 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 Can Help Realign Translation Education.”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August 4, 1-19. <https://doi.org/10.1080/1750399X.2025.2542022>.
- Nguyen, Tuan-Phong, Simon Razniewski, and Gerhard Weikum. 2024. “Cultural Commonsense Knowledge for Intercultural Dialogues.” ArXiv preprint. <https://doi.org/10.48550/ARXIV.2402.10689>.
- O’Brien, Sharon. 2024. “Human-Centered Augmented Translation: Against Antagonistic Dualisms.” *Perspectives* 32 (3): 391–406. <https://doi.org/10.1080/0907676X.2023.2247423>.
- Rothwell, Andrew, Joss Moorkens, María Fernández-Parra, Joanna Drugan, and Frank Austermuehl. 2023. *Translation Tools and Technologies*. 1st ed. London: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003160793>.
- Shneiderman, Ben. 2020. “Design Lessons from AI’s Two Grand Goals: Human Emulation and Useful Applications.” *IEEE Transactions 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1 (2): 73–82. <https://doi.org/10.1109/TTS.2020.2992669>.
- Zhang, Jia, and Stephen Doherty. 2025. “Investigating Novice Translation Students’ AI Literacy in Translation Education.”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August 4, 1-20. <https://doi.org/10.1080/1750399X.2025.2541478>.

Review of *Danmu*-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Lehan Li

Addres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China

E-mail: lilh75@mail2.sysu.edu.cn

Correspondence: Lehan Li

Citation: Li, Lehan. 2024. "Review of *Danmu*-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Translation Quarterly* 114: 83-87.

Sijing Lu, Siwen Lu and Lisi Liang (eds). *Danmu-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2025. 147 pp. ISBN: 9781032757339 (hb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Danmu, referring to user-generated live comments overlaid on the screen, has emerged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traditional, unidirectional mode of media consumption. Despite growing scholarly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vity and immediacy of *danmu* in fostering a more convergent mediascape of multiple voices (e.g., Johnson, 2013; Zhu, 2017),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is phenomenon within the field of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VT). This pioneering volume in the Routledge AVT Research Series seeks to offer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e to addressing *danmu* subtitling and commentary across various genres, thus illuminating how *danmu* shapes the future of AVT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This collection contains an introductory chapter and six case study chapters, which bring together contributions from scholars across the disciplin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digital culture,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On the one hand, this book introduces an array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e.g., affect theory, community of practice theory),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e.g., multimodal analysis, digital ethnography), and research methods (e.g., online observation, interview), thus enriching studies on *danmu*-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engages with a wide range of media genres (e.g., documentary, animation, game playback) and a variety of online participants (e.g., content creators, viewers, *danmu* makers) to reveal how *danmu* shapes participatory viewing experiences on contemporary online streaming platforms.

The introductory chapter by Sijing Lu, Siwen Lu, and Lisi Liang sets the stage for the book by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danmu* technology in East Asia and reviewing existing research on *danmu* practices across media studies, discourse analysis,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It points out that Japanese *otaku* subculture has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danmu*, which in turn enhances fan engagement with niche media forms (e.g., anime, manga, and video games). Later, Chinese online streaming platforms have localized the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 of *danmu*, thus enabling more personalized and participatory viewing experiences. Although *danmu* has not typically been seen as a translational practice in recent scholarship, the editors stress the significance of such polyphonic and pseudo-synchronic media technology within the broader landscape of AVT research.

Chapter 1 by Serenella Massidda examines the latest trends in cybersubtitling practices and *danmu*'s impacts on audience particip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fter review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danmu* informed by interdisciplinary insights, this chapter further situates *danmu* within AVT research by comparing it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th interlingual subtitling. It suggests that *danmu* subtitling resembles fansubbing more than mainstream subtitling, which functions as an amateur AVT practice unconstrained by space and time and typically presented in a more playful, spontaneous manner. While *danmu* has gained increasing popularity among East Asian youth by offering a safe cyberspace for knowledge sharing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Massidda also admits the accompanying concerns over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atomization. From a Western perspectiv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further discussion is warranted regarding *danmu*'s adaptability to platforms such as YouTube and its reception across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this chapter highlights the trend of AVT practices toward fostering dynamic participatory experience and the role of *danmu* technology in opening avenues for exploring emerging sub-topics within AVT studies.

Chapter 2 by Shiqing Liang and Jorge Díaz-Cintas explores how *danmu* subtitling plays a transformative role in the documentary viewing experience. Drawing elastically on Tomkins's affect theory, it focuses on three primary audience engagement with such traditional audiovisual genre via accumulative bullet comments, including unpicking and creating humor, growing virtual community bonds and intimacy, as well as improving factual information and sharing knowledge. It is found that *danmu* can foster positive co-viewing experiences where a sense of amusement, connectedness, and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arise from and extend beyond the original content of the documentary itself. Thus,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how online streaming platforms like Bilibili, through the incorporation of *danmu*, empower traditional audiovisual genres by transforming documentary viewing from a traditionally dull and instructive activity into an enjoyable and communal experience.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argument is limited by its exclusive focus on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audience emotional entanglement, leaving the potential negative ones unexplored. Nevertheless, this chapter offers a detailed textual analysis of representative *danmu* entries drawn from a range of Chinese popular doc-

umentaries, thus shedding light on how *danmu* reshapes audience affective engagement with audiovisual productions in cyberspace.

Chapter 3 by Zhuojia Chen and Dezheng (William) Feng investigates pseudo-translation in *danmu* subtitling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popular animation series *Pingu*. To elucidate how *danmu* subtitling reshapes original narratives through multimodal resources, the authors develop a four-dimensional framework addressing explicitness (*explicit* or *implicit*), meaning representation (*congruent* or *incongruent*), source of meaning (*verbal*, *visual*, and/or *aural*),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respeaking*, *homophonic rendering*, *mentalization*, or *transposit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seudo-translations on the *danmu* interface, often lacking explicit speaker tags, could interrupt as much as align with the original video narrative. Typically prompted by non-verbal resources, *danmu* subtitling tends to serve interactive and entertaining functions rather than merely transferring the intended meanings. Through the integrated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danmu*-mediated pseudo-translation, this chapter expands the scope of AVT practice within grassroots, non-professional contexts, where the deprioritized standards of fidelity and accuracy along with the decentralized role of language point to a reconfiguration of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Chapter 4 by Wenhao Bi explores how *danmu* commentary on video game playbacks can foster a public sphere that gives rise to grassroots practices of cultural citizenship. Focusing on the case of *Detroit*, it shows that the *danmu* interface facilitates both emotional engagement with the playthrough an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debatable plots, thus grounding viewers' moral choices, value judgments, and political stances within broader social contexts. Despite *danmu*'s potential to shift game viewing from collective entertainment to political debate, Bi highlights its technological constraint embodied in one-way pileup, which could discourage interactive conversation and restrict deeper deliberation. Moreover,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technological setup leads to an illusion of practicing cultural citizenship, in which the pseudo-synchrony of the *danmu* interface simultaneously evokes and limits the promise of the public sphere. While the arguments remain largely illustrative and lack quantitative evidence, they benefit from a ludological perspective, which effectively elucidates how *danmu* interface accommodates an experiment in grassroots practices of cultural citizenship. In this way, this chapter offers an 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 for situating *danmu* comment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playful virtual world and broader socio-political life.

Chapter 5 by Yan Qin conducts a netnographic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participation and reification of the virtual community of practice (VCoP) in *danmu* subtitling. Drawing on a triangulation of interview data, *danmu* texts, and field notes, it reveals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VCoP among *danmu* subtitlers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of practice, including mutual recognition, shared repertoire, and joint enterprise. Compared with a traditional CoP, Qin notes that *danmu* subtitlers constitute a loosely connected community featuring a high degree of virtual participation, the absence of regular meetings, and infrequent yet active follow-up

interactions among its members. Thu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danmu* subtitling works as more streamlined and individualistic translation activity in the digital age. Although this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danmu* subtitlers and the multi-layered *danmu* subtitling process, the data drawn from a single participant cannot be expected to generalize the findings to a broader context. However, this chapter extends the concept of CoP to virtual practices of *danmu* subtitlers, enrich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cybersubtitling.

Chapter 6 by Bohan Yin, Huihuang Jia, and Sijing Lu investigates audience reception of *danmu* subtitling and commentary in China.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thirty participants, it focuses on viewers' preferences for *danmu* usage, perceptions of its impacts on comprehension,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Findings show that Chinese viewers tend to engage with *danmu* through commentary-centered practices and personalized interface adjustments, meanwhile valuing its real-time interactivity and spontaneous creativity for lowering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omprehension barriers in comparison to traditional subtitling. Moreover, this chapter highlights the potential for *danmu* to evolve via user contributions to proposed enhancements in display and filtering mechanisms while raising skepticism about the standardization of *danmu* and its integration into Western online streaming platforms given its possible disruption of immersive viewing experience. Notably, the lack of objectively measured behavioral metrics and standardized scales limits this study's ability to make causal or quantitative claims about *danmu*'s impact on comprehension. Nevertheless, based on the authentic qualitative evidence from participants' self-reports, this chapter still provides practical insights into promoting *danmu* reception, emphasizing the need to balance viewer interaction with visual clarity.

In general, this book advances knowledge in the field of *danmu* subtitling and commentary through both theoretical grounding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t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extends its impacts to broader academic fields. On the one hand, this book broadens the conceptual boundaries of AVT beyond the interlingual renditions of source texts (Díaz-Cintas & Remael, 2014). In the case studies, *danmu* subtitling exhibits greater multimodal interrelation and narrative recontextualization, thereby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originals and translations, authorship and editorship (Nakajima, 2019). On the other hand, this book engages *danmu* research with cross-disciplinary dialogue spanning media communication, digital culture, and East Asian studies. The case studies delve into how *danmu*'s affordance of pseudo-synchronicity allows for collectivist, anonymous, and ephemeral engagement with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discourses on the East Asian mediascapes, thus offering a lens to expand Jenkins's (2006) notions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 originally grounded in Western platforms. In practical aspects, this book provides valuable guidance for both the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 of *danmu*-mediated content. On the production side, it examines the previously underexplored agents behind the practice of *danmu* subtitling, particularly how *danmu* subtitlers carry out

the workflow through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thus shedding light on the grassroots subtitling practices. On the reception side, it investigates the way in which viewers engage with *danmu*, specifically its impacts on viewing comprehension, thus offering meaningful references for content creators and interface designers in utilizing or optimizing *danmu* technology.

Despite its merits, this collection is still limited in some ways. It has an exclusive research scope within the East Asian context, engages with a limited range of related disciplines, and makes restricted use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Therefore, future research could improve in three key aspects. First, it could examine a broader range of audiences across cultural contexts, especially exploring how *danmu* is perceived and engaged with on Western online streaming platforms. Second, it could integrate insights fro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analyze *danmu* interfaces, from socio-psychological and marketing perspectives to investigate its impacts on viewers. Third, it could build large-scale corpora and adopt experimental methods (e.g., eye-tracking technology) to generate more systematic and quantifiable evidence. However, these shortcomings do not diminish the substantial value of this book. As the first volume of its kind, this book brings together cutting-edge studies on *danmu* in the context of AVT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us offering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global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interested in this field.

References

- Díaz-Cintas, Jorge, and Remael, Aline. 2014.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Subtitl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Jenkins, Henry. 2006.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 Johnson, Daniel. 2013. "Polyphonic/pseudo-synchronic: Animated writing in the comment feed of Nicovideo." *Japanese Studies*, 33 (3): 297–313.
- Nakajima, Seio. 2019. The sociability of millennials in cyberspa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arrage subtitling in Nico Nico Douga and Bilibili. In *China's Youth Cultures and Collective Spaces: Creativity, Sociality, Identity and Resistance*, edited by Frangville Vanessa, and Gaffric Gwennaël. London: Routledge.
- Zhu, Yeqi. 2017. "Intertextuality, cybersub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an alternative public space: 'Danmu' and film viewing on the Bilibili.com website, a case study."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a Studies*, 6 (2): 37–54.

Translation Quarterly Editorial Policy

1. *Translation Quarterly*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We welcome academic articles, translated works and book reviews in all area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ritten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s well as research materials involving other language combinations.
2. All contributions should be hitherto unpublished and not being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 Authors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views.
3. Translated works should be submitted with a copy of the source text and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text author. It is the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to obtain written permission to translate.
4. All submissions are **peer review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and double-blind peer reviewed** by referees before acceptance for publication. Care should be taken by authors to avoid identifying themselves or acknowledging others in the submission, including the main text, notes and page headers; such information should preferably be supplied when the submission i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5. Once a contribution is published, its copyright is transferred to the publisher; any reproduction, distribution or display thereof is subject to the written consent of the publisher.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1. Manuscripts, except for book reviews, should preferably be **no less** than 8,000 words (about 16 pages).
2. **Manuscripts should be accompanied by an abstract in English of 200–300** words, with no more than **five** keywords, and a title page containing the author's name, affiliation, correspondence address, email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3. Manuscripts written in a language which is not the author's mother-tongue should preferably be checked by a native speaker before submission.
4. Manuscripts should be submitted in word-processed electronic files to the Chief Editor at translationquarterly@gmail.com.

Manuscript Stylesheet

*Manuscripts should be consistent in their use of language, spelling and format. Once your paper i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final submission be formatted to

the specifications given in these guidelines to avoid publication delay. This journal uses the “Author-Date” style as described in the latest edition of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Overview

1. Manuscripts should be typed in **12** point-font, in Times New Roman for English and PMingLiU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font. **Allow double-spacing throughout.**
2. Use **10** point-font for figures and tables, which should be numbered consecutively in Arabic numerals and provided with appropriate captions, e.g., Table 1: Interview subjects.
3. Subheadings within the main text should be aligned expressly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order: 1. / 1.1 / 1.1.1
4. Start each new paragraph with a single tab.
5. Quotations longer than **five** lines should be set off from the surrounding text in block form, indented from the left margin with a single tab. **Use font size 10.**
6. Notes, to be provided in the form of endnotes, should be kept to a minimum. Endnotes should be numbered consecutively using Arabic numerals within square brackets in superscript, e.g., [1]. Note indicators in the main text should appear after punctuation marks.
7. Proper nouns and personal names, in English or otherwise, should appear in their full original form where they first appear in the main text. Chinese names and book titles in the text should be romanised according to the Hanyu Pinyin, “modified” Wade-Giles or other pertinent systems, and then, where they first appear, followed immediately b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ranslations **in parentheses.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terms obvious to the readers (like wenzue), however, are not necessary.**
8. Book and periodic titles should be italicised, while titles of articles, chapters, poem and songs, etc., should be placed within double quotes (“ ”). The same applies for titles within titles.
9. Double quotes (“ ”) are used for quotations and special terms; single quotes (‘ ’) are only used for quotations within quotations.
10. Ellipses come in three dots, with a space between the dots, e.g., “Jack and Jill went up the hill . . .” and “Jack and Jill went up the hill . . . And Jill came tumbling after.”
11. Please use **American** spellings and punctuation, including spellings like -ze, -or, etc.
12. Dates should be of the form “1 July 2022.”

References in the text

In-text citations in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should be as precise as possible, giving the author-date and, where applicable, page references. Here are some examples: (Bassnett 2014, 28-32); as in Chesterman et al. (2003, 198); (see Kurland and Lerner 1987, chap. 10, doc. 19); (Toury 1995/2012, 10).

References section

All in-text citations in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should be matched by items in the references section, instead of listed in note form. All and only references cited in the text must be listed. References should be listed first alphabetically and then chronologically. For Chinese names and titles, please start a separate list or use Hanyu Pinyin, Wade-Giles transcription, the translated title as published or the title in literal translation where appropriate. Below are some examples:

Book

Bassnett, Susan. 2014. *Translation Studies*. 4th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Chan, Tak-hung Leo, ed. 2003. *One into many: Transl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Chan, Tak-hung Leo. 2004.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Modes, Issues and Debate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Toury, Gideon. 1995/2012.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 and beyond*. Rev. ed.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Yang, Hsien-yi 楊憲益, and Gladys Yang 戴乃迭, trans. 1956. *Selected Works of Lu Xun*. Vol. 1.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Article (in book)

Fawcett, Peter, and Jeremy Munday. 2013. "Ideology." I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edited by Mona Baker, and Gabriela Saldanha, 137–141. London: Routledge.

Liang, Qichao 梁啟超. 1984. "Fanyi wenxue yu fodian 翻譯文學與佛典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Buddhist Sutras]." In *Fanyi lunji 翻譯論集* [An Anthology of essays on translation], edited by Luo Xinzhang 羅新璋, 52-67.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Article (in journal)

Even-Zohar, Itamar. 1990.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Poetics Today* 11 (1), 45-51.

Keng, Shao-Hsun, Chun-Hung Lin, and Peter F. Orazem. 2017. "Expanding College Access in Taiwan, 1978–2014: Effects on Graduate Quali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Journal of Human Capital* 11, no. 1 (Spring): 1–34. <https://doi.org/10.1086/690235>.

Other materials

Liu, Zhengyan 劉正琰, Mingkai Gao 高名凱, Yongqian Mai 麥永乾, and Youwei Shi 史有為, eds. 1984. *Hanyu wailaici cidian* 漢語外來辭辭典 [Chinese dictionary of foreign-imported words].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Zhu, Xi 朱熹. 1270/2017. *Zhuyzi yulei* 朱子語類 [Classified discussions of Master Zhu], compiled by Li Jingde 黎靖德. Chinese Text Project. <http://ctext.org/zhuzi-yulei/zh>.

*For further guidelines, please consult the latest edition of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